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

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

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中国人 眼里的 日本人

[日]本泽二郎著

张碧清 颜锡雄 译
骆为龙 陆建元

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

[日] 本泽二郎 著
张碧清 颜锡雄 译
骆为龙 陆建元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 / (日) 本泽二郎著; 张碧清等译.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6

ISBN 7-5077-1977-4

I. 中… II. ①本… ②张… III. 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IV.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820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2-2414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邮购电话: (010) 68232285

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00 千字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日本人根本没觉察到中国人的心里话……	(1)
第一章	13 亿中国人讨厌日本人	(3)
	老人们怨恨难消……	(3)
	美国村不幸的过去……	(5)
	不能忘记过去……	(7)
	揍死日本人……	(8)
	不正视历史招人嫌	(10)
	华侨的故乡	(11)
	外出打工村与豪宅	(14)
	住在美国村的人们	(15)
	前小学校长难忘的经历	(17)
	一听说日本人便气上心头	(19)
	亲切的农家与爱打麻将	(21)
	人们感谢邓小平	(23)
	憎恨军国主义的日本	(25)
	日本兵用刺刀戳阴户	(28)
第二章	鲜为人知的南京的真实情况	(31)
	参拜靖国神社真让人讨厌	(31)
	首相中止访问南京令人遗憾	(33)
	拉贝日记是珍贵资料	(36)
	南京大屠杀	(38)

	日本老人拒不承认历史事实	(40)
	令人毛骨悚然的幸存者证言	(42)
	父母兄弟被杀害	(44)
	枪口和军刀指向市民	(46)
	日本兵强奸 11 岁的姐姐	(49)
	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51)
第三章	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告	(53)
	不诚实的日本政治家	(53)
	危险的日美安保再定义	(55)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56)
	日本军费令人难以理解	(58)
	日本不遵守和平宪法令人不安	(60)
	掩盖过去的日本的历史教育	(63)
	日美安保是染指台湾的政策	(65)
	冷静对待台湾问题	(67)
	不要把李登辉当工具使	(69)
	军队式的日本工薪族	(71)
	青岛郊外也有抗日纪念碑	(73)
	94 岁耳聋的老太太	(76)
	暧昧的政治家和官僚	(77)
	大政翼赞政治令人担心	(80)
	成立修改宪法议员联盟的冲击	(82)
	小选举区制旨在消灭革新势力	(84)
	加速右倾化	(87)
	日美军事同盟意外加强	(88)

	拖长明治的精神结构	(90)
	中国重视中日关系	(93)
	以斗争对待对立	(95)
第四章	中国记者的悬念	(98)
	日本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	(98)
	难以和日本人对话	(99)
	不存在言论自由	(100)
	日本是独立国家吗?	(102)
	电视节目太低级	(103)
	外务省会见记者的做法不妥	(105)
	媒体报道迟钝	(107)
	为什么派出自卫队飞机?	(109)
	留下军国主义土壤	(110)
	媒体宣传中国威胁论	(112)
	编辑被收买	(114)
	日本媒体的错误报道	(116)
	鲜为人知的丰田战略的背景	(118)
第五章	青岛人的说法	(123)
	日本人应正视历史	(123)
	日本比美国更坏	(125)
	中国的核武器	(127)
	尾崎行雄的真面目	(129)
	中国青年的主张	(131)
	心胸狭隘的日本人	(132)
	中国人与历史	(135)

	中国与日本有所不同	(137)
	并非勇敢的日本人	(139)
	日本经济人缺乏远见	(141)
	不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144)
第六章	坏日本人和好日本人	(149)
	日益增大的对华交流	(149)
	聪明的美国人	(151)
	日本人太傲慢	(153)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154)
	令人厌恶的大门口	(156)
	日本人也有好的	(159)
	纠纷来自感情纠葛	(161)
	香港的年轻人	(162)
第七章	胡来的政治家与日本青年的呼声	(167)
	靠不住的为政者	(167)
	中国关注年轻一代	(169)
	肯定过去的青年议员	(170)
	钻进政权中枢的右翼议员	(172)
	阁僚相继大放厥词	(174)
	首相的暧昧发言	(175)
	阁僚参拜靖国神社	(178)
	中国青年的对日观	(180)
	应修改对华政策	(182)
	二松学舍大学生的宪法观	(185)
	给中国以补偿	(187)

	第9条真了不起·····	(188)
	应为日军的罪行谢罪·····	(190)
	国铁总联合会了不起·····	(192)
第二部	架设日中友好桥梁的人们和团体 ·····	(195)
第一章	国铁东线工会捐助“希望小学” ·····	(197)
	松崎明会长的一席话·····	(197)
	胞兄被迫参加侵略战争·····	(199)
	派遣视察团到北京·····	(200)
	在历史认识上与国铁东线工会有共鸣·····	(201)
	松崎访华团在桃源乡·····	(204)
	松崎家和工会资助17所学校·····	(207)
第二章	周恩来总理关注创价学会 ·····	(211)
	中国大使馆里有创价大学第一期留学生·····	(211)
	高碕达之助和池田提议·····	(213)
	池田——松村会谈·····	(214)
	政治由松村掌管、经济由高碕负责·····	(215)
	公明党背后有池田会长·····	(216)
	周恩来会见池田·····	(218)
	友好第一的池田方针·····	(219)
	中国留学生在创价大学·····	(221)
第三章	日本财团的医学交流 ·····	(224)
	笹川良一的意外业绩·····	(224)
	日本财团是日中友好团体·····	(226)
	10年培训1000人·····	(228)

	提供 32 亿日元	(230)
	和邓小平交流	(232)
第四章	宇都宫的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支援留学生	(235)
	为日中友好抛弃乌纱帽	(235)
	公费留学生住职工宿舍	(237)
	辽子夫人慰问留学生	(238)
	宇都宫太郎和驹井德三的遗言	(241)
第五章	日中和平交流 21 世纪会的小小活动	(243)
	把《中国的大警告》送给抗日战争纪念馆	(243)
	江泽民主席说以史为鉴	(245)
	条约缔结 20 周年的和平交流	(247)
	日中友好从卢沟桥、南京开始	(248)
	日本学生谈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感想	(251)
	感动了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253)
	受到白介夫、张承钧的欢迎	(255)
	肖向前先生长时间的讲演	(258)
	只要有诚意一次就够	(261)
结束语	(263)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本泽二郎先生是日本一位资深的政治记者，以前整天忙于采访日本政要人物，并不了解中国，后来之所以关心中国是受他的恩师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影响。1979年他随同日本大平首相第一次访华，耳闻目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开了眼界”而且“心潮澎湃”，他决心要如实向日本人报道中国情况。近二十年来，为研究和报道中国，他平均每年访华三次，足迹遍于半个中国，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

本泽先生以政治记者特有的敏锐眼光观察中国情况，积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为了解人民大众的心声和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甚至深入中国农村基层与农民交谈。在农村他曾险遇不测，遭受过围攻、谩骂，但他很理解这些当年受害者的心情，无悔无怨，甚至由于当时没有当面向这些人谢罪而感到内疚。

本书是本泽先生在中国各地采访的实录，原名《大中国的真实》。由于书中介绍的大多是中国人的对日观，故中译本改名为《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

日本侵略中国，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人所共知，但是日军暴行的详情、细节，大家未必都知道。作者对当年受害的幸存者或其家属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采访，了解了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作者把它如实地报道出来，旨在教育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青年人。日本官方、历史教科书不把日军当年侵略中国的史实告诉青年人，这些青年人虽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日军当年具体干了些什么坏事，因而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

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后，日本青年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慨。作者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书，用以教育日本青年人，使他们觉醒，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中国人读此书也可以温故知新，进一步增强爱国意识。

作者还采访了许多中国学者，听取他们谈论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中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日本当局的一些错误政策，诸如对日台关系的处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的出台、“中国威胁论”等等，大都是中国人的普遍看法。这些看法不完全同于官方论调，有个人特色。可以说，这部分也是中国人的对日观。

在书中，作者以热情的笔墨介绍了一些日本的团体和个人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事迹。从事友好活动者有的出于赎罪心情，有的是谋求两国世代友好。有些友好人士做好事不是一次而是持之以恒，实属难得。作者最后着重指出，中国人揭露日军当年暴行，批评日本当局的一些错误政策并非敌视日本，而是希望日本改正错误以实现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

继《帷幕后的奸雄——中曾根康弘外传》、《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之后 此书是我们最近翻译本泽先生的第三本著作。参加此书翻译的有张碧清、骆为龙、颜锡雄、陆建元四人。这里还要感谢学苑出版社孟白、周良先生的一再关照，本书得以早日问世。

为保留该书原貌——出自一个日本人的看法，译文对作者一些不大符合中国习惯的评述未作删改。特此说明。动起笔来总是匆匆忙忙，推敲不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指正。

译者

2002年4月15日

序 言

和中国打交道大约有 27 年了。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内阁）使身为政治记者的笔者开了眼界。

负责日中邦交正常化具体工作的大平正芳外相（当时）和对日中友好满怀热情的亚洲研究所发起人代表宇都宫德马是笔者的恩师。1979 年 12 月，我随同大平首相访华，首次踏上中国大地，十分荣幸。

到不熟悉的大陆旅行给我这位记者增添了不少希望和勇气。1979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已过去 7 个年头，但首次访华仍使我心潮澎湃。

饭店服务员满怀热情地问候“您好”，日本人总是提高声调回应。在街上也是一样，很少见到外国人的北京市民，看到日本人便好奇地围上来。

一位日本医生到位于街角的厕所方便，忘了拿装有巨款的提包，可是过了一会儿警察把提包送还给了他。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

对日本人而言，中国是旅游胜地，人人待客彬彬有礼。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这个昔日的“美帝国主义走狗”，一下子升格为友好国家。

那么，中国人是否把日本 15 年的侵华战争看作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呢？当然不是。两国邦交正常化是当时毛泽东、周恩

来基于国际战略作出的政治判断和日本国内日中友好的大潮流妥善结合的产物。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相信日本国民会进行深刻反省和作出补偿，这冒险性的判断使两国世纪性的和解得以实现。而且，日中两国领导人都以五十年、百年的长远眼光，以睦邻友好、和平外交为基轴。熟悉日本情况的周恩来总理体察到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着眼于此，他劝告中国人不要憎恨日本人。

可是，在自称为日本知识分子的人中，有人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日中两国已是普通关系。”也有一些以批判中国的“人权派”记者自居的人，摆出一付日本才是民主的本家的架势。真是可笑之极。

在谈中国的民主之前，需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日本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而且若要追究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些人应倾听一下情况。

从 1979 年以来，笔者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实情，到中国旅行迄今已 44 次。以我的经历而言，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化有了惊人的进步。中国人可以对外国人说心里话，而且意识有了巨大变化。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也是他们的民主化的结果。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很理解民主的意义，甚至有些反感。那也难怪，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生活着无数日军的受害者及有关的人。

许多日本人不知道也没有注意这里的情况。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日本文部省一直隐瞒，不让儿童学习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由于一代人不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法形容的野蛮的侵略史，以至于形成今天的日本社会，而且最近评价战前使之合法化的运动竟然日益表面化。

在德国，绝不允许拍赞扬纳粹希特勒的电影，而在日本，1998年6月上映了赞扬东条英机的电视《自尊》，震惊了亚洲国家人民。

在此之前的1996年，继中曾根康弘首相之后，桥本龙太郎首相竟然参拜合祀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次激怒了近邻国家人民。

这一年，被日美两国政府当作假想敌的苏联早已瓦解，可是日美两国却发表了扩大和强化日美安保条约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实际上是强力推行被中国称为“干预”的遏制政策。具体而言是搞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这是战争合作法、参战法，这是日、美、台湾敌视中国的政策，这是用日美军工产业体制的军事力量压制亚洲太平洋的愚蠢的战争政策。

对此，保守民主派称之为企图“从根本上搞垮宪法之举”。对大平正芳的体谅政治曾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头号知日派肖向前先生（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惊叹“日本右倾化之快出乎预料”。

“日本要向何处去？”这种不安再次沉重地压在亚洲国家人民心头。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首先是出于日中两国的政治经济的战略判断，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方面似乎有些勉强。尽管如此，日本方面一再出现麻木不仁之举，13亿中国人民一直在忍耐。

还有一点不妙的是日本媒体的应对。（日本媒体似乎要配合永田町）右倾化的步调，丝毫不报道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即使报道也十分抽象。

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形成了深深的鸿沟，日本媒体对此的“贡献”不可估量，由此造成的对商业、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若把中国市场拒之门外，日本经济会面临巨大损失。

执笔写此书动机就在此，即想介绍一下生活在中国的人们的真实言行。知道中国人的真心话，乃是进行商业、旅游业等日中和平交流的基础。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两国人民和为政者将能承担日中友好、共同迈向 21 世纪的义务和责任。

当然，我们面前的道路决不平坦。尽管这样，仍不能灰心，应坚持下去。关于这一点，更多地有待于日本国民努力。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的是日本国内一部分有识之士执着的努力。

尽管日本出版界盛行歧视中国的做法，但由于数据出版社鹤野义嗣社长的照顾，本书得以问世，特书一笔敬告各位读者。

作 者

一九九九年六月吉日

第一部

日本人根本没觉察到中国人的心里话

第一章 13亿中国人讨厌日本人

老人们怨恨难消

“喂！你小子是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真的？！”

正在路上走的人转眼之间便围拢过来形成小小的包围圈。他们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干完活忙着回家的中年男子也大声嚷嚷“什么？！什么？！”而加入到人群中来。带领日本人参观村子的前小学校长感到事态严重脸都变了色。人群中的老人横眉怒目形态可畏，如同猛犬要扑向猎物。

“若是日本人，就打死他！”激昂的吼声从背后一再传来。积压多年的怨恨、愤怒，面对眼前的日本人爆发出来了，事态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村民而言，突然一个前日本兵的子孙进了自己住惯的村子，这是无法容忍的。

心中积压五十多年没有机会发泄的村民的怨愤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用日语来说，“打死他”是充满敌意的话，从二十多个中国男人的嘴里说出，当翻译的这位中国前小学校长不禁浑身哆嗦。翻译只是翻译了一点激昂的怒言，而这位日本人已吓得呆若木鸡，一时哑口无言。

大家突然叫嚷“打死他”，这位以中国通自称的日本人由于困惑和恐怖而招架不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初完全没想到事态会如此发展。

前面这么写多少带些小说味道，不过当时的场面真的非常紧张。翻译因恐惧而声音发抖，尽管如此还是鼓起勇气向大家解释。若不说清楚，很可能日本人会难逃一劫，若演变为突发事件可了不得，视情况可能发展成为外交问题。

翻译战战兢兢反复叫道，“这位日本人是中日友好人士。”在当地颇受村民信赖的前小学校长也反复大声地替日本人说好话，结果这位处境危险的日本人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难关。

这位日本人就是我。这是 1997 年 1 月在福建省的亲身经历。在此之前，笔者访华已 37 次，每次都处在友好的气氛中。人们常常说，“有机会再到中国来”，使我乘兴踏上归国之途。对于这个礼义之邦人们的热情欢迎，我感激不尽。

可是这次福建之行，我第一次领教了中国老百姓的心情。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国也有非常厌恶日本人的人。对笔者来说，这次福建之行是认识中国的最可贵的一次旅行，我十分感激。冷静地想想，他们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人蒙受了历史罕见的灾难。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主张中日友好，可是国会议员依然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继中曾根首相之后桥本首相也去参拜了，中国人的心情怎能平静。

否认随军慰安妇历史事实的日本青年国会议员超过一百人。对于不正视过去的日本，中国甚至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受害的老百姓认为这是“错误的”、“在开玩笑”对本国政府和

党有所不满不足为奇。“党和政府懦弱，受日本欺负。”怎么也想不通的老百姓为数不少。

在政府和党的威望很高的北京，对老百姓的不满，可用政治压制，可是在地方却办不到。人们朴素的反日感情直接表现出来。对此理所当然的事实笔者有切肤之感，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若换个立场，又将如何？若换了急性子的日本人则可能不弄清缘由就将对方痛打一顿，可能打个半死。只要想想关东大震灾时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暴行就明白了。

笔者得救了，毫发无损。翻译和前小学校长的竭力解释终于奏效。当时若这两人不在旁边，不知会成啥样。即使被揍一顿，日本人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有一位年轻的女议员说，“那是老人干的，我毫无责任，”对她这种佯装不解的辩解的态度，笔者难以理解。正如前任德国总统说的，现在活着的人必须承担先人的过错。

美国村不幸的过去

一知道笔者是日本人，村民就破口大骂想揍一顿的地方，就是位于福州市郊外的高楼村。村子的后面丘陵起伏，前面是大片水田。

这村子与日本的村子的风格大不相同，住房全是时髦的西洋风格，颇有点高级住宅区的风味。这村子紧挨田园地带的一角被开发成游览区，人称美国村。

这是一个带有 50 年前浓厚色彩的村子。由于日本侵略军

的暴行，整个村子凋零不堪，后来蒋介石的军队把村子的年轻人从各角落抓来，硬是拉到台湾去。运气好幸免于难的村民，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海外，前往的目的地是移民之国——美国。

人们在那里拼命干活，以维持生活，干了几十年攒了一些钱。他们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高楼村，西洋风格的建筑物便是他们劳动的成果。

干活的人住在美国，老人则在这个美国村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老人和孩子的高楼村，一看便知是个富裕的村子。我问他们：“想去台湾吗？”看他们是否对一海之隔的国民党的岛屿感兴趣和关心。他们回答说：“这里好，哪儿也不想去。”听说最近从台湾回到高楼村老家的人为数不少，这是可以理解的。

高楼村的居民大多数是体验过过去悲惨生活的老年人，在村子里看不到青年人的身影，他们都到美国去了。

说实在的，笔者最初对他们的愤怒也无法理解，因为我是对历史无知的一个日本人，谈起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我以为只是发生在上海、南京或北京、东北等地方。

台湾岛与福建省近在咫尺，福建省的旁边是广东省，香港是近邻。这里是中国南方，而高楼村是福州的偏僻山村。日本军队的跌蹄竟然出现在这样的地方真是没想到。正因为这样，要理解他们对日本人的憎恨需要一些时间。

陪同我参观村子的前小学校长石鸿钦一年前退休，正悠哉游哉地安度时光，常常玩玩麻将。这位退休校长生活轻松、时间充足，所以带领笔者到村子参观。

我们走到一幢建筑前，他指着说：“这是教堂，”我抬头一看，发现与在欧美常见的尖顶建筑一模一样。怪不得叫美国

村，基督徒为数不少。房屋、宗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不能忘记过去

我们走在石板铺成的狭窄村道上，遇到了陈明忠先生。他是石鸿钦的朋友，也退休了。他以前是法官，现担任村里的顾问，71岁。这位前小学校长把笔者介绍给他。这是绝好的机会，我向他打听过去的事情，他说的确这里来过许多日本兵。

“什么时候来的？”

“1940年。”

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夏天到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之后，其势力向南方扩展。福建省是入侵印度支那半岛的战略通道，日本兵照例地在这个和平的农村地区胡作非为。

陈明忠说，“日本兵肆无忌惮地强奸中国妇女，人们只好牵着牛逃到山里。谈起日本只有令人悲伤。这事至死也忘不了。”满脸皱纹的他，这时更添一层皱纹，神情十分悲伤。听此言，笔者真是无地自容。

“妇女得了性病，当时没有治疗梅毒的方法，真是够呛。我的朋友中有人死于性病。说实话我真想杀日本人。”

这位前法官是知识分子。他很理解政府和党的（中日友好）方针。他不是农民大老粗，可是一谈起过去，他也顺口说出想杀日本人。对他的这种心情，究竟有多少日本人懂得？

即使是笔者，在见到他听他说之前对这些情况也一无所知，因为1.2亿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一情况。这是何故？战后都

过了 50 年，为何对这些惨无人道缺德的事情置若罔闻？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政府、日本人不负责任、含糊搪塞。看来，“日本鬼子观”是中国人的真实心情。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日本给了什么补偿呢？是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给了些钱，可是这又怎么样，它不能医治人们心灵深处的伤痕。岂只这样，日本官僚政府甚至连侵略的史实也不告诉青年人。

“当地的中国人为保自身平安家家设佛坛，以为在佛坛前就不会被鬼子兵强奸。”

日本兵不只是在南京掠夺、施暴，当地妇女们就想靠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是否真的有效，谁也不知道。即使这样，“求神拜佛”是少不了的。不可设想，野兽般的日本兵会因此而罢手。

他还说：“鬼子兵杀中国人像杀动物一样。”

笔者只有垂下头心情沉重地倾听这位前法官的倾诉。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此如何对待？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告诉尽量多的日本人。只能做到这点，笔者甚感可悲。

揍死日本人

“他要是日本人就揍死他！”

人们顷刻间便聚集过来，以至发展成为开头所说的异常事态。

“鬼子兵强奸村里的妇女，抢夺食物，胡作非为，随意杀人。这样的日本人干嘛到我们这里来！”

“你这小子为何到我们这里来 你不感到羞耻吗？”

村里人把笔者围住，骂声不绝。

当时还是婴儿、如今 57 岁的一个男人直逼笔者，叫道，“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多亏父母用泥土涂满我全身。这种痛苦你懂吗？”

另外一个老人嚷道，“我们家用煤灰裹泥从头到脚把幼儿涂黑藏到灶台下，女人们剃光头女扮男装。鬼子兵摧残妇女儿童，其手段之残忍终生不忘！”

翻译和老校长拼命保护笔者，一再解释说，“这位日本朋友在为中日友好尽力，是为把大家的申诉报道给日本人而来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日本政治家的谬论的，他是为了解这一情况而到这里来的。他不是敌人呀！”好不容易我才能从怒气冲冲的人群中摆脱出来。这时村里的老人们纷纷叫道，“日本否定历史，我们绝不答应。请务必把我们的话告诉日本人民。”

陈明忠说，“你是幸运的，若你四十年前到这里来，那可了不得啦，”“总之坏在军国主义上，军国主义绝对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至关重要。”他婉言安慰笔者。

听到这位前法官发言后，老人加以反驳说“你说什么呀！”于是前校长催促笔者，匆匆离去。可是一位怒气冲冲的老人不甘心，紧追我们之后，不断骂道，“滚蛋，滚蛋！”这位老人的眼睛因愤怒而发红。他真的是生气了，他把对过去日本兵胡作非为的怨恨统统发洩到笔者身上。

这位老人身材矮小，平时恐怕是个稳重的人。这样一位好人也向日本人横眉立目、骂声不断，使人颇感吃惊。

若附近有警察，他的行为可能会被制止。可幸运的是，这里

是和平安全的农村街道，没有政府官员出来制止他的怒火。喜欢中国的笔者第一次知晓老百姓的真实心情。

日本人为日中友好所做的努力，等于什么都没有做，需要从头做起。

不正视历史招人嫌

陈明忠说，“四十年前你若到这里来可能被打死，”他还断言，“即使是二三十年前到这里生命也没有保障。”

他们还说，“你是战后访问美国村（高楼村）的第一个日本人。”

事先未通知而突然到高楼村作客的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仿佛就是当年的日本兵。

干过掠夺、强奸、杀人勾当的日本人是没有资格步入高楼村的，除非是疯子否则是到不了这里的。

1972年日中邦交是正常化了，但是最近日本人又干了些什么呢？不正视历史，否定历史、使侵略合法化的动向日益表面化；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大举参拜象征着侵略合法化的靖国神社。这样的日本和日本人，中国人民是不喜欢的。

不知道情况冒冒失失地跑来，人们自然怒上心头。

他们这种心情的表露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痛苦的体验，加上战后日本一贯的态度，平凡的中国人民怒火中烧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可以抑制国民的怒气，但不能驾驭整个 13 亿中国人，他们的不满爆发出来不足为奇。其责任应由日本政府

和日本人来负。

左思右想其实笔者也是一个没有勇气的日本人。面对这一突发的局面，没有勇气把自己豁出去、低头认罪，而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故作镇静。

对于那个追踪而来的小个子老人，何以不说谢罪的话，自己不就同日本兵一个样了吗？每念及此只有愕然。

华侨的故乡

我到福建省美国村（高楼站）旅行纯属偶然。

最先向我介绍福建省的，是中国国家旅游局的日本游客负责人何琳、张西龙，还有杨振一。他们带领我参观了旅游胜地武夷山。

在那里一排排仿宋的白壁住宅端庄地伫立着，文化、传统与自然美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参观宋朝式的饭店时，我心想若有机会一定再次造访。

爬武夷山也很有趣。沿石头铺成的山道爬到半山腰，然后再呼哧呼哧地沿着岩石铺成的阶梯爬到山顶。右边是飞溅着雪白水沫的清流，左边是手捧可喝的清泉在哗啦哗啦地流。

到了山顶茶店，我呼吸清新的空气，品尝乌龙茶的极品岩茶，确是处于人生最高的境界。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斟入直径三四公分小茶杯的岩茶。所谓仙境大概就是这个样。身居此境凡人也想写诗。

走下山来，放竹筏的清流又是一番情趣。身栖前头摇橹的竹筏上，凉风拂面，简直是山水画的世界，与桂林相比又是一

番不同的情景。

在福州市，福建省当时的旅游局长明敏设晚宴招待我。她强调“乌龙茶是福建省的名产，请别忘记。”笔者问她关于福建省人偷渡的现状，事出突然她一时语塞。这时，明敏局长身边的人简单地说，“本地区的人以为划船可以去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看来，这里是外出打工者的故乡呀！”

这位局长身边人的话，使笔者感到异常亲切。邻接的广东省和福建省都是华侨的故乡。这里人到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去，那里熟人多，他们足迹遍天下。

华侨的群体、华人网络主要是由广东人和福建人形成。对他们而言，没有国家壁垒，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球人、国际人。

中国旅游局张西龙先生带领我参观福州时，我这位数年前认识的朋友最为吃惊的是，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豪华都市改造，因为与福建省一海之隔的正是台湾，以前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下，考虑到可能受到台湾的炮击，住宅建得低，也没有商业投资，故而这里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

到了邓小平时代，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方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取消了“反攻大陆”的口号。紧张局势一缓和，台湾商人大举进入福建省等地。过去是仇敌的台湾中小企业首先开始在大陆投资。

由此可知，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虽然有时紧张，但经济往来日益增多。只要看看 2000 万人口的台湾和 13 亿大陆人口之比就明白啦。不能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衡量经济关系。不管台湾国民党怎样高举反共旗帜，毕竟不能与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大陆相对抗。

1997年1月笔者第三次访问福州，知道福州郊外有个“外出打工村”我突然去访问。

福州的公共汽车是双层的，这像是香港撤下来的处理品，相当陈旧，但在平坦的福州市中心跑还挺不错的。到了郊外公共汽车终点站，长途汽车都正在发动，到处是烟雾。

于是换乘一辆小公共汽车，不是定时的，客满就开车，乘客只要给售票员打个招呼，就可以在自己方便的地方下车，很方便，这比乘出租车便宜多了。虽然比公共汽车价钱稍贵一点，但好处是准有座位。

这种公共汽车行驶在中国各城市，乘客不少，日本也可以引进。这样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有比日本先进的地方。

这辆小公共汽车开往邻近的长乐县，乘客坐得满满的。中途市民一招手便停下来，上新的乘客，效率甚佳。

在我的前面坐着一位老大妈，她手腕上带着一个漂亮的手表。大概是在海外工作的家人赚了钱买给她的。在附近的座位上的一位老大爷穿着漂亮的皮夹克，恐怕也是海外工作的家人买的。这是在别的城市看不到的穿着风情。

乘12人的小公共，转眼间上了22位乘客，超额9人。不妙的是，小公共上坐着一位福州市交通局的女干部（祝智敏）。她提醒说违反了交通规则。本来要罚款500元，售票员低头认错：“下次再这样就饶不了你”训一顿了事。

这位干部温和，售票员松了一口气。可是她的提醒我至今不忘。超载当然危险，因为有10个人站着，若紧急刹车就会倒一片造成大事故。听说这种违反规则的事，有些不好的干部常常私下处理，但乘这辆小公共的干部并不是这种人。车内的

气氛立刻明朗起来。

渡过闽江是长乐市。最近该市大型国际机场竣工，经济显著发展，长乐从福州市分离出来升格为市在情理之中。这辆公共汽车继续向长乐市郊外驶去，到了乡下又改乘拖拉机。这是跑农村公路的公共汽车，发出突突的响声，可开到位于水田地一带一隅的昆石村。

外出打工村与豪宅

我听说有这样的事，“有姐弟两人到日本打工赚了钱，回来后盖了5层的大楼。”听人说这是本村第一号豪宅，一看之下果然是富丽堂皇的住宅。处在多是两层楼的农村楼群中，五层楼显得气派非凡。

这家的主人姐姐陈燕英32岁，弟弟陈天兴30岁。姐弟两人从1993年起在日本打工近5年，盖起了昆石村最棒的五层楼的住宅。姐姐谈了在日本的生活情况。

“弟弟在旅馆送饭盒最初是每小时550日元后来是800日元，地点是京都的东山。我在洗衣店工作。后来弟弟在建筑工地和面包店干活。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剩下的时间完全用于打工。”

前一段时间不错，没搞坏身体。过了四年果然姐姐身体垮了，姐弟二人只好回国。身体垮了大概是由于过度劳累。

“建这所楼房约花了五六十万元人民币。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压缩到两三万日元，存款20万日元。弟弟喝点酒，抽点烟，一月生活费花5万日元。房租15000日元，当然没有洗

澡间。一年两人攒下 400 万日元，连续攒了 4 年。”

这需要很大的体力和忍耐力。不少日本人给中国人戴上“不爱劳动”的帽子，这是错误的。只不过是计划经济造就了“不爱劳动的中国人”。在竞争原则下的今天，中国人像日本人那样爱劳动。可以说今天中国人干得很好，在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干活卖力气胜过日本人，尤其是在日本打工的中国人简直像是铁人。

“早晨 4 点起来，在京都市场打工，帮人油炸鱼虾，9 点到日语学校学习，午餐吃面条或面包。下午在旅馆干到晚上 11 点。”一年 365 天，天天干，从不游玩，顶多花些钱买被褥。除伙食费外，都是利用废物。干了四年毕竟到了体力的极限，这才回国。”这些话是弟弟说的，值得佩服。听说过去日本年轻人在美国一边洗碟子一边学习，但没有听说把大把钱带回祖国盖豪华住宅的。

住在美国村的人们

我见到昆石村村长陈忠国，他是个稳重的中年男子。这位管 1300 人的村长说，“这个村外出打工者 20 人。大多数在美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在日本有四五人。”

他给我谈了更有趣的事情。陈忠国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意外感受。他说，“邻近有个美国华侨村，具有五十年历史。你参观后认为如何？”

从昆石村到高楼村的交通工具是摩的（摩托车）。在狭小的乡道上跑正合适。美国华侨村在当地叫美国村，乡道都铺成

柏油马路或石板路。这是个靠美国寄钱回来生活的富裕村子。

“在这个村里干活是丢人的，听此言让人非常吃惊。一个不干活无法生活的家庭，说明其在美国打工的亲人没有好好干活，这样的家庭在当地被人瞧不起。多么奇怪的村子。

在村子的中心，有一个像公民馆那样的大建筑物，在其门前老人们围着麻将桌打麻将度日，似乎是为防止老年痴呆。

在老人周围，有十多个三四岁的小孩追逐游戏。这不是乡村街道应有的气氛，给人的印象是欧美住宅区。中国式的房屋一间也没有。

可是这里是中国。往胡同里走去，是木造房屋，也有两层楼的住宅，都是战前盖的房子。从敞开的玻璃门往里走，是约十张席子大的没铺地板的房间。

在这家住的是前小学校长石鸿钦和以前当教师的妻子陈玉英。夫人一边沐浴冬天午后的阳光，一边在编织东西。丈夫则在房屋前与附近的人们玩麻将。

在麻将台抽的烟也很妙，是美国生产的“万宝路”，是高级香烟。抽美国高级香烟的中国人为数不多。这就是美国村的村民。

在这位前小学校长旁边坐的牌友，是看上去八十开外的老妇人。她手上带着金手表，她是不把财产换为货币而是换成金器随身带的中国老富婆之一。她的儿子、孙子都在美国生活。

石鸿钦 61岁，前年退休。他向我介绍村子的情况说：

“高楼村村民约 7000 人。其中两三千人在海外，多数在美国生活。我们兄弟三人，只我一人留在国内，两个兄弟在美国。在我们家族中约有 30 人在海外 我在中国留守。”

这位前小学校长气色很好、微胖，他一边玩麻将一边哈哈大笑。他用养老金悠然自得地生活，还有来自美国的汇款。

“父亲兄弟五人，五家人全都在外国。现在只留下五人，五十人在海外生活，留下的人替老人办丧事。”

“我父亲 60 年前去美国，当时 16 岁。他在船上工作，到美国去干了十年活。前后去了三次。他引退后，由儿子代他去。这一带的人家九成已到海外，空房很多。”

石鸿钦喜欢讲话。他正面坐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手上戴着金镯子，像前面提到的老妇人一样，两耳戴着金光闪闪的金耳环。身上戴的东西全是金的。

这些人都是有资产者，而在没铺地板的客厅里仍张贴着毛泽东的名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毛泽东是护身符。

“台湾？毫无兴趣。我的两个儿子在美国打工，在纽约唐人街开餐馆。在那里不会说英语也无妨，说福建话就行。”

在与他谈话时，我忽然想听听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当然，我别无他意，对岛国的日本人而言，知道中国人的对日观至关重要。我这样想不由得就问了他。

前小学校长难忘的经历

笔者没想到这一句话竟导致非同小可的真实的发现。

“日本兵到这里来过。把我父亲家的一间小小的店铺给毁啦。”

我问他对日本的印象如何，这位 61 岁的美国村的前小学校长对我谈了他的过去。从最近的日中关系问起，他是怎样看

日本的？他对日本有过期待，但是他都以历史事实来回答，“日本兵到这里来过。”

他对笔者提出的糊涂问题予以痛击，他似乎要说，“你小子睡迷糊啦，你问我什么？我家被日本兵破坏了，问我对日本的印象？别开玩笑啦！”

“日本兵来过这里？”

笔者只不过是一个不太知道日本侵略史的愚蠢的日本记者，瞬间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极为肤浅的本质。

“那时我 10 岁，是距今 51 年前的事。胡作非为的日本兵追我，差点杀死我。我拼命逃跑，躲在社庙的神龛里，不敢出大气，这才幸免于难。真可怕，吓死人啦。”

“请到这边来，”他把我带到他家的后门。这是在中国农村常见的社庙，如同日本的神社。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信仰，人们即便无所求有时也到这里两手合十，供奉东西。不论有无功德，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是地球上到处可见的一种信仰。

他把笔者带到那里，用右手指社庙后面的神龛说，“就是那里，那里有祭坛，我就是躲在那里捡回一条命的。”

日本兵使用暴力胡作非为，所幸社庙保护生灵，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即使马克思教导说“宗教是鸦片”，这也不会变。于是他与笔者开始对话。

“你到底看到多少日本兵？”

“有几十人呐！”

“日本兵从哪里来？”

“从上海方面来。他们从上海乘船，溯闽江而上到这里

来。”

“你们受害情况如何？”

“总之很够呛，一言难尽。譬如，你不说声谢谢，就挨揍。日本兵干了不少抢劫、强奸的勾当。我的亲戚家的房子被纵火焚烧。他们为所欲为，抢酒、食品、烟。被强奸的女性很可怜，她们若说出实情便活不了，只好保持沉默。极为残忍。”

一听说日本人便气上心头

他说他见到的日本兵是残兵败将。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败战之后，一群败走的日本兵，是毫无军纪、像盗贼一样的日本兵。

“我父亲在台湾长大，会说日语，被强迫当翻译。因此双亲的命有了保障，但店铺的货物大都被抢走。这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一谈起日本人便气上心头。”

在这个美国村，一谈起日本或日本人，村民便“气上心头”。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位前小学校长也是其中之一。幸亏他的朋友给笔者当翻译，他的怒气没有向笔者发泄。

“邻近村的村民，房屋被烧，有的妇女被强奸受刺激而自杀。这个村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抗日村。”

虽受日本军重大打击严重受害，可是这个村子还是进行了抵抗，故名“抗日村”。可以认为有政治的考虑，以至改变村名，他们把参加抗日的人们载入史册，把他们大无畏的精神告诉全国人民。可以看出这是为政者不许悲剧重演的英明决策。

再说一次，这一宝贵的经历是在 1997 年 1 月。这时正要

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这时两国的经济交流频繁，可是政治问题毫无进展。日本的历史认识继续刺激中国。1982 年的教科书审定问题，1985 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同样刺激了中国。1978 年把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成为侵略中国合法化的象征，因而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

1987 年 2 月光华寮判决案（大阪高等法院）司法当局承认两个中国，突出了台湾问题。这对中国对日本的对台政策的怀疑起了决定性作用。1996 年日美安保条约再定义，要进一步防卫台湾。

中国深知日本政府和司法当局的对台政策。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新闻电视先行知道，尤其是受过日本兵暴行的地区的人们以更尖锐的感觉认定日本“不承认历史，使侵略合法化，介入台湾问题”。

作为受害者当然会这样想，其愤怒的心情是理所当然的。

前小学校长石鸿钦对日本和日本人是这样评价的：

“的确，现在的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可是日本确实令人担心。日本应反省过去，贯彻和平主义，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否则，中国人绝对不会原谅日本。”

其夫人陈玉英待丈夫一说完便停止手中编织工作，她说，“这房子是日本军来时盖的住宅，所以没有毁坏。市内有公寓，而这家房子一直是这个样。”她说话语气温和，但显示了坚定的决心。

让过去的事过去而放眼未来，这种想法在日本人中占主流地位。中国人则不同：即使是负面遗产也不能一笔勾销，而要

重视，了解过去以开拓未来。

显然后者是正确的。掩盖过去可耻的历史事实，就可能重蹈覆辙。

日本说要正视历史，作为一个人有必要贯彻过去的承诺。由此迈出第一步。

此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高楼村。和别处一样，乡间的公共汽车早晨开出的车多，而晚上发车有限。不得已只好在翻译的亲戚一户农家过夜。

这是一户殷实的农家。我在中国农家住宿这是第一次，所以先谈谈趣事。农家主人叫林元桂（38岁）女主人叫张依雪（32岁）。他们夫妻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

这家不是常见的独门独户，是大杂院式两层楼住宅的一部分。按日本式的说法是，楼上是住家楼下是商店的房屋。这是现代农村的集体住宅。以前笔者曾在千叶县志野市的实籾县营住宅住过，形式一模一样。

这里的墙壁不一样，这里墙壁镶瓷砖，属上等。没有厕所，厕所建在另一栋大房子里，而且厕所里没有电灯，晚上若不带手电筒，初来者很不方便。

亲切的农家与爱打麻将

和蔼可亲的张依雪做的农家菜很可口，我吃得饱饱的，令人尴尬的是突然想上厕所，于是赶紧打开手电筒出了屋子。方便之后觉得一身轻松，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漆黑一团，手头的亮光便起了作用。

这时附近传来男人们的声音。我竖起耳朵听，像是在吵架。我想看热闹，于是朝有声音的地方走去。暗淡的电灯照亮了现场。大概是晚上八点，这是一家杂货铺，男人们围着麻将桌玩得开心以度时光。打麻将嘛多少要赌些钱，有赢有输，人难免有点兴奋。有时好像还打起来，不想让我遇上了这场面。两个中年农民站了起来，眼看就要扭打，这时年长的第三者介入劝阻。这一情景，在世界各地均可看到。

中国人爱打麻将远远超过日本人，恐怕是由于中国是麻将发源地的缘故。爱打麻将的人不仅是美国村和这个村子有，在东京工作的中国大使中，也有获得“麻将大使”外号的人。

当然，在日本政治家之中也有麻将爱好者。已去世的前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据说是“彻夜玩麻将而减寿的”。同样的，金丸信也很喜欢玩麻将，说是用以防老年痴呆。他大权在握时，其部下都蜂拥而来加入打麻将的行列，因为这是政界登龙门的捷径。

前首相竹下登也相当喜爱玩麻将，十多年前，众议院议长伊藤宗一郎吃惊地说，“在河口湖竹下别墅有两个电动式麻将桌。真厉害呀！”

自民党国会对策的一帮人一边打麻将一边“合法地”将大把的钱撒给在野党议员，以此作为第一任务。

这家的林元桂也很喜欢打麻将。在吃饭时我以为会一道喝酒抽烟，没想到刚吃完饭，饭桌就变成麻将桌。这天从福州来的亲戚祝健（小学副校长）也加入打麻将。

在楼下以主人林元桂为中心打麻将，在二楼的卧室，福州市干部和在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祝健的姐妹在开心地拉家常。平

时安静的农家，这一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问在二楼的张依雪，她对日本印象如何。新奇的是，她说“非常好”。我感到吃惊，问她是何原因。她说：“到日本去可以赚钱。你带我去罢。”她央求我，使我再次吃惊。

我急忙把日本经济严重衰退的现状以及被暴力团欺骗的中国妇女的现实情况告诉她，竭力加以制止。尽管这样，她继续说，“我只是干活，不卖身。我不睡觉多干活，只想赚钱。”

我问她的亲戚，她何以如此想不通，原来她丈夫出了交通事故，他丈夫是肇事者，不交罚款就要坐牢，这样一家将走投无路。原来有此伤心的背景。

如今蛇头很出名。为了赚钱人们凑巨款打算偷渡到日本，其中也有像张依雪那样命运多舛的妇女。对蛇头捞钱之狠她颇为吃惊，因而她对日本之行坚决说“不”。

我问，“这村子有多少农民成功地到达日本？”她回答说，“有四五个人，都是偷渡去的。这些人汇款回来，家里阔气起来了。这些都是男人。”

“目前，中国政府严密监视，日本也一样。容易去吗？”

“听说偷渡失败者为数不少。我丈夫的哥哥花了大笔钱，在上船之前就被当局逮捕啦。的确很严。”

正因为受到严厉取缔，她希望借助日本朋友的力量合法地前往日本。可是笔者无权无钱怎能答应。

人们感谢邓小平

幸好变了个话题，在福州市政府工作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干

部和教育委员会干部祝智丽和我聊了起来。碰巧这时电视放映邓小平的故事，这位农家主人退出麻将局，我问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如何。

“在电视上常看到邓小平。农民很感谢他，他是恩人。托经济改革的福，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贫困，邓小平当皇帝农民生活好起来了。”

在农村，邓小平颇受欢迎，知识分子也欢迎他。在中国 13 亿人口中农民占 8 亿。农民支持邓小平意味着 300 万人民解放军支持他，因为军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把邓小平称为“皇帝”令人吃惊。这是纯朴的农民感激之情的表现。

我问“受欢迎的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是谁？”福州市干部祝智敏说是“江泽民”。而市教育委员会干部祝智丽说“我喜欢乔石（当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比自己年轻的李鹏总理接替委员长职位没有意见，这一点很了不起。”

张依雪的母亲（祝智华）夸奖江泽民主席说，“他努力保持党的稳定，头脑灵。”三人各执一词给人印象深刻。这种自由活泼的政治评论颇有趣味。

我问身为农民的林元桂知不知道日本政府要人错误的发言。他是住在偏僻农村的农民，他如实地回答了我的提问。

“知道这事，但不知道是谁说的。我不是直接听到的，人们都在传，他们在否定历史。对此，中国人当然不答应。”

中国政府很警惕 13 亿人的反日感情，对媒体的报道也常常加以限制。因此老百姓是否很了解日中关系的现状值得怀

疑，于是我加以叮问，原来他略有所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报道国内外情况仍不够透明，但还是向人们报道的。

关于 1996 年两岸危机他当然很了解。他还说，“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关心的是生活。我的对象是农田，绝不赞成战争。若打起仗来，四川省的农民可以逃到山沟里，可是我们这里是平地，水田就在这里，我却不能耕种。总之不要打仗。”

这是中国农民的真实心情，这证明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

憎恨军国主义的日本

对于破坏和平的日本，尽管事过五十年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好。

“不但是农民，所有的中国人都憎恨过去的日本人。全体中国人都憎恨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小学副校长说的，而福州市教育委员会的干部补充说，“政府的干部们遵守政府的政策，发言是抽象的，可是谁也不真心喜欢日本人。大臣大放厥词和参拜靖国神社，使人想起过去的日本人。”

“你虽然是日本人，但你是中国人的朋友，所以对你说实话。这是在家里可以说得话，不足外传，这有点不符合政府方针。”

再说一次，日中关系是由日中联合声明（田中内阁）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福田内阁）规定的。可是日本方面的言行违反这两个文件，像每年的例行活动那样一再出现，叫中国人无法容忍，可是表面上还得一声不吭抑制愤怒。

笔者在中国农家成功地了解到中国人的心声、中国人的心情和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过去的日本和日本人，他们内心依然是怨恨的。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这样的表现。

“25年来，在中日友好的口号下人们重视日本人，许多日本人访问了中国，不少中国人去到日本，中国人眼里日本人的形象当然有了变化。”这也是真实情况。关于这一点，日本人应该感谢中国。

参观中国的小学，学校的墙上准挂着毛泽东、邓小平的大照片。我猜想是在彻底进行教育罢，而回答则令我意外。

“在农村学校仅仅是挂在那里，并不进行人物宣传。而城里的学校则会进行比较深入的教育。”

现在中国的政治教育大都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今天的中国与文革时期有天壤之别。

要找出不爱自己国家、祖国的人是很困难的，最近中国尤其致力于爱国教育。抓爱国教育是从1992年起，由江泽民主席主导。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可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江主席担心中国的文化、传统将消失，因而要加以制止。把爱国教育定位为精神文明的一个环节是明智的。

日本、美国、欧洲都提倡加强精神文明，但毫无成效。中国政府也在抓精神文明，这是势在必行的。

那位教育委员会干部说，“文革前的中国教育孩子讲礼貌。可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搞得一塌糊涂。当时批判孔子的教导，培养以自己为中心而不顾他人的思想，结果没有了礼节。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危机。”

中国人乘车蜂拥而上毫不讲礼节，可见文革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我母亲严格教育我。什么女孩不要大声说话啦，吃东西不要发出响声啦，托别人办事时，别人帮了忙要说谢谢啦，可是到了今天，乡下有些大人、小孩连这点都不会说。”

“而且，最近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把孩子当作太阳、月亮，娇生惯养。有人在街上随地吐痰。想改这毛病，很费劲。从这一点而言，加强精神文明就很有必要。”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是周恩来。尽管如此，文革使中国丧失了礼节，对此不能置若罔闻。福州市教育委员会干部叹息事出有因。要加强精神文明得投入加倍的力量。

在日本长时间以来讽刺青少年，什么豆芽菜孩子啦，过分呵护啦，考试机器啦。其实教育是当地社会的基础，江泽民领导的中国最先抓教育改革。

顺便我去看了一下祝健副校长所在的福州市的一所小学。校舍是三层建筑，一个班约有 40 个孩子。五、六年级学生个子大，像大人一样高的孩子相当多。

上午约 10 点钟，休息的铃声响了。我以为孩子们会到院子里玩，可是有孩子食分发的东西。大桶里装着猪骨味的福州面，由值班的孩子用长柄杓舀到大家带来的大杯里，那个孩子舀时漫不经心，美味的汤和面洒落到地板上。

战败后的日本儿童从同样的桶里把脱脂奶粉倒到小杯里，用以补钙。福州市小学的分食没有贫困、悲惨的气氛，是丰衣足食时代的气氛。

我要求祝健副校长让我看看高年级的历史教科书。里面记

述着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但没有南京大屠杀和 731 部队。

日本兵用刺刀戳阴户

祝健副校长向我介绍他姐夫张岁奎。他原来是解放军士兵，后来当福州市干部，现在退休后悠闲度日。最近他花巨款买下市干部用住房，住房内部装修得很漂亮，如同日本高级公寓。

木制的床涂上漆属高级用品，此房屋属大款住宅之类。庄重协调的住宅位于福州市中心。张岁奎身材魁梧，身高一米八以上。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

他是江苏省人。该省省会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多朝是首都。“5 岁时的事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向我谈了往事。

“1941 年我 5 岁，即发生南京大屠杀后的四年。日本兵实行三光政策把农村房屋点着，那时我穿一条短裤从火灾中死里逃生。房子被烧，连一根筷子都没留下。”

所谓三光政策是日本兵实施的残酷的不人道战术，即烧光、抢光、杀光。

“幼年时，我住在江苏省贫穷的农村，家里有双亲和妹妹，一共四个人。我被寄养到亲戚家，他们到上海打工而幸免于难。从 1939 年到 1941 年，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施暴。房屋被烧后，我到祖母家生活到 8 岁。当时，日本军要国民党军参加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扫荡战。游击队晚上活动，日本军白天到村子里活动，晚上撤回阵地。日本兵一来，农民急忙牵着牛带着鸡逃走，留下的是老人、年轻人和孩子躲在远处。即使这样，抢粮食，抓女人的事频频发生。”

张岁奎幼年时亲眼看到共产党游击队在江苏农村日益活跃。日本军扫荡时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但他们只是在白天行动，到了晚上共产党游击队就掌握了主导权。

“我亲眼见过日本兵强奸妇女的场面。在光天化日下，在大庭广众前脱裤子强奸妇女，对反抗的妇女，就用刺刀戳其阴户，惨无人道。”

“1952年我志愿当人民解放军，幼年时不幸的回忆是我去当兵的动机。幼年时没有粮食吃，靠吃猪食活下来。”

5岁时充满恐怖的异常经历使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日本侵略军使中国青年走上了从军的道路。在400万（现为300万）解放军士兵中，怀着像张岁奎那样的动机而入伍者为数不少。

我问他，“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你的心情如何？”他回答说，“那时我是解放军，知道两国邦交正常化。作为军人必须支持政府的方针，可是作为我个人来说，心情是复杂的。”

作为军队干部当然应服从党的方针，可是张岁奎幼年时体验过旧日本兵的胡作非为，他心理总是觉得不痛快，这是理所当然的。

邦交正常化已经25年，时至今日仍然留下尾巴。

“日本的尖端技术很了不起，我予以高度评价。日本战后复兴也搞得好。教育和科学技术相关，其发展速度惊人。一般而言，日本国民对中国友好，有礼貌，我喜欢这样的日本人。但有一点日本人上当了，那就是日本的历史教育，文部省搞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如实地把过去告诉本国人民，这一点极不负责任。对此，中国人不能理解。”

这位前福州市干部张岁奎经深思后作了评论。一方面高度评价日本，另一方面对日本的历史教育，他断言说“是错误的”。

原来与人民解放军有关系的福州市干部陈霖官称，大陆与台湾发生武力冲突‘不可能’。关于 1996 年大陆的导弹军事演习，他分析说，“只是想李登辉政权看看中国的军事水平，而台湾与美国、日本有武器销售关系。”他对日美的对台政策（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分析是深刻的。

第二章 鲜为人知的南京的真实情况

桥本首相（当时）1997年秋访华，曾一度想访问南京，由于周围人的反对，最后是作罢了。于是笔者和二松学舍大学教授多田实、日本记者俱乐部事务局的岩崎玄道部长一道访问了南京。9月的南京还热得很。

参拜靖国神社真让人讨厌

江苏省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陈人羽在南京一流的饭店金陵饭店设晚宴招待我们。他是记者出身，很会说话，可是滴酒不沾。

中国的情况也在变。听说以前酒量不大的共产党员升不了官，可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情况变了，不是看你酒量而是看你业绩，不抽烟而动脑子的人受好评。

陈人羽不饮酒却向客人讲授绍兴酒的喝法。“加点梅干好喝，”他做了示范。

好喝酒的多田实说“的确好喝”。岩崎部长也有同感，当然不怎么喝酒的笔者也没有不同意见。终于酒上了劲，我们个个满脸通红。

中国的梅干与日本盐腌的梅子不同，是用糖制的。台湾是用冰糖，大陆用白糖，二者有差别。

陈人羽向我们敬酒，我问他何以要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回答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关心精神文明建设，其中之一是强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为对青年人进行历史教育因而修建纪念馆。”

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史上最悲惨耻辱的一页。不能让这种灾难再次发生，是当今中国为政者的坚定信念。

可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西方文化打开了窗户，这可能给过去封闭的中国的精神文化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中国当局强调精神文明的原因就在此。

对受拜金主义严重影响的青年人，应让他们知道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历史教育以制止其精神颓废，陈人羽所要说的恐怕就是这一点，由此可见中国当局是清醒的。

南京有孙文墓（中山陵），到此的游客络绎不绝。每年南京的游客 800 万，有一半去晋谒中山陵。中山陵是南京旅游胜地之一。

据江苏省人士称，1996 年访问南京的外国人 85 万，其中日本人 22 万，台湾人十多万，台湾来的游客几乎都晋谒中山陵。

“199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时很重视孙文。江泽民在演说中提到中国近代三大领导人孙文、毛泽东、邓小平，而最先提到的是孙文。”

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信赖、尊敬孙文。这说明孙文是伟大的。

江苏省是中国的粮仓地带。桥本龙太郎首相（当时）曾打算访问南京，可是没有付诸实施，我问江苏省干部对此有何感想。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右翼反对，他语言不多但表示理解。他与多数中国人一样考虑问题是稳健的，但他绝不说“不到南京来的日本首相是失职的”。

当然并不是说 1996 年 7 月桥本参拜靖国神社是可以原谅的。谈到这里，他的态度突然改变。

“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让人讨厌。这是个敏感问题，中国人民忍无可忍。领土、台湾问题也是敏感问题。”

多田教授说有同感，笔者也有同感。多田教授尖锐指出，“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中国对日本有必要盯死，否则将来危险。”他担心若日中双方态度暧昧，将来会留下祸根。作为一个有过被强迫动员学生的经历者，他的忠告是纯真的。

首相中止访问南京令人遗憾

中秋节过后不久，1997 年 9 月 17 日的晚上，一轮明月升空。晚上过了 9 点我们前往有南京不夜城之称的夫子庙，这也是陈人羽安排的。

在隋朝实施科举制度，这是录用官僚的方法。到了明朝，参加科举应试的人大举拥向成为首都的南京，接待他们的旅馆和妓院自然连成一排，这就是夫子庙。可想而知，这里曾是悲喜剧的产生地。

这里有不少身无分文而饿死的不幸的年轻人。迷恋妓院而

名落孙山者亦不计其数。在一贫如洗的年轻人中，也有人沦为盗贼，不沾染恶习的正派人会沦为乞丐。因名落孙山而与权势抗争的学者、文化人、诗人辈出，其中有小说家。

清朝把明朝推翻后，学会了演技的明朝大官的女儿们被卖到妓院，在这里发生的恋爱悲剧成了小说家的题材。夫子庙还是音乐、文化和艺术的场所。据说也有 70 岁才考取科举者。

这些事详细记载在《儒林外史》里流传至今。听说有这样的事，唐朝诗人李白，在夫子庙文道桥赏月，喝醉了酒想捞取倒映水中的明月而掉进河里，这是他死亡的原因。

如今的夫子庙是南京青年人的街道，相当于日本的新宿、涩谷，肯德基的炸鸡很吸引他们。聚集于摊位边的情侣情意绵绵。

我们向江苏省政府提出希望南京大学历史教授给我们介绍情况。9月 18 日上午八点半之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高兴祖教授来到宾馆。

他和陈人羽一样，对桥本首相未到南京访问感到“遗憾”、沮丧。他淡淡地谈起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可是 1894 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不但是中国人受害，日本国民也蒙受重大损失。今天的中日友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失败的结果，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好事。对亚洲和世界和平而言 中日友好是幸事。”

坦率、稳健的历史学者的口吻给人以好感。可是另一方面，他似乎忍无可忍谈到最近日本国内出现的可疑动向。

“日本国内有一些人在美化战争，肯定侵略战争，这样的

人还成了政府的要人。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在日本政府里有人不承认慰安妇问题，不是由政府提供补偿而是想用民间捐赠来补偿。”

对石原慎太郎（现任东京都知事）等右翼政治家和永野茂门法务相（羽田内阁）等旧军人出身者的发言，他要求赔偿。日本政府不打算由国家给从军慰安妇提供补偿而交由民间去办，对此他也表示反对。

他对日本的担心不只是这些。他说，“在靖国神社的参拜者里，包括许多政府要人（阁僚）和国会议员。最近倾向自由主义史观的言论表面化，这些言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刺激了受害者的感情。”

的确从几年前开始，右派报纸突然把东大教授搬出来掀起使战前合法化的运动，右翼出版社陆续出版自由主义史观的书籍。南京大学教授受到参拜靖国神社者的冲击而向我们倾诉。他继续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在扩大到亚洲，对此，中国和亚洲各国都在提高警惕，对此我也非常关心。这难道有助于同亚洲的友好？”

被外务省官僚操纵的桥本内阁和如同美国军工产业体制的机器人一样的克林顿政府，1996年4月签订日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声明，号召加强和扩大日美安保合作，为使之具体化制定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一言以蔽之，这是遏制中国的政策，是延伸冷战结构的危险的产物。高兴祖教授对它击了一猛掌。

拉贝日记是珍贵资料

高兴祖教授进而谈到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前德国纳粹党员约翰·拉贝的日记。

“拉贝日记的出现，大大打击了日本右翼的动向。日记告诉人们，日本右翼的行动不利于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友好。”

“拉贝日记中文版 50 万字，插入照片 100 张。这本拉贝日记是一个美国人发现的，日记的原稿在纽约公开刊登。中国江苏省人民政府购买其版权，用四个月时间翻译出来。”

这本拉贝日记日本讲谈社也把它翻译出版（名为《南京的真实情况》），自那之后，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石原、永野的反论便听不到了。所以说拉贝日记是宝贵的史料。

中国人对德国的评价很高。

“与日本政府不同，德国政府对过去的态度是明确的。德国政府向犹太人谢罪，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追查纳粹的余党。还制定法律，花巨额资金处理纳粹遗留的问题。因而世界认为德国政府是可信赖的政府，可是日本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点上，人们产生疑问，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高教授称赞德国人的勇气，杀了个回马枪对日本人提出疑问。“日本人究竟怎么啦？”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朴实的疑虑。

“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人员，在中国生活了 30 年，对中国人有好感。虽然日本军队侵略了南京，他仍不想离开南京。当时由 15 个外国人（德国、美国、英国、丹麦）组织了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南京沦陷之前，接到南京政府通知的英国人、丹麦人回国了，可是拉贝和美国人留到最后。当时尚未发生太平洋战争，美国是中立的，而日德缔结了防卫协定是同盟关系。”

“拉贝日记从 1937 年 9 月写到 1938 年 2 月，这时是南京大屠杀最残酷的时期。我认为这是第一流的资料。因为在大屠杀时期，拉贝直接目击了侵略军暴行。拉贝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记下了日军暴行。”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国际安全区（3.86 平方公里）里，日军绑架杀死青年妇女，进入安全区对许多妇女施暴，还抢劫财物。”

“关于屠杀的具体记述在 400 页以上。拉贝的轿车被日军抢走，日军忽视纳粹旗帜，他的记述不是谎言。他虽是日本同盟国德国纳粹党员，但指出了侵略军的暴行。拉贝日记作为德国的历史文献是完美的。”

“1946 年远东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时，当时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送交德国政府的报告书曾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罗森关于南京事件的记录共 194 页，而拉贝日记却有 2400 页。在罗森报告里称日本军、皇军是大屠杀的机器，正在运转的野兽的机器。南京事件是有计划的恐怖事件，日军想通过此举征服中国 这是问题的核心。”

高兴祖教授向我们说明了拉贝日记的概要和真实情况。

“拉贝居于正义的立场、人权的立场尽力救助难民，他是南京的辛德勒。”他是这样称赞拉贝的。

多田教授问这位南京大学教授，“日军何以要杀死数十万人？”

“原因有几个。他们教育说日本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具有选民思想，认为杀死劣等民族无所谓。关东军中一位姓田中的军官对记者说，‘你以为中国人是人，我认为中国人是猪，怎么对待都行。’关于军国主义教育，当时一位日本兵作证说，‘教育我们说中国人是蝼蚁，杀死小虫无所谓。’侵入南京的一位叫中岛的师长对陆军人事部的人说，‘多杀支那人的士兵是优秀士兵。’认为不杀中国人则不能称为军人，这种想法成为日本政府的国策。”对于突如其来的提问，高兴祖教授列举具体事例一口气予以回答。

南京大屠杀

在中国，把这次屠杀称为南京大屠杀。这包含有杀人像杀死蝼蚁、动物那样的意思。

笔者问：“当时南京人口是多少？”对方回答说：“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时，南京市民在百万以上。一说是101万，一说是107万。后来，由于日军入侵，许多人逃离南京。据1937年11月中国内政部的调查是50万。美国人史密斯说，1937年11月中旬南京有市民50万，士兵12万。拉贝日记没有详细提到人口，但谈到在国际安全区里有20万难民。在中山门城外和长江岸边进行集体屠杀，拉贝不能靠近这些地方。”

“远东军事法庭说在6星期里杀害了20万人。实际上在20万以上，中国的调查是30万以上。有许多证明资料，光是慈善协会埋葬的遗体就达22万。这是特定的男女分开的场所，

是铁的证据。另外，日军处理了 800 名俘虏的遗体。仅此一项处理了 10 万具以上的遗体，其他部队处理了 5 万具以上的遗体。慈善协会的统计和日军隐瞒的遗体加起来超过 30 万人。本来，10 万人就是大屠杀，20 万人更是大屠杀。1984 年我们得到了 1700 名幸存者的证言。”

高兴祖是南京大学历史教授，也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他毕生精力用于查明历史上罕见的悲惨的屠杀真相，他的发言分量很重。

旧日军留下的珍贵照片、幸存者的证言、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传教士的证言记录，再加上新增加的纳粹党员约翰·拉贝日记，证明材料堆集如山。

在此基础上，这位坦率的南京大学教授向日本记者说明了概况。他说话时感情不露于形表现了学者的淡泊和真实，但其中包含着千斤重量。

在日本国内，战争肯定派和右派记者称，“南京有没有 30 万人还是个问题”“没有杀 30 万人”。别有用心的反驳为数不少。这些不能正视历史的人们，首先不妨访问一下南京。

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参加占领南京的前日本兵至今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正是承认大屠杀的有力证据吗？

到南京访问的日本人，首先可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遗憾的是，实际上到这里来的日本人不多。

中国方面称“也许有伤日本游客的情绪”这种担心出乎意外。就笔者而言，知道有这个纪念馆完全出于偶然。

高知县南国市的高桥正兴（千屋崎医院院长）计划率领十

多位同事到中国旅行，请中国青年报记者徐启新（现文汇报东京分社社长）做向导，这是 1989 年 5 月底的事。

乘夜行列车由北京去南京。在早晨睡眠惺松时过了长江，不知为什么总有点感慨。当时的笔者和多数日本人一样，关于南京大屠杀没有掌握什么像样的知识和情报。

应邀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让人屏息。日军暴行非笔墨所能形容，真是让人“吓破了胆”，受到了可怕的刺激。

日本老人拒不承认历史事实

南京国际旅行社一位女导游的一席话也让人吃惊。她发牢骚说，“到此参观 不少日本老人不乐意。”不少日本男人否认历史事实，我们颇受刺激。”“学校的老师也不愿参观纪念馆 实在可悲。”一到了 8 月气氛便紧张起来，日本方面的导游够呛。”

对作为专门采访永田町（国会）的记者的笔者来说，参观此纪念馆相当于政治家常说的一句话——“晴天霹雳”。在永田町右翼政治家、反共政治家的确不少，我总觉得他们害怕这种纪念馆。我满以为一般人民群众不一样，因而受到如同雷击般的震惊。

上了岁数的前日本军人拒不承认历史事实，令人难以置信。对侵略行为不谢罪不赔偿的众多的前日本军人的存在，不仅对亚洲各国人民，对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来说是一种威胁。战后过了 50 年还不能从军国主义（皇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这些前军人来说怎能嘲笑奥姆真理教的精神控制。

记得回国后我立即向宇都宫德马先生报告。宇都宫先生把神奈川县大和市的住宅土地卖掉，用所得款项出版日本唯一的裁军专刊杂志“裁军问题资料”。宇都宫先生才是日本可夸耀的和平裁军派的巨头。宇都宫听了笔者的报告，当即要我“把它写出来”，并把笔者的南京报告刊登在该杂志上。当时一般人几乎不知道有个大屠杀纪念馆。如今在永田町几乎找不到像宇都宫先生那样把全部热情倾注到和平运动上的政治家，这正是日本的不幸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不信任的根源所在。

几年后，我随同四五名日本记者再次访问南京。这次旅行全是以观光为主，笔者强烈提出把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列入日程，终于得以实现。可是大报的编辑态度不积极。

这时，江苏省干部把日文的地图送给我们，可是不知何故地图上没有标明大屠杀纪念馆。“这不对，希望务必标上，以便让更多的日本游客去参观，”而强烈提出要求的只有我和《每日新闻》编辑委员两人。

由此看来，失去常态的不只是旧日本兵，在新闻记者中也很可能有些奇怪的人。这些人神气活现地说：为何要“揭旧疮疤”。

持这样的态度无法和 13 亿中国人搞好关系，不可能取得信赖。不与中国人建立信赖关系，日本的 21 世纪能有前途吗？日本新闻记者连普通常识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威胁。

日本人应该到南京去看看，冷静地面对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把永远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牢牢地刻在脑里，这样便可以彻底省悟战争之愚蠢，可以感受到宪法第 9 条（放弃战争）之英明。这样一来，中国人一定会拥抱贯彻和平主义的日本人，

这是笔者的坚定信念。战后 50 年的 1995 年，笔者邀了 50 位同事，身穿写有宪法第 9 条的衬衣去访问大屠杀纪念馆，原因也就在此。

此举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完全是人道主义。这是有人性的普通日本人极为自然的行动。若有人对此不能理解，可以说此人是有恶魔心肠的鬼。

这次(1997 年 9 月) 访问南京，笔者等人事前向南京当局提出，希望务必见一见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和幸存者，幸运的是如愿以偿。作为幸存者上报的，是头次上报的 70 岁的常志强。这是江苏省旅游局张孝君副处长和大屠杀纪念馆刘军副主任努力的结果。

在金陵饭店听了南京大学教授高兴祖的宝贵的情况介绍之后，我和多田实、岩崎玄道两人一同访问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见到了幸存者。这是我第四次访问纪念馆。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张剑副部长给我们当翻译。这是 1997 年 9 月 18 日上午十点多的事。

会见幸存者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 1995 年我和 50 位同事访问大屠杀纪念馆时。在我们一行 50 人中，有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前日本兵，这时在纪念馆内出现了日中两国幸存者手拉手诉说和平之重要的戏剧性场面。不言而喻其场面是动人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幸存者证言

读者要知道，把过去可怕的不幸事实告诉别人，对当事人而言将伴随不可估量的痛苦。新闻记者这一职业只是热衷于抓

真实材料而往往轻视对方的内心世界。

记得是 1997 年 1 月的事情。我向在福建省福州市认识的前中学校长祝丕业（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采访上海事变之后，他感冒病倒了。原因是向日本记者谈了想忘掉的五十多年前不幸的过去，因而他极其痛苦的记忆阵阵浮上心头精神亢奋夜不成眠不思饮食。让中国老年人想起日军的暴行而且要他们谈出来，会使他们减寿。

有过不幸经历的人总想忘记它，回避它，只有好不容易才忘却不幸经历的人才能活到今天。忘记过去才能寄希望于未来。揭开过去痛苦的盖子，恐怖的悲剧重现眼前，不免整个神经紧张，这会导致精神异常，若非有勇气的人，要他谈过去是难以办到的。

话可能有点不顺耳，即使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要大屠杀的幸存者谈惨绝人寰的过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战后 50 多年的长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的常志强终于说话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彬彬有礼地获得了听取的机会。战后 50 年（1995 年）日本为政者的态度促使他下决心跑到大屠杀纪念馆去谈他过去的遭遇。刘军副主任把他介绍给我们。

这位小个子的幸存者身穿白衬衣。一头白发整整齐齐地二八分开。也许他干的是农活，皮肤晒成棕色。常志强充分表现出一付忠厚老实的老年农民的模样。

“我在 1997 年）七八月偶然看到日本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报道，吓了一跳。南京市民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巨大灾难，日本国民也受害，于是我把我的痛苦经历写出

来献给纪念馆。我说给儿女们听，我不要战争，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

他一边回忆一边说。要知道，在事前中国的一般市民未必很好地看报，日本也一样。中国的报纸很少详细报道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可是从 1995 年 8 月以后似乎报道多了起来。

原因之一是，战后 50 年日本国会的决议刺激了中国人。1996 年 7 月桥本首相（当时）参拜靖国神社使整个中国紧张起来，驻东京中国记者的关心集中于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个原因。

使常志强鼓起勇气谈过去，正是由于日本阁僚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他没有忘记告诫一番，“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因此请务必把历史事实告诉日本国民。”

下面介绍的是他生动的证言。用拉贝日记加以若干诠释。

父母兄弟被杀害

1937 年 12 月，我们一家十口有七人被杀害。当时我是十岁的孩子。我们家里有父母、祖母、曾祖母和六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四个弟弟，父亲经营香烟等杂货以维持生活。1937 年 8 月到 10 月，日军的空袭越来越厉害，老百姓住的街道受害最严重。母亲曾带我去看遭受空袭的地区，许多市民被炸死，因燃烧弹烧了房子丧命的市民不计其数。

德国纳粹党员西门子公司职员约翰·拉贝从山东省济南旅行归来的那天是 1937 年 9 月 7 日。21 日他的日记写道“有钱的中国人早已乘船往汉口方面去避难。在像样的农场、像样的

院子以及公共广场和马路上，人们用大车轮建立防空洞。”
(《南京的真实情况》；讲谈社版。)

随着空袭加剧，有钱人家纷纷逃到内地。有一天曾祖母对父亲说，“我年纪老迈，走不动了，没法逃了，听天由命罢。可是你们还有前途，逃到安全区去罢。”

据拉贝日记称，国际委员会成立于 11 月 9 日。他在 25 日的日记上感叹地写道“医生不够”，说遭受空袭的伤害，医院的工作远远跟不上。南京国际安全区将于 11 月底组成，由德国、英国、美国、丹麦十五人组成的国际安全区成员名单写在 11 月 30 日的日记上。看来常志强的曾祖母催促孙子——常志强的父亲逃难是 1937 年 12 月上旬的事。

我祖父和曾祖母两人留在家里，父母带着姐姐、我和四个弟弟逃到难民区（安全区）。

逃往难民区的市民人山人海，路上全是人。父亲拉着我们的手拼命往前走。

黄昏时分，终于到达内桥这个地方，国民党的军队守卫在那里。父亲恳求说，“请放我们过去罢”，守军回答说，“今天关闭不能通行，”拒绝了要求。父亲再次低头要求，“午饭我们都没吃上，又冷，请帮帮忙，”还是不行。守军恐吓说，“你们要是往前走我就开枪。”把母亲吓了一跳。

无奈我们在王府园躲了一夜。周围的人在嘀咕：“天黑下来了，今天就在此休息，明天进安全区罢。”这成了命运的分水岭。

我又冷又饿，终于病倒了。我勉励自己说到了安全区就有吃的，熬过了一夜。

拉贝日记 12 月 12 日下午六点半是这样描写当时情况的：“紫金山的大炮不断轰鸣”，从南边逃来的人通过安全区急忙往家走。随后中国的部队络绎不绝……可以看出，这支部队在中华门或光华门受到重创，慌慌张张地逃到这里。12 月 13 日的日记写道，“日军昨晚占领了几个城门，但尚未侵入城里。到街上转转便可知受害者众多，每隔一二百米摆着尸体，一查看，市民背部受枪击而死，大概是想逃走背后受到枪击。日军一二十人一组行进，不断进行抢劫。若非亲眼所见，其情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下面是常志强的证言，是 12 月 12 日或 13 日的事。

第二天早晨，从中华门和中山门方面传来日军的大炮声。母亲担心出事，经过王府园的小道，把弟弟们带到防空洞。我生病寸步难行，父亲把我背进防空洞。

过了一些时候，周围平静了，炮声停了，难民陆续从防空洞爬出来。在难民人群里谁都在说“南京沦陷了，日军进城了”。

枪口和军刀指向市民

果然，从中华门方面传来叫声。过了一会我们躲藏的防空洞也来了一队日本兵。日本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不断向难民开枪，市民应声相继倒下，在我眼前的人成了日本兵的牺牲品。突然出现屠杀，周围遍地鲜血变成了地狱。

发高烧的我精疲力尽如同死人，半醒半睡地看到了只有在虚构的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地狱的悲惨场面，感到心胸像是冻僵

了。

回想起来，其场面令人不寒而栗。枪声一响人们一个个倒下，死了不少人。在我躺下近处的一个女孩拼命奔逃，被日军士兵用刀砍，鲜血飞溅。想去救这女孩的母亲头被砍下，仰面朝天倒下死了。

被日本兵杀死的不是中国士兵，是普通市民、是女孩们，日本士兵的枪口和军刀向着她们。拉贝日记里没有写这种活生生的场面。常志强高烧做恶梦躺在那里像死人一样反而无事，但是看到这场面忽然大声叫起来。常志强不停地使翻译张剑感到为难。像被拦住的湖水突然奔向河川一样，他把埋藏在心中的一切第一次向日本人倾诉时，往事一件接一件不停地喷发出来。

一个日本兵把周围的难民开枪打死，大砍大杀后，叉开两腿站在我母亲面前。母亲紧紧抱住最小的弟弟，这个日本兵用军刀砍这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母子。

军刀砍到母亲肩上，被两手抱住的弟弟掉到地上。母亲被刀砍还想抱起幼子，这时刺刀刺到可怜的弟弟身上，轻轻地挑起来在空中舞了一下便抛到别处。弟弟被刺死扔掉。

母亲哭叫，然而军刀无情地向她砍来，她用两手抵抗，其他三个弟弟哇地大哭起来向狂乱的母亲靠拢。日本兵的军刀毫无人性地夺去了三个弟弟的生命。

常志强边哭边说，这就是人间地狱。即使在战争期间，人类社会不该也不容许出现这样的事情，夺去并未进行抵抗的女人孩子的生命，对这样的军人，国际法是不允许的。可是实际上日本侵略军就这样干了。杀死妇女儿童日本兵，其后的人

生是怎样度过的？至今，他们依然沉默不语。可是这样做不能掩饰历史。

我四个弟弟被杀，姐姐也受了伤。姐姐想用自己小小的背部保护母亲，刺刀从背后刺来，她又倒在地上，日本兵上前抓住倒在地上的姐姐的头发往地上撞。我眼见弟弟死去和姐姐被刺，受刺激而昏死过去。

我生病又没有任何东西吃。过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觉得头痛。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倒在地上的姐姐发出细小而痛苦的声音向母亲身旁爬去。

我也竭尽全力向母亲身边爬去，呼唤母亲。可是母亲被吓得说不出话。我看到母亲用眼睛指示什么，满身是血本该死去的弟弟又微微喘起气来，母亲用目光示意把那个弟弟带过来。我用尽全身气力把弟弟拖到母亲身旁。

翻译张剑因悲痛而说不出话，翻译这样的悲剧恐怕是第一次，做笔记也痛苦。这时我连“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有几个日本兵”之类通常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常志强说，张剑翻译，我们三个日本记者拼命记。

母亲开始给小弟弟喂奶。母亲的背部被鲜血染红，全身是血的母亲奄奄一息。过了一会，母亲倒下像是死了。我以为母亲死了，便开始找寻父亲。

常志强脸上乱糟糟的，他这时已是涕泪横流，但仍强忍着往下说。

日本兵强奸 11 岁的姐姐

时值寒冬，父亲穿上厚厚的棉衣，他以为这样一来即使被子弹打中也可以用手指把子弹抠出来。父亲倒下脸蹭到路上，爬起来又仰面倒下，周身是血已经断气。

我大哭起来。只有哭别无他法。周围尸体成山，这时已看不到日本兵，他们以为把这里的难民全杀了，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幸免于难的是生病的我和受伤的姐姐二人。我把父亲已死的事情告诉她。

日本兵从南方来向北方去。姐姐背部五处负伤不能行动，她对我说：“把我带到一个人家去罢。”我把她带到我们不认识的近处的人家去，把她藏到这家的床下。

第二天早上，一个妇女带一个 4 岁的女孩回到家中。她看到我们正在哭泣。她到这里来是寻找下落不明的丈夫。我哀求道：“我们父母被杀死了，帮帮我们罢。”

她是个善良的人，把我和姐姐带到在附近的她的家去，她给姐姐准备了替换的衣服。换衣服时，姐姐的背部血凝固住了。她家里有许多京剧服装，她丈夫是京剧演员。

她待人亲切，给肚子空空的我们准备了膳食。这时日本兵又冲了进来，强奸了这位妇女和我姐姐。背部满是伤口的姐姐发出悲痛的呻吟声，情景十分悲惨语言难以形容。

他说不下去了。情景何等悲惨！日本兵胡作非为畜牲不如，强奸 11 岁女孩的日本兵真不是东西，其作为现代人是无法理解的。

日本兵施暴、抢劫后放火烧房子。何以要烧房子，当时我们一无所知。这位京剧演员的妻子在烧房之前便叫道，“赶快跑呀！”于是我背上已不能动弹的姐姐拼命地跟在这位妇女后面走。

好不容易我们到了安全区，路上还经过父母被害的地方。我满以为最小的弟弟已死，谁知他还活着，正在哭泣。我想救出弟弟。

刚刚受日本兵强奸的这位妇女说，“不快点走，日本兵还会回来。那时你姐姐的命就保不住了！”她催我走，我只好抛下弟弟。

当时他应该停下来帮助弟弟，至今常志强依然被悔恨之情缠绕。大概是想到这一点，他的眼泪止不住顺着两颊流下来，他再次语塞，翻译也是一样。

好不容易才到达安全区，人口处是成堆的难民，大门紧闭。日本兵挥舞军刀，把妇女拉到长江边强奸。

安全区里满是市民，女人很多，我把姐姐带到安全区的一家屋檐下让她躺下。这家里住着一位姓蒋的青年，他问，“你们的父母怎么啦？”我说“被杀死了。”他很同情我们，他把我们领上二楼，给姐姐替换衣服，让我们吃粥。那天晚上很冷，我们两手都冻僵了。

过了两三天，日本兵拥进安全区，把女的带走组织慰安队。他们还把女的男的、年长者和年轻人分开，任意给人扣上国民党帽子带走。丈夫是国民党，妻子也被无情地带走。后来，这些被带走的人都被集体屠杀了，听说一次杀几千人，许多普通市民牺牲了。

12月16日拉贝日记写道，“安全区外的商店家家被抢劫。日本兵不但抢劫，还强奸、杀人，在安全区里也胡作非为。”惊愕的拉贝作为安全区代表对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福田笃泰抗议说，“日本兵昨天在安全区胡作非为，在难民间引起恐慌，人们的恐怖感越来越严重。”顺便说一句，战后福田当了自民党国会议员，并历任大臣。外务官僚品质之恶劣与军阀一个样。12月17日拉贝日记写道，“两个日本兵想爬墙过来”，“有个美国人说安全区成了日本兵的妓馆”。这与常志强的证言大体一致。

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在难民区（安全区），到了晚上人们思念父母必定大哭一场。常志强忘不了尚有一口气的弟弟，每天晚上他都在想，如果安全区的大门打开，他可以出去救助。他老是两手合十祈愿大门打开。

安全区的大门一打开，我和姐姐便一溜烟地跑回曾祖母和祖母家，两位老人平安无事。我说父母和弟弟们都死了，祖母命令我“把遗体找回来”。

到了遇难现场，遗体当然没有了。慈善协会、红十字会把他们埋了，找不到了。

说到这里常志强还是抽泣。父母和弟弟们被害，六个人的遗体不知去向，这种可怕的不幸的事件本不应发生。如果是遇上自然灾害尚情有可原，可是竟是被侵略军杀死。

这时，他谈起人世间可悲的事情：“听人说吃奶的孩子坐

在已死去母亲的身旁，哭叫不停，流下的鼻涕淌到母亲背上冻住了。可是一想起母亲和弟弟当时的情景，我马上就明白了。”

听祖母说，日本兵也闯进我家。嚷嚷“家里有没有姑娘？”把家搜了一遍。没找到姑娘，日本兵生气使劲地踩祖母的小脚。祖母的脚受伤而不能走路。

好不容易才活过来的姐姐，1944年得了严重的怪病去世了。姐姐去割烧火用的干草时，碰上日本飞机投下雾状的东西。在我们家附近有日军的飞机场，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细菌武器的食饵，当时因同样的病死了许多市民。

当时她发一星期高烧，喝了大量的水，死亡时身上出现红斑点，明显这是细菌武器造成的。不但是姐姐，还死了许多年轻人。听说这种悲惨的事，我也很难受，因此我不愿再去想它。大屠杀纪念馆建成之后我去看了一次，回到家里心情一直不好，我发誓再不去想它。

回想起来不胜悲愤。我想，把这事告诉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只我一人知道就行了，我不想对任何人说。可是听说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为了不再犯错误我改变了想法，我鼓起勇气决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来。

常志强最后说，请把这事告诉日本人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携起手来永远友好。

第三章 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告

不诚实的日本政治家

1997年5月，我应邀参加青岛大学举办的以“东北亚经济展望”为题的研讨会。偶然再次见到在北京仅见过一面的宋宁先生。为写拙著《中国的大警告》在北京对宋先生进行过采访，那时他对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快之感。他的话十分正确。

正当年的宋宁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个很坦率、给人以好感的高级官员。我们在青岛的会见是在他住宿的黄海饭店的茶室。晚上八点多茶室灯火暗淡。

他的观点明确使日本记者十分敬佩。

“说实在的，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可是在应是顶梁柱的日本，有些不诚实的政治家惹是生非。日本若以中国为敌，21世纪的亚洲将是悲惨的。最后亚洲任何国家都繁荣不起来，惟一受益者将是美国。”

他的谈话预见到了始于泰国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引起了今天亚洲地地道道的危机，受益者仅美国一家。宋宁先生的预言说对了，笔者也同意他的分析。

“美国在暗中操纵亚洲国家的政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就是其例，但是美国没有打赢。至今美国常常在亚洲制造麻烦。”

他说的麻烦是指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美国一方面和中国搞邦交正常化，一方面又搞台湾关系法（1999年4月生效，为期20年），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令中国人忍无可忍。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旨在遏制中国，更令中国人感到愤怒。

“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存在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日本并不重要，因而美国不会认真考虑日本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他完全道出了日美关系的本质，他的话击中了要害，笔者在美国采访时亦有此感。许多美国人对日本不关心，不介意。与安保、外交、贸易有关的美国官员还可以，而一般的美国人几乎不关心日本。

“美国重视日本”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的话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却信以为真，可笑之至。

“美国介入亚洲只是为谋求美国的利益，根本不是为了亚洲。这样一来，亚洲人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

“没有真正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一样。中国的精英断言，“只要日本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宋宁何以要突出美国问题，是由于1996年4月的日美安保再定义，也就是笔者所说的1996年的日美安保问题。日本在去年基于1996年的安保再定义，使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具体化，出现了周边事态法案。这一法案提上了1998年秋临时

国会、1999 年通常国会的日程。

在这一潮流中竭尽全力的是梶山静六等台湾帮。知道这一事实，他受到多大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危险的日美安保再定义

他深知美国外交的本质。

“日美安保再定义，是美国为了易于控制 21 世纪的亚洲而强行搞出来的。”

的确如此。日美安保是以苏联威胁论为基础搞出来的，后来得到加强和扩大。可是 1989 年柏林墙崩溃，不久之后被美国称为“魔鬼的帝国”的苏联也垮台（1991 年）了。

日美安保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其作用终于完结，成了无用的废物。然而，日本、美国、台湾的军工产业体制对已成为无灵魂空壳的日美安保注入毒素使气氛再次紧张起来，于是日美安保又复活了。现在取苏联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

外务省元老、前经济企画厅长官平泉涉向前防卫厅长官松野赖三兜售敌视中国的政策。桥本龙太郎首相（当时）的特别助理、前外务省课长冈本行夫故意鼓吹台湾有事，极力主张冲绳美军基地永久化。

台湾的李登辉政权竭力参与了“用日美安保来防卫台湾”的日美安保再定义，中国对此反感并保持警惕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敌视中国的日美安保再定义，中日关系、大陆与台湾关系紧张起来，美国便可推销高价武器，这是华盛顿利用日本台湾牵制中国的战略。现在还不是评论聪明的美国和愚蠢的日

本、台湾这一可悲现实的时候。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宋宁说，“日本政治家连这样幼稚的事情都弄不明白，但我希望日本国民明白。”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一趋势不可阻挡，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成为障碍。中国经济搞好了，对 21 世纪的亚洲以至世界是件好事。因此经济合作符合日中双方的利益，它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保证，也可使 20 世纪的悲剧不再重演。”

现在亚洲经济被美国操纵。“冠于世界的经济大国（日本）也不成样子。陶醉于‘21 世纪是日本世纪’的想法已不能自拔。”

美国把遏制中国的政策强加于日本，成功地离间了日中经济同盟。

拥有高技术的日本与拥有辽阔土地、资源、人口的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欧美来说是个威胁。日美安保的再定义成功地排除了这一威胁，给亚洲带来经济危机，突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国。

所谓日美基轴就是意味着离间日中关系，这是华盛顿的战略。日本众议院议长伊藤宗一明确指出，“21 世纪应是以日中为基轴的世纪”，宋宁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离间日中关系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而贯彻日中经济合作正是 21 世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的保证，这也是历史教训。中国的研究者指出要“注意”这一点。这是中国研究者对不了解这一点的日本的官僚、

政治家、为政者发自内心的愤怒。

在青岛大学兴田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经济研讨会上，笔者强调“日本应以其拥有的技术力量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理所当然的。

宋宁先生赞成我的主张。而且宋先生补充说，“日本具有为亚洲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力量。”简而言之，通过许多成功的经济合作便可发挥其力量。日本的资源的确少，但是日本作为技术大国，它拥有主导 21 世纪亚洲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有很大差距。中国若得到日本的合作，到 21 世纪中期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一个稳定、和平，即“良好的国际环境”。

按他的说法，21 世纪的亚洲和世界取决于日中友好和日中经济合作的成败。本来这种思潮在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已经萌芽，在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宇都宫德马关于日中友好的基点里就有此看法。这也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均为当时）等日中双方领导人的理想。

至今中国认真地继承着这一理想。另一方面在日本，这一理想已被受“天皇官僚”操纵的政治家、经济界首脑等忘得一干二净，因而宋宁呼吁“应该回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点上来”。

让 13 亿中国人吃饱饭，这可以说是中国的伟大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好事，而实现这一点，和平的国际环境必不可少。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此出发的。

中国不会有侵略野心，它是与美国、从前的苏联完全不同

的大国。在外交方面，中国继续发挥抑制作用。中国虽然反对日美安保再定义，但并不执拗地抓这个问题。和平而稳定的国际环境正是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坚定的国际战略。

日本的外务、防卫官僚有必要正确理解这一国际战略。对于中国内政课题的台湾问题，千万不能别有用心地插手。

宋宁强调指出，保持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最大的目标。他断言，“若没有国际的和平与稳定，就没有我们的幸福。”他说得很对。“反过来，若一味扩充军备，谁都不能成为胜利者。军用机等武器、弹药不能当饭食，致力于扩充军备有什么价值？”他和宇都宫一样属和平裁军派。

日本军费令人难以理解

宋宁吸了一口气突然说：“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我看着他目光，等他说下一句话。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后辈、武汉大学毕业的李旭光，李旭光也在洗耳恭听前辈的发言。

宋宁说，“日本的和平宪法了不起。”外国人赞扬日本国宪法，对作为日本人的我来说真是无比高兴。因为“日本和平宪法世界首屈一指（铃木善幸首相语），宋宁先生知道日本和平宪法第 9 条（“放弃战争，不拥有武力”），可是他下边的话听起来很刺耳。

“可是日本的军事费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军费之多令人吃惊，令人难以置信。”

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抱有重大疑问。从前，笔者当政治记者时，历任池田内阁官房长官的黑金泰美（大藏省元老）说过

这样的话：

“总之，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都感到困惑，他们一味地想要得到军舰和战斗机，就像婴儿想要玩具一样。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军舰便办不了外交。”

黑金是前首相宫泽喜一的前辈，民主政治家。他是欣然接受和平宪法的保守派中的民主派国会议员，是财政专家。

他对执拗于搞“玩具”（武器）的外务、防卫官僚执批判态度，他深信“搞玩具徒劳无益”。用军事力量谋求和平是违背历史教训的，宫泽喜一也有此想法。

想搞玩具的政治家是右翼的战前派国会议员，其代表人物是岸信介、中曾根康弘，新一代的代表是小泽一郎。

黑金发言是距今 27 年前的事，那时笔者作为政治记者刚刚起步。在保守派里有像黑金那样正派的政治家，真让笔者松了一口气。在从池田派到前尾派、大平派、铃木派、宫泽派、加藤派一直继承下来的宏池会里，一般说来有不少民主政治家。宏池会是笔者最挚爱的政治势力。

这暂且不提。把自卫队视为玩偶的军队的笔者 1993 年 4 月，在克林顿政权即将诞生之前到华盛顿进行采访时，美国军官向我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我颇为吃惊。这位负责裁军的军官追问道，“本泽先生，直到今天日本还在扩充军备，请告诉我其目的何在？”这事已在《美国的大警告》中提到。

当时的华盛顿财政、贸易双赤字，处境非常困难，呼唤裁军，克林顿总统亲自抓大幅度削减军费工作。会见笔者的美国军官积极参与克林顿的裁军工作。

这些裁军派军官感到“日本扩充军备是威胁”，因而其提

问是朴实的，他似在开玩笑说，“日本还打算同美国打仗？”

日本扩充军备使美国军官都感到吃惊，亚洲各国为政者心存疑虑更是理所当然的，宋宁先生也陈述了此事。

社会党存在时，日本的扩军预算在国会常常成为批判的对象，共产党大都采取同样行动，可是最近消声匿迹了，大幅度削减自卫队的计划已提不上日程。亚洲人感到受到日本威胁，可是不少日本人没意识到这一点。新闻媒体已完全习惯于扩军。

宋宁先生还这样说：

“现在有什么国家和地区威胁日本？中国一心一意在缔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也没有威胁日本，东南亚各国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亚洲处在和平的环境里，日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巨额军费。日本没有敌人为什么要扩充军备？是为了日美安全保障？让人无法理解。日本不是正在受到美军保护吗？为什么要投入巨额军事预算？亚洲各国把日本巨额军费视为现实问题，并加以警惕，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日本的外务、防卫官僚和自民党的防卫族以种种借口使扩充军备合法化。以前以中国、苏联的威胁为借口，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被排除在威胁之外。苏联崩溃后，北朝鲜的导弹又被用作扩军的借口。

日本不遵守和平宪法令人不安

在日本电视、报纸上宣传令人难以置信的所谓北朝鲜威胁

论的日本政治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版过炫耀国家主义的《日本改造计划》的小泽一郎。爱说长论短的前众议院院长田村元曾讽刺地称他为“小泽希特勒”。

1996年中国进行核试验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恰好被日本扩军派作为口实。一旦建立起军事机构而机构与兵器产业形成一体，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将远远胜于所有其他组织。这些人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要搞军国主义化。此事不只限于日本，军工产业复合体在一切国家中都潜藏着最强大的影响力。

这一点在日本最为突出。正如宋宁先生所言，因为日本是“在和平宪法下位居世界第二的军费大国”。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深感不安。

“对于21世纪的日本不作确切的评价，因为日本并不打算维护和平宪法。21世纪日本到底要干什么？这令人不安。这一担心来自内心，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共同的想法。”

这里笔者回忆一下学校教育以供参考。日本史上记述，对明治时期大体评价很高，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样写的。把打垮德川幕藩体制，建立以天皇为国家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定位为“现代国家”。

这个“现代国家”为何侵略邻国，使殖民统治合法化？而为实现军国主义目的而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给亚洲国家人民而且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追根溯源正在于明治体制，然而日本政府对此却回避从正面作历史评价。

德国前总统魏茨曼曾指出，“战后德国与纳粹时代从历史上断绝关系，这样做才能与邻国实现和解。日本与过去的历史

不但不断绝关系而且至今还在继承。”这是至理名言。这是对至今仍拖着明治、战前尾巴的日本敲警钟。

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此仍不想予以回答。文部省官僚、历史学者和自民党文教族都玩忽职守，从外国人来看，这种情况实属异常。一般认为天皇制是一道厚厚的墙，而有的政治家早就指出有必要对明治史作正确的评价，据笔者所知指出这一点的正是宇都宫德马，别无他人。别的政治家并不关心对明治的评价，一开口便说“是了不起的时代”，太过于马虎。

宋宁先生指出“日本没有正确认识 20 世纪”从国际而言他指出的是重大而实际的问题。这一点与德国的差距极大。甚至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论在亚洲各国之所以没有消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宇都宫说，“明治改革使自由民权运动萌芽，这是好的一面。可是大权在握的萨长势力并非民主势力，而是保留强烈封建色彩的反民主势力。明治史观是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治时期实施的是恶劣的封建体制，因而向军国主义挺进。若民主势力成为核心力量，便可制止殖民统治和侵略。”

和德国一样，战后在日本首先应客观地分析战前史，这本应是历史学者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点。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把军国主义和明治天皇制分开，使后者合法化。

更令人吃惊的是，对客观记述一系列侵略史的中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文部省在审定的名义下，把战前史见不得人的部分继续隐瞒起来，歪曲过去以使天皇主义合法化的作法，直至今日一脉相承。

由于教师屈服于文部省官僚的压力，而不教日本的侵略历史。据笔者的记忆，教历史课进入明治期便完结了，而对于江户时代及之前的历史教得极为详细，而近代现代史被故意抹杀了。

掩盖过去的日本的历史教育

可以说，日本历史教育的实际情况非常可怕，而这种奇怪的历史教育至今仍继续进行。

海部俊树首相（当时）在新加坡发言时说，“对日本青少年要继续进行近代现代史教育。”海部内阁是在竹下内阁因里库路特事件垮台后，宇野内阁又短命而终之后诞生的政权，这是最近的事。可是海部的这一发言实际上得到多少实施，令人担心。我进行了验证。

1997年笔者在二松学舍大学任讲师，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的250名学生读了拙著《中国的大警告》，征求了学生们的感想。大多数学生对书中谈到南京大屠杀一节表现出了兴趣，他们，“过去发生过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件？我们并不知道，于心有愧。”

有些学生寄来感想文说，“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听说过，但在读此书之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日本人感到无地自容。”由此可知，掩盖近代现代史的教育至今依然在进行。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不能正视自身历史事实的民族，真是咄咄怪事，世人为之愕然。对曾受过空前浩劫的中国人而言，这岂只是冲击而是可怖。

“对 20 世纪不进行总结的日本，面向 21 世纪打算干什么？令人十分担心。”宋宁先生的这一席话，可以说是与日本有关的各国人民共同的担心。

最近盛传一些右翼学者、文化人和右派新闻记者正在搞一场不正视过去，以“自虐史观”来歪曲侵略史，并使之合法化的运动。这对近邻各国人民来说乃是真正的威胁。

“我不相信不能正确认识历史的日本，对日本更没有什么指望。说实话，我真的这样想。”这位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对善良的日本人而言，他的这番话等于枪刺胸膛。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我不相信自民党。若不进行正视历史的改革，世界将不相信日本。”他边指责日本边把置于桌上的咖啡送到嘴边。“不能相信自民党”这句话意味深长。

中国青年报社长徐祝庆是中国言论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就任此职之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委员，目前他正致力于研究日本的明治史。

几年前，记得是在日美安保再定义之后，在北京见到他时，意外地听他谈道：

“说日本国民也是战前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政府的这一见解是否正确，我多少有些怀疑。我在研究明治史过程中曾感到，日本民族在本质上是个侵略民族。”他发表了严峻的日本人论。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还不正视历史，日本不想从中吸取教训，日本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扩充军备。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本又想遏制中国。对于这样的新事态，中国的新闻人士百思不得其解，感到“莫名其妙”。

笔者感到他的分析是痛切的。作为一个日本人因为爱日本，被邻居如此评价，感到无地自容。如果当今日本有像吉田茂、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那样的政治家，即使美国施加压力也会拒绝执行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

“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纘一、该党前总裁河野洋平等人理应具有和大平正芳同样的思想。可是自民党的政策无论是教育政策、安保政策，无一不引起亚洲国民的反感。河野、加藤为何不能制止日本右倾化？”徐先生如是说。

日美安保是染指台湾的政策

他快人快语，滔滔不绝地说，“我还想谈一点。就是台湾问题。中国人之所以有反日、讨厌日本的感情，一般与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有关。”

后者关系到主权，两岸为此甚至产生了感情纠葛，许多日本人对此仍不关心令人吃惊。对这两点若不理解，不能妥善处理，日本就会受到 13 亿中国人厌恶。

宋宁先生首次坦陈了中国外交部有关人士绝不正式谈及的见解，即台湾问题与日美安保的关系，他分析说二者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苏联瓦解后日美安保继续存在且得到进一步加强。他尖锐批评说：

“日美安保为何继续存在？这是针对台湾海峡，这不是日美必定插手台湾问题的协定吗？”

他的指出是正确的，笔者分析了台湾帮深深插手日美安定再定义的事实。显而易见，其后建立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周边事态有关法案以及有事（战争）法制等一系列自卫队参战体制的目标是指向台湾问题的。

以苏联为假想敌而活动的自卫队，眼下其矛头指向中国·台湾。对此，中国不满是理所当然的。1998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这时日美两军的军事目光盯着中国。

这种愚弄人的野蛮行为岂能容许。这不是践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背信弃义行为吗？

中国政府把台湾问题定位为内政最重大的课题。1997年7月，中国从英国手中和平地收回香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是一种保留过去政治、社会制度的灵活的做法，中国打算以同样方式使台湾回归祖国，但是台湾的李登辉当局强烈反对。结果，美日巧妙地把日美安保拖进来防卫台湾。

笔者认为这是日美台军工产业体制造成的后果，给亚洲带来了新的紧张的火种，从而日中之间的信赖关系化为乌有。

中国声称，如果一旦外国军队以武力介入，或台湾独立，不放弃行使武力。中国认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权力，国际法是容许的。

在冲绳和夏威夷发生同样的事是完全不能设想的，可是假设出现那样的事态，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大概会同中国一样采取同样态度。当然，中台关系应该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始终表示这一态度，这就是一国两制。

然而，如同要把中国的不懈努力一脚踢开似的，日美反而强化安保，推进防卫台湾，日美两国的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不但侮辱中国，而且等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如果台湾闹独立，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这一点我不明

说。可是也许会发生谁也不希望看到的事态。”

这就是说，台湾若独立，中国不否定可能使用武力加以压制。到这时，驻冲绳的美军是否出战？若出现台湾当局所希望的事态（美军参战），美中将开战。日本自卫队将提供后方支援和承担收集作战情报任务，中国将进攻日本。

这样一来，日本自卫队将出动，日中将再次开战。所谓“谁也不希望看到的事态”指的就是这一危机。绝对不容许这一事态发生，当然，也可以说是“不会发生”。

第一，美国不会倾其全力去防卫台湾，越南战争的教训记忆犹新。一旦美中开战，其规模是越南战争不能相提并论的。万一发生，要预料到核战争。华盛顿不会去进行这种愚蠢的战争。

同样地可以认为，美国不会全力以赴去防卫日本，日美安保只不过是纸老虎。当然，这种预测是建立在理性判断基础上的，而实际上，有时可能发生预料外的情况。

处于危机时，军事往往优先于政治。急于建功的军人的愚昧，在哪场战争中都可以看到。

一旦发生“大陆与台湾危机”日美将如何应对，他说，“我想奉劝一句”。笔者颇感兴趣 等待他的下一句话。

冷静对待台湾问题

“如果台湾独立，大陆与台湾关系将紧张起来。届时日美安保将如何应对？第一，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不要在意一些奇怪的评论。第二，冷静对待言论和行动。不要胡乱分析言

论和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保持静观态势。”

他也在劝说中国人。他指出了基于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而作政策判断的危险性。在中国，流言与实际不符的例子多的是，听了流言蜚语便作这样那样的推测，只会把事态搞乱。

在西方媒体里有许多可恶的编辑，他们大肆报道流言蜚语，称之为“独家新闻”以增加销量。他忠告“不要上当”。

谴责对方和采取实际行动完全是两码事，这也是中国式的做法。1996年中国的军事演习时形势紧迫，但是对于中国军队的导弹演习，台湾人、中国福建人岿然不动。慌慌张张的只是日本和欧美。

其原因在于媒体作了耸人听闻的危机报道，他叮嘱一定要把言论和行动严加区别。“不排除动用武力”的中国政府的见解，并非是立即以实际行动动用武力，演习和作强硬发言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牵制。日美两国之所以恐慌是不了解此中情况轻易认定是台海危机。这是宋宁说的。

他还补充说：

“21世纪的日中问题将是台湾问题，大陆和台湾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能因两岸对立而引起严重事态。可是若大陆和台湾关系搞不好，日中关系也不会好，最终也许会造成悲惨的结局。而从中受益者是死亡商人、军工产业财阀和政治家，其余的都是牺牲者。”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预言，大陆和台湾关系恶化将引起日中关系恶化，搞得不好，一般市民将成为牺牲者。发战争财的，照例是死亡商人、军工财阀以及暗中操纵战争的政治家。

“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政府也有同样看法，因而

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发生中日战争。”

不要战争，因此应根绝战争。绝对不要插手大陆和台湾关系，不要离间大陆和台湾关系。相反的，应尽力帮助大陆和台湾和解。

不要把李登辉当工具使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安保政策，违背了宋宁等中国人的和平愿望，而且因此中国人对日本的不信任会越来越严重。他对日本政府的呼吁是实在的。

“谁都懂得，对中日两国人民而言，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因而两国应和平友好共同发展。说得更明白易懂些，就是希望日本政治家不要把台湾的李登辉当工具使。我们对日美安保、两国间的协定并不感兴趣，可是，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针对中国，对此，我们不得不说：绝对不行。这一点，希望日本国民了解。”

“台湾和日本的政治家并非全是蠢人，蠢人只是一部分。他们把台湾视为自己的岛屿、自己的国家。他们搞到一起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一点，一看便明白。”

他发出警告：日本插手台湾问题肯定烫手。不要作这种愚蠢的选择。

“而从我个人来说，若出现民族性灾难，我有牺牲的思想准备。为解决台湾问题，我决心战斗到底。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有明确的方针，就是一国两制。这是认真的。50年后与大陆也不是同一制度，保证实行适合台湾的制度，一国一制不

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对台湾提供比香港更令人满意的条件，台湾可保留其警察和军队。”

他断言一国一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一国两制才是理想的。他思想灵活。可是，一旦台湾独立他有捐躯的思想准备。笔者对孙文知之不多，但觉得宋宁先生是个像孙文那样的爱国者。正因为这样，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将赴汤蹈火。

他对于“等待时机”的日美安保，当然要进行彻底的斗争。

他还谈到俄罗斯占领的北方领土问题。

“俄罗斯归还北方领土时，日本按自己的制度支配北方领土是理所当然的。在日本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主张一国两制。更何况会原封不动地接受俄罗斯警察？与此相比便可知，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而言是多么优惠的条件。”

“对台湾的一国两制对日美两国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不，只有一点损失，那就是台湾不再买美国的军用飞机，金钱不再流入美国军工产业的口袋。当然，同样是飞机即民航旅客机还是照样买。总而言之，一国两制是了不起的政策。可是美国的政治家到处活动制造障碍妨碍两岸统一，究竟他们打算怎样处理台湾？”

“我相信日本的政治家是会打算盘的。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19世纪、20世纪悲惨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已不是19世纪、20世纪受殖民统治、受耻辱的国家。对台湾独立中国将抗争到底，希望日本不要卷入其中。若卷入其中，日中关系将是不幸的。对这一点我要强调指出，这不是对日本国民的警告，是忠告、建议。台湾问题希望由中国人民自己处理。”

宋宁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四十多岁年富力强的学者。他对日中关系、日美中关系颇有研究，也精通经济问题。

军队式的日本工薪族

经一直呼吁搞日中经济同盟的青年精英潘岳的介绍，我见到了一位德国学者。这位学者说话比任何中国精英都坦率而充满善意。他说话没有暧昧的表现，他用易懂的中国语作明确的发言。

青岛大学兴田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资助者是台湾企业，对此不要大惊小怪。台湾企业早就进入中国大陆，在商业方面是日本企业的劲敌。

在招待会上，德国学者问道，“为何日本人像军队那样工作，其原因何在？”令人大吃一惊。确立了民主的德国知识分子提问之尖锐令人佩服。对“工薪族像军队”这样的评价，不知日本经营者如何应答。

突然这一问，笔者不知所措，立即答道，“日本的民主是美国赠与的，不是自己争取来的。由于个人主义尚未确立，依然是集体主义通行。”他紧接着说，“这与美国无关，是日本的民族性。”令我哑口无言。

但是我不认输，我像德国前总统魏茨曼那样继续解释：
(1) 在日本还存在天皇制；(2) 还拖着明治的尾巴；(3) 保留着封建时代的意识结构，终于使他理解了。

日本政府吹嘘“战后我国始终贯彻和平外交，建立了和平

的日本”。可是外国人尤其是有过同样命运的德国人观察日本，日本的画皮马上被揭穿。德国人认为，甚至工薪族都是“军队式，的。

拖着战前（过去）尾巴的日本，不论怎样乔装打扮都不能蒙蔽第三者的眼睛。德国清算了过去，而过了 50 年日本还办不到，二者的差距何其大，不好办呀！

在青岛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与曾任光明日报东京分社长的蒋道鼎（1999 年再任）邂逅。这个世界像是很大其实狭小，在中国青岛这地方突然又见到了当时生活在北京的蒋先生。

我腾出一点点时间，乘船游览青岛湾，没想到我那顶有来头的帽子被大风吹跑了。这顶高尔夫帽是我和小渊惠三首相玩高尔夫球时忽然下起雨来不得已而购买的。

我不再玩高尔夫后，把这顶帽子送给我父亲（喜平）散步用。帽子轻还能挡雨。1996 年父亲过世后闲置无用，于是又回到笔者手中。大概这顶帽子也爱上了青岛。

在六十年代，遇上交通事故切去了一条腿的父亲，一次也没有踏上外国土地。父亲是农家的长子，战争时已娶妻成家，很幸运他在战争期间是在内地度过的，他没有被强迫到大陆去杀人。作为他儿子的笔者，这是惟一的幸事。眼望着浮在青岛湾的那顶帽子不胜悲伤，心想父亲的灵魂不是正在中国旅行吗？

父亲去世之事，在永田町我一直秘而不宣，可是过了一些时候，小渊知道后给我家打电话表示哀悼之意。在同一时候，他也丧母，我们同病相怜。他来电话，我有点过意不去。

承蒙青岛市外事办公室李汝敏先生的安排，我和蒋先生以

及兼任贸易商的翻译祝智慧一道访问了青岛市郊外的平度市。风景胜地大泽山、天柱山一带像是大理石街，有好些石料工厂。此外也建起了收购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工厂。

这一带的农村生活富足，没有农民外出打工。有富余人员的农家也经商，农民办乡镇企业。大泽山、天柱山的北边是烟台市，当地人挺起胸膛自豪地说，“这里是葡萄的故乡，葡萄嘛，西有吐鲁番东有大泽山。”

这一带的石料加工是韩国企业经营的。怪不得韩国总领事出席了青岛大学的研讨会，并始终笑逐颜开。韩国学者和德国人肩并肩，遗憾的是，日本人只有笔者一人。

平度市干部在市内餐馆招待我们午餐。好客的干部酒量大，难为了酒量小的蒋先生。我仔细观察他们饮酒的情景，蒋先生的啤酒杯里注入的常常是茶水，乍一看，茶与啤酒颜色相差无几。喝的啤酒当然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酿造技术来自正宗的德国，味道好。

餐桌上必定上饺子，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平度市吃饺子时吃生蒜，真不习惯。

青岛郊外也有抗日纪念碑

在归途中，车的右前方看到高耸云天的石碑。平度市干部说是“抗日纪念碑”，令我大吃一惊。笔者是个不熟悉历史的蠢笨的日本人，听此言顿时从午餐的醉意中清醒过来。

我注意到在这里旧日本军曾胡作非为。纪念碑是新建的，据说是“1996年建成的”。何以1996年建此碑，我不敢问。

1995年是战后50周年，是重要的年份，然而日本国会未能正确对待这一历史时刻。

中曾根前首相等人叫嚷“毕竟国会决议这个方法是不妥当的”，于是1996年桥本首相强行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不许淡化历史”，13亿中国人的要求刻在石碑上。

在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历史的日本人中，有人抱有疑问：“中国为何修建有反日教育意义的纪念碑？”修建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日本。中国人重视历史教训，德国人亦然，学习历史意在不要使不幸的历史重演。

日本情况如何？在广岛和长崎建有纪念馆。可是何以被投下不人道的原子弹？探讨其原因的资料很缺乏，应该一并展出侵略中国的书籍。直到现在，于己不利的事依然被日方隐瞒起来。这不是在吸取历史教训。

战后的日本非常热衷于掩饰历史，这是文部省官僚带的头，主要是在教育场所强行实施，这是为政者“不想让人知道过去”的决心的表现。这也是他们暗自承认自己有过胡作非为的证据。

掩饰过去，不把曾给别国人民造成空前绝后的牺牲、并给本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的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告诉下一代而使之盲从，这才是威胁。

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在经济方面得益于国际环境而有了巨大收获。可是在教育人、历史教育方面只能说是大失败。教育场所尽管是由日教组这个革新的教师队伍执教，但是还是令人遗憾。

当然不能否认也有一些优秀的历史教师，听大学生说就知道有一些认真的中学、高中教师。可是总的来说，日教组的教育水平与德国历史教育相比，应该说至少是略逊一筹。

说起来，文部省教育研修班的海外派遣多半是去英美等国。

国会议员的海外研修也是如此，笔者认为海外研修应集中于中国或者韩国。1995年8月，我和50位伙伴访问过南京和卢沟桥，其中有几位高中的历史教师。旅行结束后他们谈感想说，“由于亲自目睹了战争的创伤，今后可以自信地登上讲坛。”三十多岁的青年教师过去没有学过这段历史而当了历史教师，这些教师摸索着讲课，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而有了自信，作为历史教师扩大了眼界。

尽管这样，由于日本政治水平低让人感到无奈。引人注目的只有村山富市首相访问卢沟桥和1998年5月野中广务和佐田玄一郎两人访问南京。桥本首相1997年秋访华时曾想去南京，由于官僚和右翼政治家的反对而作罢。无情的事多的是。

另一方面，中曾根首相、桥本首相断然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死伤了3500万人的中国而言，只对商业感兴趣的日本的政治家、官僚、经济人何其多。

佛教把一些装出人样而是人下人者称为人非人。这指的是干了不人道的事情的人，从中国人看来，当前的日本人就像是人非人。至少这些人不值得尊敬。

94 岁耳聋的老太太

再说说平度市。笔者看到了这个刚建成的抗日纪念碑，知道旧日本兵在这块和平的土地上曾胡作非为，不免大吃一惊。

陪同我们的一位 32 岁的该市职员说：

“是的，平度市有过日本军的阵地。在我家木床的柱子上留有日本兵刀砍的痕迹。听说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躲藏在山脚下。”

在这个和平而富足的青岛市郊外也曾被血洗真是难以设想。可是当地人、受害者没有忘记过去，受害人的子孙也牢记在心。他向我谈了他亲人的悲剧。

“我祖母今年 94 岁了。她耳朵已听不到声音，是当年日本兵殴打所致。我的亲戚也有被杀死的，是被刺刀刺死的。”

他祖母大概为保护身体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据说当时她被施暴了。他和他祖母决不谈此事，无疑是被强奸了，而且施暴的还不止一两个日本兵，真是残酷。

下午 3 点，我去逛平度市的自由市场。市民买东西回家去了，市场清闲起来。有些店员在玩扑克，有些女主人在编织东西，杂货店老板舒舒服服地在睡午觉。这里治安情况很好。

在青岛大学一位 28 岁的女性向我打招呼。她告诉我，《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对笔者的采访，她看过了。她说：

“日本人都是暧昧的，可是你不一样，说话明确，这很了不起。”

外国人以为日本人说话都是暧昧的。以前美国人一再要求

日本“希望明确说是或不是”，可是日本人一点都不变，仍然不舍弃暧昧，被欧美人瞧不起。在《美国的大警告》一书中曾提到，任日系企业顾问的洛杉矶的律师叹息说：

“我常常和日系企业的日本人开会，对我的发言日本人什么都不说，催促也无济于事。最后日方的负责人说了一句话，其他日本人都表示赞成，像是没有自己的意见，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对于没有个人意见的日本商人，德国人称之为“像是军队”，而美国律师对暧昧含糊的日本人感到吃惊。

在永田町，宫泽喜一前首相曾一度遭人讨厌，原因之一是他爱说英语，原因之二是他说话明确。

民主是以确立个体、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理应以两条腿站立起来，民主社会是各有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行动的社会。

暧昧的政治家和官僚

这一点，中国、美国都是一样。

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关系非常冷淡。1997年秋江泽民访美和这次美国总统访华，两国关系一举解冻。

当着江泽民的面，克林顿批评说“天安门事件是错误的”。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对克林顿穷追不舍地提问：“美国没有人权问题吗？歧视黑人消失了吗？”“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弹药，若中国向夏威夷做同样的事，你会怎么想？或者像台湾一

样把夏威夷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里，你会怎么想？”

说话一向流利的克林顿感到窘迫，吞吞吐吐地承认美国国内存在人权问题。上述两个政治场面对全国作了现场转播，对此，讨厌北京的香港人也认输了。

后来笔者和光明日报分社长陈志江等来到山中湖。他对美中会谈非常满意，他说：

“ 中国和美国虽然吵架但友好，相互坦率交换意见，因而能明确理解对方的心理。可是日本却不同，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全都是态度暧昧的。因为暧昧，有点事情便多方猜测。若不能建立起坦率交换意见的关系，中日关系是靠不住的。”

我很赞成他的意见。克林顿访华的成果是双方都坦率地谈了对对方不信任之点。

附带提一下，在青岛大学兴田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有一件事使我很佩服。

兼有政治家、学者头衔的韩国人朴先生，用中国话宣读了他的长篇论文。他发言不是二三十分钟，而是足足一小时。

令人吃惊的是，他发言途中，中国人暗自发笑。这位韩国学者用中国话发言时额头流汗，这情景使人莫名其妙，过了一会才知其故。

“ 他的中国话一点也听不懂 他说什么我们全然不知。”在中国留过学的德国人也摇头，意思是“ 不能理解 ”。

可是这位韩国学者毫不在乎地用自创的中国话宣读一小时之久，他的热情使人惊叹，大家静静地等待他发完言。他发言完毕，大家一齐鼓掌。

之所以鼓掌，当然不是对其演说的内容。他说什么，大家

全然不知，大家感动是因为他拼命地用汉语发言，这真是了不起，令人叫绝。

这正是韩国人了不起之处：学习汉语态度真诚。中国人为之感动。

当然，在日本学者中也有了了不起的人。199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召开的卢沟桥事件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潘吉先生庄重地用汉语发言，这使人深受感动。

我问中国学者“卫藤教授的汉语如何？”回答说“听懂一半”。这说明汉语发音之难，笔者没有勇气学汉语，可谓不称职。

谈起汉语，笔者想起1979年12月作为特派员随同大平首相访华进行采访时的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送日本代表团的宴会上，当时的官房副长官加藤纮一用汉语发言。事出突然笔者也大吃一惊。

1998年4月，王炯、祝智慧夫妇应邀参加首相在东京新宿御苑举办的赏花会，与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用汉语交谈。他们两人说“加藤先生的汉语听了很明白”。

刚就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日时，自民党干事长5次会见胡锦涛，他采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加藤用汉语发言，胡锦涛也不紧张。

说汉语的加藤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不论如何拼命也做不到这一点。

大政翼赞政治令人担心

光明日报东京分社长蒋道鼎长期生活在日本，他对日本的分析是相当严厉的。

在此介绍一些与蒋先生会见时谈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桥本内阁强力实施永久使用冲绳基地的特别措施法。冲绳县民由于冲绳成了基地，早已失去生活的基础。在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无数的冲绳妇女被旧日本军用作挡箭牌而丧命。

宝贵的生命受到如同用一根火柴烧尽的纸片那样的对待！战败后取代旧日本军的美军赖着不走，人权依然受到剥夺。冲绳岛的历史悲剧，战后过了 50 年还在延续。

为政者负有重大责任，可是他们不负一切责任。若体察冲绳县民的苦衷，将痛苦难当。为政者应全力以赴缩小美军基地。

旨在使冲绳基地永久化的特别措施法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遭到议会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别吃惊，众议院九成议员都赞成。

蒋先生说，“九成的众议员赞成意味着什么？大大超过三分之二。真令人吃惊！连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都批评说这与战前强行侵略中国时的近卫翼赞体制一模一样。如果让我说，这如同日本国会为修改和平宪法的一次成功的演习。至少在国会阶段，朝向重整军备的改宪已成为可能。”

国会由代表国民的国会议员组成，在多样化的社会，理应

由各阶层的代表取得议席。其中应有替冲绳县民辩护的政治家和多少有些良心的政治家。在议会当然可以发表反对意见。

但是，情况并非这样。“赞成者远远超过三分之二，达九成之多。”面对这一明确的事实，蒋先生无可奈何，而且受到很大冲击。

中国媒体感到吃惊，因为其背后还藏着另一情况。之所以赞成者达九成之多，因为当时第一大在野党新进党转到赞成一方。新进党何以听从政府执政党呢？

原因全在于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小泽是个有定评的人物，是众所周知的亲美派国家主义者。在他的著作《日本改造计划》里，浓缩了民族派官僚的想法。他要日本成为与美国军工产业体制形成一体化为前提的“强大的日本”，即“普通国家”。

说得明确易懂些，就是战前国家主义日本的复活。正因为这样，被戴上军国主义者帽子的中曾根首相向年轻的小泽靠拢。在此隐藏着保守派与保守派联合修改宪法努力的大团结。在笔者的著作《改宪阴谋》一书中，分析了他们的谋略的一端。

另一个人物是当时的梶山静六官房长官。和中曾根一样，梶山也是旧日本军军官。梶山是台湾李登辉总统“最信赖的日本政治家”（日华议员恳谈会干部语），台湾帮的盟主。

小泽也是有名的台湾帮，小泽的首领金丸信这位政治家也是铁杆台湾帮。金丸信作为“把睡着了的田中角荣的头砍掉的人物”而知名。“小泽作为金丸的得意门生而飞黄腾达，没有金丸便没有今天的小泽。”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梶山和小泽作为台湾帮共同促成了冲绳特别措施法。据推测，其背后有李登辉的意旨。对此，中国是反对的且受到了冲击。

成立修改宪法议员联盟的冲击

在青岛大学研讨会上，蒋先生也谈到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他谈的是日本宪法实施 50 周年 1997 年成立超党派修改宪法议员联盟问题。

他把九成赞成的冲绳特别措施法和成立修改宪法议员联盟结合起来进行深刻分析，给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

“小泽、中曾根、梶山都是改宪派、战前派的国家主义者”，这是永田町人所共知的常识。他对侵略战争参加者和追随他们的政治家的改宪阴谋表示了严重关注。

以前在社会党健在时，直到工会势力还强大的十多年前，连自民党右派都不敢暴露自己改宪派的真面目。若宣传自己是“改宪派”，选举时将落选。

因而改宪派把铠甲换成衣服隐藏起来。当然在野党议员中不会有改宪派，护宪是在野党议员的标志，明显违反宪法的自卫队也表示中立，以免引人注目。

可是山花·社会党被纳入细川内阁，村山·社会党一当政，自己切掉爪子，导致社会党解体，本来重视运用和平宪法的政党，在自民党化的过程中消失了。日本政治结构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而其契机来自外国，即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根据地瓦解

引起了日本国内革新势力总崩溃。这是一次冲击性事件。

因为日本革新势力一直受苏联操纵，这说明革新势力是莫斯科的傀儡、机器人。对苏联而言，日本国宪法有利用价值，因而支持护宪势力。

竟然有如此轻视国民的事情。其结果，日本革新势力不是以两条腿站立的。把一条腿放在莫斯科，革新势力才勉强得以维持下来。社会党实在可悲。

当然，不能只是嘲笑社会党的解体。自民党也罢，已经解体了的新进党也罢，它们不是如同华盛顿分店那样的政党吗？桥本、自民党、小泽、新进党都是华盛顿的忠实走狗，作为主权者的日本国民对两党的立场都有所不满。

“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若不和美国商量，便不能做出任何决断。”这一评价在国际社会已成定论。

战后日本的政治一向是由被华盛顿操纵的自民党以及被莫斯科掐着脖子的社会党推行的。说起来，日本人一开始便被人利用，日本的外交政策竟被不是国家只不过中国一地区的台湾当局操纵。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治的真面目，像是漫画。莫斯科的控制消失之后，一切便被华盛顿操纵。冲绳特别措施法之所以有九成议员赞成，也是在此判断基础上造成的，不足为奇。

民主党也不例外。坐上了新党党首宝座的菅直人一上任便匆匆忙忙到华盛顿朝拜。民主党和自民党并无二致，议会里不存在健全的在野党。

修改宪法议员联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该联盟的会长是前外相中山太郎，他被视为旧福田派的民主派代表，由于

中曾根的吩咐，他脱去厚厚的衣服，公然穿上铠甲。

中山原来的亲信说，“这是中曾根略施恩惠的结果。”目的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 9 条（放弃战争，不保持武力）。他们没有愚蠢地从正面提出这一问题，而是以别的理由来掀起改宪热潮。

企图倒退到以“普通国家”为名的国家主义，这是危险的动向。对此，普通的美国人民也势必极力反对，亚洲各国人民当然反对，尤其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修改宪法议员联盟的动向。对国会的改宪阴谋，蒋道鼎先生敲响了警钟。

小选举区制旨在消灭革新势力

对日本政治的担心，中国记者关注的不是日本政治的结构而是其实质部分，对此，人们更为担心。

“在政治改革的大合唱下，重要的是强力推行小选举区制。在 50 年代，曾计划实施小选举区制，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后来田中内阁也打算搞，也失败了。冷战结束后，这成了现实问题。一言以蔽之，这一制度旨在消灭革新势力，使小的政党无法生存下去。经过两三次小选举区选举，民主的政党议员将一个不剩。”

他的大胆分析大概是不会错的。难以反映民意的小选举区制有利于大政党，仅一开始就是肯定的，因为无疑对大政党有利，因而旨在改宪的右翼政党和政治家一向有此主张。

最早提出这一制度的政府是旧民主党的鸠山内阁。掌握该

内阁实权的正是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岸信介担任战争内阁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他也是率先协助战争的商工官僚，他是“天皇的官僚”。

岸信介是甲级战犯，他像不死鸟一样一走出巢鸭监狱便再次登上权力中枢，他摇身一变就和被贬为美英鬼子的华盛顿紧紧握手，成为反共的台湾帮的盟主，攫取了日本丸船长（首相）的宝座。

岸信介的宿愿是修改和平宪法并使之解体，因而他热衷于团结国会议员三分之二的改宪势力，为达此目的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实行小选举区别。

可是爱好和平的国民不让他的野心得逞，舆论机构、在野党毫不客气地反对小选举区制。当时的国民、舆论界、议会都是健全的。岸信介无穷尽的野心被打得粉碎。

对共产党的成长感到恐惧的田中角荣首相也曾一度主张这一制度。这时，在野党、舆论界一致反对，田中首相的盟友民主的大平正芳外相也叫“暂停”，这位推土机首相^①只好半途而废。

尽管如此，执意要实施这一制度的政治势力，即旧内务官僚及其出身的政治家一直伺机而动，小泽一郎也是其中之一。小泽的父亲因系岸信介的亲信而知名，小泽曾受到田中首相的庇护，因这层关系，小泽对小选举区制也抱住不放。

日本自治省是旧内务官僚聚集的有名场所。自治省被小选

^①推土机是建筑业的重要工具，喻田中角荣是建筑业业主出身的首相——译者。

举区论者所占据，小泽就任自治大臣，摇身一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小选举区论者。也许是受到父亲和岸信介政治主张的影响，小泽执着于国家主义、改宪论。

对他来说，幸运的是组成了以他为后台的细川护熙内阁，给他提供了迫使实现小选举区制的机会。他打出了“政治改革”的旗号，这是一面谁都可以接受而不能反对的大旗，通过新闻媒体大肆进行宣传，不了解政治的日本国民上当受骗了。

由于不知其真正目的何在，人们把实施小选举区制当作“政治改革”而予以默认。说起来，已向国内外表明所谓主权在民的日本政治也不过如此而已。在日本，只要抓住新闻媒体便可成立各种恶劣的法律和制度。

小泽的阴谋诡计妙不可言。为了实施小选举区制，他让一向正面反对此事的社会党委员长山花担任负责此事的大臣，使之率先推行。小选举区制反对派的头面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促进派的负责人，民主派的反对势力受挫自然在所难免。

社会党解体后，山花不加入稍有社会党性质的社民党，而是加入和前自民党议员搞在一起的右翼的民主党，暴露了其真面目。革新势力的领导人竟然如此恶劣地背叛选民。同样的，村山富市以社会党委员长身份一当了首相，便把社会党的公约扔到水沟里，使社会党解体。至于土井多贺子这位社会党前委员长由小泽安排当了众议院院长，其尖牙利齿也被拔掉。山花、村山、土井的政治责任重大。

正如蒋道鼎先生所说，“小选举区制是使革新势力解体并使之消灭的制度”，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只好说热衷于消灭自己的制度的社会党领导者发疯了。他们像是吃自己的手足

以维持生存的空想的动物。

结果社会党成了被工会操纵的政党。本是社会党母体的工会总评议会与支持民社党的母体旧工会同盟合流结成了工会联合会，可是工会联合会简直像变色龙那样，丧失了灵魂一味向右倾化发展：他们既不反对百分之五的消费税，连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也被置之脑后。他们不是工人的代表，完全变成了怪物集团。笔者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联合会的罪与过》，执笔的动机与这种体制堕落有关。

1997年2月，社会党党首土井、田英夫访问北京时，蒋道鼎见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谈话。“我们谈了40分钟，社民党的方针没有感人之处，令我大失所望。甚至安保问题、宪法问题的应付，说实话也令人失望。对社民党的前途我不得不抱有危机感。”他大失所望地说。

他断言“日本的军国主义尚不厉害，而日本的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值得注意”。

加速右倾化

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日本政治的担心似乎在于日本的极端右倾化。1997年7月我在北京会见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肖向前，他皱起眉头说，“日本右倾化的速度太快了。”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肖先生禀承周恩来总理的意旨到日本和大平正芳外相等商谈，是确立日中历史关系的中方的主角之一。他是同日本政界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中国要人。

肖先生对使日本右倾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小选举区制度的实

施以及 21 世纪的日本政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点与笔者相同。在《小选举区制滋生腐败》一书中，笔者试作了分析。

日本政治右倾化当前的目标，不言而喻是修改和平宪法第 9 条。民族派、国家主义者的执着念头已成为修改宪法的动力，这一点不好对付，对此，中国学者更感不安。

更何况由于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日美安保再定义，他们的担心大大增加。眼下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这些亲华派政治领导人已经去世，今天的日本格外令人担心。

1998 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0 周年。中国国家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分别于 4 月和 11 月访日，表面上强调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尽可能地以政治姿态给国内外留下友好的印象。但这没有超出外交辞令的范围，没有注入灵魂，而其原因无论如何都在于日本。

日美军事同盟意外加强

青岛大学研讨会发言者之一的蒋道鼎先生用汉语谈了复杂而严重的日中关系问题。

他首先谈了 1972 年的邦交正常化、1978 年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扩大经济交流的成果。他还谈到邦交正常化之前 1964 年开始的民间贸易（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1969 年中日交换记者。蒋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 1969 年访问过日本的中国记者，他可谓日本通。

他在谈到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1997 年）时，情不自禁地表情严肃起来。

“1991 年出现了冷战结束这一重大变化。苏联崩溃世界出现了和平潮流，可是日美两国反而加强了安保体制（1996 年日美首脑会谈）。冷战结束了然而安保没有结束，日美军事合作正在加强 这事中国完全没有料到。”他对 1996 年日美安保表示严重关切。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都有疑问并保持警惕。

“日本不想面对苏联崩溃这一新形势，而是打算进一步加强军备。究竟要干什么？其目的何在？”他对日本有诸多疑问。

“我们对 1995 年战后 50 年的国会决议寄以希望，这是日本反省战争的良机，结果期待落空，继而是 1996 年日美安保加强和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 1985 年中曾根首相参拜之后的参拜。”

“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受到南北朝鲜和中国的严厉批准，之后谁也没有去参拜。可是桥本以首相身份参拜了，真是岂有此理。”

“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靖国神社不否定战争，它不是表示战争决心的神社、场所吗？”

“我们非常憎恨靖国神社。已死去的无数的中国人、东南亚人 谁都讨厌参拜靖国神社。”

谈到靖国神社时中国人的愤怒，远远超出习惯于靖国神社报道的日本人的想像。蒋先生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他语调激烈，使人忘记了他的研讨会发言者的立场。

当今访华的日本人众多，多半是观光和做生意，他们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欢迎，这时谁都不想谈及过去。日本人去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参观时，中国人也不把他们带到就在近处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去，也不带他们去瞧瞧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这是对待客人的中国式的照顾，除非日本人强烈提出要求，他们不会强迫日本人去参观，更何况在交流场所让人想起过去是“失礼”的，他们不会去做。

因而，即使到中国去，知道中国人内心的日本人为数不多，有些人一无所知便回国了。可以说日本人几乎都不知道永远不能治愈的中国人内心的创伤，日本新闻记者也不例外。连自称算得上是中国通的老牌记者也自以为是地说，“日中关系已是普通关系。”真不知天高地厚。

蒋先生的下一句话表达了中国人的看法。“1996年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的反应不怎么样，颇为异常。可以说这是日本的社会现象。”

1997年1月，我访问过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听在该市长年当过中学校长的祝丕业谈过靖国神社问题。

当时他告诉我，对中国人来说靖国神社是言辞难以形容的憎恨、愤怒的对象，是亲人被杀害的受害者愤怒的对象。日本人对此事的理解非常迟钝。

拖长明治的精神结构

许多日本人对奥姆真理教的精神控制怒不可遏，而对靖国神社的精神控制则全然没有感觉，给人的印象是，这正是靖国神社精神控制的厉害之处。一到8月，执政党在野党的国会议员简直像流氓一样出出进进参拜靖国神社，其情景实在可恶，这不知多么伤害了亚洲人民的心灵。

亚洲各国人民之所以有日本威胁论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与其说是军事方面的担心，不如说是对日本人精神结构的担心。明确地说，日本人的精神拖着明治的尾巴。因为战争失败，德国等世界各国人民已与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决裂，唯独日本人过了 50 年仍不能从中摆脱出来。

这是因为未能对明治、昭和进行总结。可以断言，日本人是以前一百年前的精神结构来谈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于这点，可参照拙著《天皇的官僚》。

据笔者所知，只有宇都宫德马这位政治家才知道日本的这种可悲的现实，因为宇都宫是民主的政治家。

把明治风气误认为现代精神，这正是日本被世界讽刺为“没脸皮”的原因所在。

蒋道鼎先生继续说：

“是怀旧吗？日本政治家相继有些稀奇古怪的言论。其典型人物是石原慎太郎，这值得注意。小泽一郎作为新的保守势力正在亮相。”

热衷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不只是日本有，哪个社会都有。可是，作为群众作家兼政治家的石原使侵略合法化的发言（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反感。我想奉劝他“哪怕是一次，到南京去看看吧！”属石原一类的政治家还有奥野诚亮、藤尾正行、永野茂门等。

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不下百人，因而中国人对日本不信任无法消失。实在是可悲、不幸。

蒋先生还指出，“批判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没有什么意思，这些人迟早会死。可是对新的保守派、右翼政治家需要注意。对小泽为代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动向要注意。”小泽是

青年右翼政治家的代表。对小泽保持警惕者不只是蒋先生，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都这样。

对小泽的著作《日本改造计划》的分析以及对其一系列发言和政治行动的批判都是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

批判小泽的一系列发言和政治行动，是指批判他强力推行旨在修改宪法的小选举区制，在此过程中使革新政党解体的手法以及他以“普通国家”为名的政治、军事大国论。

专门报道日本的中国新闻记者，关注作为永田町新保守派的小泽以及历史学界的新的右翼潮流。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没有这种现象，最近却活跃起来。政治家的影响力比政治家本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更大，对此应充分注意。”

右翼学者之所以登台表演，其背景是新闻出版界的右倾化在起作用。过去，新闻界照顾到亚洲各国人民几乎不报道发表右翼主张的学者的意见，后来说是要保持中立公正，于是突出报道右翼学者，不少编辑企图从中获利。

名不见经传的某些“文化人”学者，有时顷刻之间成为名人。文艺春秋、新潮社自不待言，连一向偏爱中国的德闲书店也正面突出右翼人物，令中国学者大吃一惊。其他出版社也有同样的倾向。而读卖、产经的月刊杂志当然是冲锋在前。

至于谈到勉强居于中立公正行列的月刊杂志，只有岩波书店的《世界》。这种倾向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出版界的大变样，不能说这只是商业新闻业的奔头。日本新闻界率先摆开了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充满敌意的争论的架势。

这种争论很可能是以错误的中国威胁论为基础的。 1972

年当时，日本指责中国是穷国，不少日本人有侮辱人、傲慢的举止，当然也有不少同情者。

对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日本新闻界一转而谴责中国是“邪恶的帝国”，像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似地玩命地报道中国，掀起了反华高潮。他们不是报道事实而是别有用心。

中国重视中日关系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成果时，他们从批评“穷国”转而说“中国威胁”，把小泽之类的右翼民族派抬出来。日本新闻界真是可恶，既无哲学又无方针的言论界简直像浮萍一样。

这位小泽当上自民党干事长后，宣传他的“实力”的正是以中立公正为座右铭的朝日新闻政治部，这一点颇意味深长。后来，朝日抓到了与小泽对决的机会，但是其结果是朝日新闻屈服了，以一个政治版面来宣传小泽，此事尚记忆犹新。坚决贯彻“中立公正！”言犹在耳。

“中国青年报最近对中国青年作了一次对日观的舆论调查，大多数青年回答说不相信日本，这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有关。”

由于桥本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人的对日观一举严峻起来。中国青年报以舆论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有人把话题转向中美关系。有人说“美中关系更为严峻”，这看法并不正确。在中美关系里并不存在如同 50 年前那样的日中关系的历史事实。在某一问题上即使双方的舆论恶化，而

一旦出现另一种光明的话题，双方关系会忽然友好起来。

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暗淡，而日中关系过于严峻。战败后的德法关系曾是这样，可是由于德国人民彻底反省过去，谢罪，进行补偿，建立起了正常的关系。战后的日本与德国的努力相比望尘莫及。

可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要认真对待，中国人本质是宽容的，真正的日中和解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日本人有决心并加以实施，沉重的大门是可以打开的，这是笔者的希望，若如愿以偿，21世纪的亚洲则是光明的。

蒋先生继续谈对日不信任之事。

“中国外交部重视中日关系，总是慎重对待，中国的报纸也是一样。可是日方完全不是这样，一方面说友好，另一方面又为所欲为。”

“中国的核试验并非这一两天的事，是几十年前的事，中国政府每次都发表声明。日本政府发表抗议声明便了事。可是惟有对1996年的核试验，日本政府要求停止试验，不仅如此，甚至采取中断日元贷款的强硬手段。对中国人民而言，这不可思议。使人想起了过去伤人感情的老伤疤。”

笔者也反对中国的核试验，彻底反对拥有核武器，因为核武器是不人道的武器，应该消除地球上的所有武器、弹药。我并非是因为曾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反对，而是反对一切战争。不管以什么理由通过战争来杀人都是不合法的，任何人没有杀人的权利。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反对美国的核武器，必须反对俄罗斯的法国的英国的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也要反对。

实际上，日本没有对美国的核武器说不。不但不反对，还公开声称“要进入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样一来就没有资格反对中国的核试验。中国人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反对所有国家的任何核武器，应为达此目的而努力，这样才有对中国的核武器说不的资格。废弃核武器，反对战争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日中间的领土问题也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关于钓鱼群岛的主权问题，蒋先生批评说，“1978年邓小平在东京会见记者时提议共同开发。对此，日方无理加以否定，而且对日本右翼在岛上修改灯塔一事没有妥善处理。”

以斗争对待对立

日台关系对中国新闻记者来说也是一块心病。

“应该注意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日本对台湾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因而李登辉打算访问日本。李登辉访日令人担心。台湾在闹独立，搞两个中国，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李登辉访美引起美中关系紧张，若李登辉访日，日中关系肯定恶化，非常令人担心。最近，自民党、新进党两党国会议员访台并会见了李登辉。”

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是深深扎在日中之间的刺。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国有理由密切关注。对此掉以轻心处理不当，日中关系会马上紧张起来。可以说，日本国民对此的感觉很迟钝。

“中国和日本是邻居，处于不可分离的关系。友好至关重

要，可是最近对立越来越严重。对此动向有必要进行斗争。”蒋先生说的是，中国一再进行克制，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对此必须进行斗争”显示了他悲壮的决心。对德国学者的提问，蒋先生回答说，“日本的行政财政改革失败，可能向军事方向发展。反之，若改革成功，经济可能得以发展，这样一来将波及亚洲和中国。我期望日本搞成功，以顶住西方对亚洲的经济压力。”

说日本行政财政（经济）改革若失败，日本也许会向军事大国倾斜，这一分析非常透彻。这种事例可谓是好些国家都有过的历史教训，侵略中国之前的日本也不例外。

蒋先生还对德国学者说，“我们必须注意日本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的动向。打算修改宪法第 9 条的国会议员、学者、新闻工作者正在抬头，他们正在放弃反省沉重的过去的正确想法，这的确可怕，值得注意。”修改宪法旨在扩充军备，是走向军事大国的巨大野心。因为日本想在国际社会称霸，其目的绝不是争取宪法所期望的“光彩的地位”。把军事力量变为政治手段的考虑就是肯定军国主义，这只能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

笔者问德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战后德国是怎样处理与邻国的关系的。这位研究员回答说，“阿登纳首相在致力于德国经济复兴的同时，尽力与法国总统友好相处，而且还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重创的法国的经济复兴提出重振经济计划并予以合作。这颇有利于与法国的和解。”

若把德国的做法用到日本身上，日本曾使中国经济破产，作为补偿应全力以赴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可是直到现在日本还舍不得向中国转让技术。真是愚蠢。

1898 年青岛曾是德国的租借地，德国在青岛修建了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曾占领青岛，1922 年归还中国。研讨会休息时，我曾以轻松的口气问德国学者说，“青岛怎么样，是不是有第二故乡之感？”后来我颇有些后悔。

他立即回答说：“第二故乡 胡说八道 这里是中国。”由于侵略中国，在中国住过的日本人中，有人当着中国人的面说是“第二故乡”。我以为或许德国人也那样想，可是从清算了过去的德国人口中，听不到那样的蠢话。德国人真棒。

对此，中国人似乎也很理解，青岛街道房子排列证明了这一点。百年前修建的德国式住宅至今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红色的屋顶给青岛带来异乡风情，压倒了其他都市。相继建成的住宅、公寓屋顶也是清一色的红色。人们乐于接受德国式的青岛。据说数年前科尔首相访问青岛时大受欢迎，我想这是真的。忠实于历史的德国与轻视、掩饰历史的日本差距何其大。

第四章 中国记者的悬念

日本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

中国科技日报驻东京分社记者吴仲国夫妻在北京休假两个月返日后，笔者有机会去拜访他们。那是 1998 年 6 月 29 日晚在东京惠比寿该社分社，我们边吃美味的饺子边聊。

与吴仲国初次见面是日刊工业新闻社在轻井泽举办的讲演会上，我们都作了讲演。这次笔者访问分社的目的是将刚出版的拙著《台湾帮》（数据出版社出版）送给他们。夫妻两人都在北京大学学过日语，因而有了今天的地位，他们对日本情况十分了解。

笔者请他们坦率地谈谈对日本的想法。一开始谈的就是历史问题。

“从总体上说，日本人对那场战争承认是侵略，但在个别事件上却不承认，其中之一是南京大屠杀，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不能容忍的。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讨厌日本人原因之一。”

他不愿再谈大屠杀这件事，言外之意是想说：“没有必要再谈了，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确实，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文部省官僚和历史教师的意图是不提及侵略中国，由于捂了盖子，大多日本人并不了解实情，笔者也

是其中之一。

这是出于无知。由于无知，右翼政治家一说出“大屠杀是虚构的”这种话时，国民也就信以为真。也有不少学者和文化人信仰天皇，见此情况，年轻人突然唱起民族派、国家主义的调子。

但是，如果大多数国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并读了有关书籍的话，就会作出正常反应，正确地理解历史。这是一种补救办法，但是日本人并没有这种机会，于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造成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的根源就是日本文部省官僚推行的义务教育，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不光是右翼政治家，就是中立的国会议员也得按“天皇的官僚”定下的框框行事。1998年日本教科书上好容易才记述随军慰安妇一事，由此可见“天皇的官僚”威力之大。

结果是中国人讨厌没有正视历史的无知的日本人。

难以和日本人对话

从民族、文化的差别方面来说中国人也有讨厌日本的一面。吴仲国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不少共同点。

“用英语说是 open，中美两国人这样表达很清楚，双方如果不满意就吵架，随后妥协。重要的是了解对方想的什么、需要什么 无论如何这是件好事。”

“而与日本人对话则很困难。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好吵

架，说话总是很暧昧，交流困难的原因就在这里：沟通很困难。不知道日本人说的话哪些是真的，不经过认真考虑就很难掌握其要领。”

日本人这种暧昧也使欧美人很为难，这其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苦恼。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吴仲国就降低公寓房租与房东交涉时，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谁都认为，由于不动产价值大跌，降低房租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与这个公寓房东交涉使这个中国记者精疲力尽。房东对善良的租房人不怀善意，讨厌日本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对科技日报东京分社夫妻对这个保障言论自由的日本社会无可奈何地说：“真离奇呵！”

“我们常常想，在日本真的能自由采访吗？我们认为在中国更有这种自由。”他这些话使我颇感意外。

他发牢骚说：“采访防卫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受限制在情理之中，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可是向某个研究机关申请采访竟总不能如愿。希望去采访需在两个月前提出申请，并要求用英文写申请。要是用日文马上就可以写出来，而对中国人却特别要求用英文写。这个研究所是研究钴 60 放射能设备的机关，没有什么秘密，却要两个月才答复。在日本采访真是困难。”

不存在言论自由

笔者亦理解日本社会的保密性。即使是由国民的代表组成的国家政党，如果不是它自己培养的记者，别人也很难了解其

内情。想要写篇反映实际的稿子，却很难与政党及政治家接触。

官方与民间企业一样，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封闭社会。中国记者不满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请用英文提出申请”，这种要求十分令人厌恶，可恶极了。他们真的不愿这样做。强行这样要求会日语的中国记者实在不像话，他们极为愤怒。

外务省的态度也相当恶劣。吴仲国向笔者谈了他的体会。

“外务省允许我去采访冲绳美军基地，但到了那里却不准自由提问，这样的事令人费解。20人的队伍进入冲绳，乘公共汽车进入美军事基地，但外务省的负责人却说‘在东京没申请提问者不许提问’这样我们在采访时不能自由提问。”

这样做是粗暴的。以前没有记者采访过冲绳美军事基地，但从大约十年前起冲绳美军开放美军基地，积极满足国内外记者采访要求，甚至允许记者乘航空母舰并在上面作电视报道。

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实质并无变化。在美军基地不许自由提问，这可能是外务省和美军的决定，真令人费解。

“人们向外务省提抗议，他们就一味说那是美军的决定，外务省的态度实在可笑。我们特地去冲绳采访，结果只是去听听美军宣传部门的宣传就回来了，而对于涉及基地的现状和冲绳县民对美机噪音的愤怒这些问题均不予回答。”

可以认为，日本外务省是由一些并非日本人的特殊人管理的机构，是美军的承包机关，即使不是中国记者也都会这样想。

“日本为何要在冲绳建立这样庞大的军事基地？在中国人

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冲绳的经济落后，人们被噪音骚扰而哭泣，连看电视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冲绳的县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当然当年的太田知事和美军的主张是分歧的。听说美军认为冲绳基地重要，将来也不会交还日本，这是十分离奇的事。能说日本是个独立国家吗？”

日本是独立国家吗？

通过采访冲绳，吴仲国可能亲身体会了外务省和美军的勾结关系。只要有这种经历，谁都会与吴仲国有同样的体会。

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困难处境确实存在，与美国完全不是“对等伙伴”关系，日本不过是美国的附属国而已。

他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日本”远不仅仅如此。

“即使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甚至仅仅是利用原子能，日本也无权单独处理，总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日本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确实，美国曾一度吹嘘日本是经济大国，这是信赖日本还是喜欢日本？这只是幕后操纵的一种手法而已，他们怎么也不会尊重与自己的意见、行动相左的日本。

“日本的金融政策也是这样。这虽然是国内问题，日本也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当时的加藤干事长等人对美国经济政策的露骨介入敢说“不”字，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桥本内阁后期表现出一副可怜相。政府和自民党干事长相继往华盛顿“朝拜”，听取指示。这样做仍然不够，美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还通过媒体对日本经济政策指指点点。这种露骨做

法给日本的民族主义火上加油，以至出现了部分反美情绪动向。

他更进一步说：“中国人的性格和美国人相似，吵了架又和好。中国人民不可能听美国的话，如果江泽民主席听美国人的话，人民就会抗拒。中国人按自己的想法办事，中国是个大国，要管好这么大的国家是困难的。”

中国是中国，绝不是美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美国的准则行事。如果那样做，政权一天都不能维持，中国的领导人对此是十分了解的。

日本人像猫一样老实，像一只得到食饵的狗一样，只是摇摇尾巴。对美国的即使不合理的要求，由于“对方是美国”，早早就举起白旗。我国的外务官僚就是美国人饲养驯服了的狗。

吴仲国认为，这种驯顺并不限于外务官僚，电视、广播等媒体文化亦是一路货色。

电视节目太低级

“恕我直言，我对日本的电视一点兴趣都没有，净是些不值得看的节目，而日本人却没有什牢骚。无聊极了！这是政治、文化水平低的表现，因而谁都没有牢骚，真是不可思议。”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几年前，美国的一位英语教师也说过同样的话，原因可能是制作节目的人缺乏应有的素质，上级也无法检查。电视也好，广播也好，都很粗糙，可以说收取税款的日本广播协会也是这样。

“北京的一般家庭都可看到几十个频道。中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如不强化政权，中国就要四分五裂。”

1972年时中国实际上没有彩电，全是黑白的，但可以使用几个频道不断获取信息，最近频道已经很多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可能比不上日本，但上演的电影质量都是很高的。在中国记者的心目中，日本电视没有什么价值。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一位女性企图靠近参观长城、故宫的这位总统，值勤的警察逮捕了她。日本媒体就此事报道说‘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但如果让我说的话，日本也一样。1990年天皇的次子结婚典礼时也是这样，当时警察就把一名放鞭炮庆祝的年轻人抓了起来。”

“几年前，在大阪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警戒要比中国严厉得多，在大阪周边甚至使用警犬，进入住宿的饭店也要一一检查，要是带照相机，连一张胶卷都不让用。一天还要检查好几次。”

“在北京举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日本电视播出与会场无关的建筑工地现场，称‘中国准备不足，使用帐篷’，帐篷从第一次大会时就已使用，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报纸不了解情况也一齐这样报道。日本媒体为了破坏中国的形象从中捞好处，真是令人生气。”

对妇女大会的历史和传统无知的记者来说，出现这种错误是可笑的。不了解北京情况的记者突然被派到现场采访，做出了愚蠢的事来。

虽然日本观众被愚弄，在东京的中国记者却不可能相信这种谎言。媒体这种报道只能使中国人更加讨厌日本。

外务省会见记者的做法不当

中国记者对在日本采访的不满并不只是科技日报的吴仲国一人，面向中国知识界的光明日报东京分社前社长陈志江也是一样。

“日本政府（外务省）所谓的国际化简要说来就是使用英语，官员使用英语，只是如此而已。”

这是他的挖苦话，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笔者也十分惊讶。外务省在举办面向外国记者的讲演会及记者会见时，只使用英语，不用日语。日本人的英语本来就说的不太好，官僚的英语更是如此，官员用蹩脚的英语解释日本的外交政策。

本来嘛，应该光明正大地用日语解说，由专业译员译成英语，但是我们的外务官僚使用的是蹩脚的英语。毕竟除了一部分外国记者，大多记者都只懂日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中主要成员除讲母语外都讲日语。

在面向外国人的记者俱乐部（日本新闻中心大楼）内，日本政府提供了日本的主要报纸、出版物供会员利用。中国记者除了母语也说日语，因此外务官僚所为似乎在说“反正中国记者能自由自在地使用三国语言”，这不能说是国际化。

于是不能操英语的记者就不能出席外务省的讲演会，就把精力充沛的中国记者排除在外了。他们只能通过当天晚上的电视或第二天的报纸间接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内容。

由此看来，外务省对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采取的态度确

实过于苛刻。这样做并不是国际化，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国家利益的。一想到国民要向这些人纳税，心中就生气。

“中国的外交发言人使用汉语，美国的新闻发言人使用英语，日本外务省应使用日语，对听不懂的记者可以翻译，这样做是很自然的，结果日本的所谓国际化只是美国化。”外务省彻头彻尾把日本变成“为美国服务的日本”，这种恶劣行径再次令人惊讶。

与前首相竹下登最初一起当选的众议院议长伊藤宗一郎对光明日报记者说：“21世纪日本外交基轴需从日美关系转向日中关系，这是自然发展的潮流。虽然从那个方面说我是偏右政治家，但我认为21世纪必须以日中关系为中心。”

笔者认为，“日美关系重要，但日中关系更重要。”伊藤议长也持同样看法。如果考虑21世纪的亚洲，谁都会这样理解。但外务省采取的政策仍然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轻视日中关系。中国记者对日本政府反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随后我请知日派陈志江给日本记者打分。

“我认识的日本记者一般都很认真，工作时间长，报酬当然高。美国记者一面玩一面采访，但是，说到日本记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不能说很深，特点是在细小问题上很了解，在整体上却没有把握好。”

日本记者是见树木不见森林，笔者亦赞成他的分析。

“对天安门事件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的报道是感情用事的，给中国制造了一个阴暗形象。如要客观报道天安门事件，民主派和中国政府两方都要采访，但日本媒体并没有这样做。”

“日本记者报道缺乏责任感，即使报道中国消息，往往只

根据本人的兴趣，摘取一部分稀罕的片断，把个别的极端事例当作全中国都有的事报道出去。”

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媒体受商业拜金主义毒害由来已久，说真话、客观报道的不多，甚至出现被扭曲、常常接近误报的消息也不稀奇。对于报道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中国情况，确实有这种倾向。

媒体报道迟钝

关于最近的日本媒体报道，笔者特别举出印象深刻的例子，听听他的批评。

“媒体对新指针法（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法）的报道姿态从整体上说是支持政府，当然也有批评的，但没有完全反对的。然而日本国民并不完全理解新指针法，大学生中也有不了解其内容的 所以谁都不感到有何危险。”

“不可思议的是，有一部分记者认为新指针法是正确的，因而不能指出问题或严厉批评。报道本来就该慎重，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日本的利益。”

1998年6月笔者曾向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经系二年级至四年级约100名学生提问：“新指针法为何物？”发给他们答卷，让他们写出答案，但没有一个人答对，一大半学生连新指针这个词都不知道。1999年4月调查情况也一样。

1997年秋日美双方签订的新指针法目的是在日本周边有事时，自卫队在后方支援美军的战斗行动及情报活动，这意味自卫队公然参战，这样从根本上否定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

显然违反宪法。

不仅如此，由于恶化了与中国的关系，在亚洲制造紧张气氛，插手亚洲的军扩行动，中国坚决反对由新指针法引起的新的周边事态，这里指的就是“台湾海峡”。

明白地说，因为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在军事上防卫的是中国岛屿之一的台湾。中国政府想到这个问题是当然的，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毋须赘言这会危及日中关系，是与 13 亿中国人民敌对的行为，中国人肯定讨厌日本。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并不向国内详细报道，原因是怕一下引起反日浪潮。另一方面桥本内阁强化日美安保条约后，马上修改新指针法，然后由小渊内阁处理周边事态相关法案，以后要成立有事（战争）法制。

这是多么可怕的阴谋！在国会内成立了除了共产党、社民党的超党派修宪议员联盟，修改宪法第 9 条的动向活跃起来。

由于有了危机体制，确立的是日美产军复合体制，是兵器产业和军队联合，是厌恶和平的无比危险的势力。苏联解体后出现这样大的阴谋，这是日本的危机。

以美军为后盾的自卫队的亚太战略很容易变成中国讨厌的霸权行为。当然中国军方也要求政府加速军队现代化，这样一来，东亚 21 世纪哪还谈得上光明，只能是暗淡无光。在日本经济萧条境况下进行的军备扩张明显地影响了人民大众的生活，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最坏一幕。新指针法实行的结果必然这样，这是 1960 年的安保条约所不能相比的大问题，可是媒体却不予以报道。陈志江指出“这实在离奇”

为什么派出自卫队飞机？

1998年5月印尼发生经济危机时，日本政府很快就派6架自卫队飞机飞往新加坡，当时只有日本把军用飞机派到现场。本来使用民航飞机就足以应付，为什么要派自卫队飞机？现在自卫队飞机是继上次飞往新加坡之后第二次派往海外。陈志江说：“真是离奇。”

“现在航空公司萧条，如果使用民航飞机，民航公司也会高兴。运送侨民用民航飞机完全可以办到，为什么要出动军用飞机？媒体对此事的论调实在奇怪，认为出动军用飞机是正确的，不需要了撤回来也是正确的。媒体对什么都反复报道说是正确的。如果别的国家出动军用飞机或许会有别的看法，但没有哪个国家出动军用飞机，只有日本这样做了。”

“很明显是日本政府的不寻常举动，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认为与新指针法有关。这是往海外派兵、周边事态发生的一次演习，可以说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训练。确实如计划那样，向海内外显示在进行训练，这是在向军事演习靠拢。”

他的分析很尖锐，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记录。媒体如果站在遵守宪法第9条立场上很自然地应作出这样的评价，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媒体靠不住，实在不好办。中国记者不信任日本，实际上是不信任媒体。

“使日本的和平主义束之高阁，根源之一是美国的压力，美国因此而得到好处。根源之二是日本国内存在极力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说是去救出本国侨民，国民很难反对，这就可以

堵住国民的嘴，若使之升级为往海外派兵就危险了。在维和活动中使用武器也从个人使用升格为集体使用，实在令人担心。日本媒体对这种动向不敢说‘不’字，这是十分反常的。”

陈志江是第二次驻日的资深记者，他长期关注日本的右倾动向，因而他的发言很有分量。

“这次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这样一来日本究竟要向何处去？”

他就走向孤立的日本敲起警钟。

“我仍不谈日本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周边的国家都要求和平，世界潮流也这样。亚洲、世界都希望和平，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就困难。但是在永田町确实有老军国主义者、大国主义者和不反省战争的人。”

留下军国主义土壤

中国一直不断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予以极大关注，从不放松警惕。希望世界和平的潮流能阻止扩军势头，防患于未然。“丢掉无益的野心罢！”

“只要看看靖国神社，就清楚地知道还有军国主义残余，还有要利用军事力量保护日本利益的势力，他们是误国的军人，仍企图进行侵略战争，亚洲各国对这些人不能掉以轻心。”

日本的媒体虽然能遮住国民的眼睛，却不可能遮住中国人的眼睛。

“中国不信任日本的缘由有三：一是对历史的认识，二是台湾问题，三是领土问题，现在是第四个新指针法问题。”

1972年处理了前三个问题，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但后来由于日本国内右倾化，原来隐藏在下面的问题又浮上水面。再加上第四个问题，日中关系不但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还有所倒退。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有村山前首相的谈话。与以前相比有进步，但仍有暧昧的地方。即使这样，自民党内还是有人反对因而日本没法受到世界的尊敬。”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要用和平方法解决，但现在出了个新指针法，企图介入台湾问题。美国干预，日本也要干预，这就是制订新指针法的目的，这样一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失去存在意义。”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福田内阁时签订的，园田外相也出了力，背后是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给予支持。当然当时因洛克希德案而行动谨慎的前首相田中角荣也出了力，和平友好条约才得以实现。新指针法给这个和平友好条约泼了冷水。如果新指针法付诸实施，日中间这个重要条约就注定要被废弃。

“对于台湾问题，中国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这是为防备台湾独立。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近乎零，只要看看一国两制的香港就可明白。”

中国对台湾行使武力的前提条件，经常提及的是台湾独立，或第三国武力介入这两种情况，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新指针法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而且日本政府已采取大的措施，对中国来说是件耻辱的事，中国政府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日本的媒体与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它标榜中立公

正、不偏不倚，还宣称要对抗政治权力，可它却屈服于权力，倒退到战前。这意味着媒体的失职。

对于政府违反、抵触宪法的行动，媒体有责任批评促其醒悟，可是报纸、电视放弃了其作为重要的公共舆论工具的责任。中国记者对此抱有警惕。

陈志江得出结论：“日本人的缺点是对事情暧昧，外国人认为是缺乏诚意而无法接受，不能相信。暧昧可说是日本失信的根源。”

媒体宣传中国威胁论

日本媒体对华报道姿态变化的起因是天安门事件。1989年6月4日是分水岭，从那时以来，反华报道继续泛滥，到今天仍留下尾巴。1996年核试验和在台湾海峡的导弹军事演习加快了这一变化。

对这种变化欣喜若狂的是台湾的李登辉政权，他们利用日本美国的台湾帮，煽动反华报道。台湾当局对日美媒体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日本的出版界曾出版污辱中国的书，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而在天安门事件前的报道完全相反，甚至对那场悲惨的文化大革命也喝彩。可是以天安门事件为转折点，突然又骂中国为“罪恶的帝国”。

另一方面，肯定战前的右翼知识分子所写的评论集充斥书店，因而造成的后果是，天安门事件最博得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台湾当局的喝彩。

“中国威胁论”在日、美政府和新闻界好象尖厉的汽笛声突然响了起来。日、美、台外交及防卫当局乘势捞到了意外的好处，现在依然这样。从中国人方面看来，好像是使用他人的兜档布进行角力赛。

“掩盖自己的罪行、虐待对方的不诚实的人。”这是中国人不信任日本、讨厌日本人的根源。“走着瞧吧，我们虽然还弱，但要争口气给你们看看。”反日情绪就这样煽动起来。日中双方都在培植狭隘的民族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何时登台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赵阶琦对笔者的提问是这样回答的：

“1972年2月中国制定领海法，仅在一个月后，‘中国威胁论’即见诸于《产经新闻》、接着是《读卖新闻》版面上，到9月美国即决定向台湾出售最新式的F-16战斗机150架。同时日本决定向美国购买空中预警机AWACS4架。

曾在东京的驻日本大使馆工作过的赵阶琦分析的十分深刻，从他的分析看来，谁得到好处一目了然。

与美军一体化的军需产业要通过出口武器弹药赚大钱。关于美国的产军联合体制，美国军人出身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过“产军联合体制关系到美国主要政策的制订”这样有冲击力的话。在美苏和解、苏联崩溃后，不容分说，仍然要奉行这个体制。

就他们来说只有两种拯救办法，就是寻找第二个苏联和确保有高价的美军兵器出口地。“中国威胁论”正是他们看中的手法。

产经、读卖两家报纸无疑是对宣扬“中国威胁论”起了重要、次要作用。媒体是产军体制实现野心的走卒，重蹈战前复辙，不必赘述。一般都认为《产经新闻》是台湾的报纸、《读卖新闻》是修宪扩军的报纸，这种说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战败后，日本的报纸在和平、民主中觉醒，曾以不偏不倚、中立公正为宗旨活动，但实际并非如此。媒体已回到过去，中国人对日本媒体右倾的担心原因就在这里。

编辑被收买

不可否认向台湾出售武器，导致中美关系恶化，这一点非常明确。硬要这样做的美国，表现出超级大国的傲慢。美国才是军国主义的俘虏。

笔者 1993 年在美国旅行时，曾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询问在美国中西部街上见到的一位官员，他睁大眼睛回答说：“在美国也有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并不是战前日本的专利。只要有军火商人（兵器产业）和军人，人们一疏忽，军国主义者就要显露头角。只要有靠武器、弹药吃饭的人，军国主义就一定会抬头。

为和平而斗争的重要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只要人们认为太平了，对和平的关心就少，活动也少了，修宪扩军派马上掌握政治和社会实权，苛捐杂税就要加在国民的身上。

收买没有信念的编辑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成立第二家读卖新闻、第二家产经新闻也是十分简单的事。如果产军势力和治安当局要利用《文艺春秋》这样的月刊，改变其刊物性质是轻

而易举的。

中国的新闻界人士似乎相信：“日本是个不能忽视的国家，在真正的中日友好建立之前，中国绝不能削弱军力。”

中国人也抱有这样的怀疑：“日本有和平宪法、第 9 条规定不准拥有武力，但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位军费大国，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日本遵守第 9 条，解散自卫队，改变成对付国土灾害的警备队，中国的态度也会改变的。

日本的预警飞机是由波音公司制造的高技术飞机，每架价格高达 550 亿日元，这样的飞机买了 5 架。听说这笔买卖的政治谈判人主要是“金丸信和小泽一郎”，这是自民党防卫人员透露出来的，可以认为属实。防卫厅最初对购买预警飞机是消极的，前防卫厅长官伊藤宗一郎也证实当时厅内的气氛“是这样”。

前防卫厅长官松野赖三是极力反对购买预警飞机的，他说：“即使在美国也已停止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还要买呢？这不是件怪事？”

他愤怒地说：“车也是用旧了的破旧车，为什么要花大钱去买？”他认为一定是金丸、小泽决定的。

当时在永田町人们都说：“金丸信在华盛顿白宫的特别房间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十分高兴。共和党总统成功地把预警飞机卖给日本因而很满意，金丸信在连外国要人也进不了的房间内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购买预警飞机是当时掌握兵器权利的总管金丸信访美时随手带给布什的礼物。”等等。

台湾帮金丸信和小泽与购买预警飞机有关，这点很受人注意。即使在这时，仍十分需要用“中国威胁论”来说服国民。

一般人并不知道那年金丸和小泽曾极为秘密地访问了台湾，因为两人访台是极为保密的。以台湾当局为主，由日、美的台湾帮制造的“中国威胁论”，通过日、美的媒体不断传出，许多日本国民就相信了。这是读卖、产经集团率先帮忙的结果，由此可见日本媒体的轻率和不负责任。

日本媒体的错误报道

“我想问问，所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么日本就有吗？”最初说这话的是中国国家旅游局东京办事处的何琳。

面对困惑的笔者，她接着说：“与我交往的新闻记者中，不少人是相当优秀的人物，但他们平时的观点我没有记下来，我并不认为日本有新闻自由。”

遗憾的是，笔者不得不认为她的观点是正确的，笔者在这方面有过不少体会。那是天安门事件后三个月访问北京时的事。笔者采访了中国当局人士并听了他们谈感想，在打算报道采访情况时，遭到了北京特派记者和报社干部的白眼。很幸运的是报道采用了，那是因为笔者当时身居政治部长要职。

即使是天安门事件，也没有理由不作客观报道。虽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但不能说就要放弃走日中友好这条大道。不去报道对方国家政府的弊政不对，但也不能歪曲报道，作为友人批评对方的过错是应尽的义务，但决不是要断绝关系。天安门事件后，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错误报道，结果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对日本媒体不信任。

光明日报前驻东京记者谢淑敏在东京时为帮助丈夫陈志

江，每天早上都要将送到分社的日本报纸过目。听说与中国报纸相比，她对所谓自由、公正的日本报纸很有感触，但从那时起，她对日本的媒体也产生了疑问。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村山富市首相访问马来西亚时，马哈蒂尔首相确实说过日本不需要再反省战争的话，日本报纸如获至宝突出报道，可以说从那时以来，日本媒体完全变质了。”

笔者要求她再举出具体例子，她举出 1995 年时的报道：

“战后第 50 年对日本是重要的一年，本来应成为迈向 21 世纪的新起点，但并没有看到报纸、电视评论及报道立足于这一视点。”

1995 年时何琳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说来笔者确实惊讶，与其说是对她的了解，毋宁说是自己忘记历史、缺乏觉悟、不负责任，失去做人资格。

于是重新看看 1995 年 8 月时的电视节目，只是长崎、广岛以及冲绳的事。看了这些电视，只能使人想到日本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受害者，完全没有涉及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在朝鲜和台湾的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谢罪和赔偿完全被掩盖起来，日本人成为悲剧的主人公。

为什么不提南京大屠杀和 731 细菌部队？人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在长崎、广岛扔下原子弹？”这方面的报道。媒体的不公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谢淑敏说：“1994 年起就突出报道广岛、长崎，一直持续到 1995 年，而另一方面完全没有报道 50 年前亚洲、中国的悲剧。”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 1998 年 5 月号断定不督促处理银行不良债权的元凶日本大藏省、金融界是“隐藏在日本人中的观音菩萨”，有“对己不利的事总是隐瞒”这种恶习，日本媒体亦应同罪。

即使中国人说出“不知哪一天日本又要复活军国主义”这些话，主导舆论的媒体、代表知识分子的言论界也无法反驳。

“1995 年 8 月和 9 月中国的媒体连续公布未公开发表过的新史实，但日本所有媒体都不予理会，我只能认为日本媒体放弃了正确报道的职责。”

顺便提一下，当时的分社长陈志江就 1996 年 4 月日美首脑发表的日美安保联合声明写了“目的是要遏制中国”的尖锐的解说文章，受到总社的表扬。

中国的报纸也竞争，不学习的记者，不采访的记者大量被淘汰，即使资深记者也不例外。面向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光明日报对驻东京记者的培养是卓有成效的。

中国青年报也向东京派遣年轻的优秀人才，总社在上海的文汇报不久前也启用了中国青年报东京分社社长徐启新，以致力于报道日本。新华社也再度将资深记者张可喜派到东京，全面配备了对日本的报道力量。

鲜为人知的丰田战略的背景

在这里笔者想通过一个插曲介绍错误报道的可怕，受害者就是代表日本车的丰田汽车，该公司实力强大，在日本国内，连日产车也无法赶上。

丰田汽车向中国出口异常顺利（曾听到一些无稽之谈，说中国要人一来，厂方就陪同到厂内参观，有时还送高级轿车等）；全力进军中国市场”是最近的丰田战略。提出这一战略说明中国市场引起了日本明星企业的注意，但是坦率地说太迟了，这种战略失常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人民日报副总编张虎生说：“中国最初要买的汽车就是日本的丰田车，但是丰田公司只想向中国销售，没兴趣向中国提供技术合作，中国不得不与德国、意大利、法国合作发展汽车产业，现在日本的汽车公司后悔了，他们判断错误。”他也断定“这是日本政府政策失败”。据说通产省官僚不准向中国提供技术。

但是可能另外还有别的原因，中国青年报前驻东京分社长苏海河曾与丰田公司领导交换过看法。

1972年时，在一个时期内，北京市内的汽车全是丰田和日产牌的日本车，但现在在北京要找到一辆日本车却不容易。当初中国是鼓励丰田公司来华办厂的，可是没有成效，原因何在？

“现在看来，真的只有羞愧，被日本媒体捉弄了。媒体大量宣传中国政局不稳，企业相信了宣传，因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丰田公司管理人员的原话。

可以说原因在媒体，天安门事件后歪曲报道中国的情况，丰田是受害者。

天安门事件刚过之后，北京的高级饭店确实冷冷清清，但并非全都这样，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纷纷拥向大陆，寻求商机。在日本似乎在等待中国商界来求援的时候，他们已经

进入中国了。在美国也只是政府叫嚷人权，相反经济界却进军北京、上海，今天中国商界的外资称霸者毫无疑问是美国。

由于各国和华侨投资，中国经济大大发展起来。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花了。

日本媒体马上制造中国是经济大国论调。天安门事件后一转又出来个“中国威胁论”、“可怕的中国”论、“偷渡的中国人”、“干坏事的中国人”论。

于是 1972 年以来的日中友好气氛在日本社会上一扫而光。对于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自己好像是非核武器国冠军，突然指摘中国。一向对美国的核试验闭口不谈的日本政府突然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

如果日本进行国际和平活动，同样应愤怒地反对美国、前苏联、英国等的核试验，这种反对核试验的行动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金。实际并非如此。只因对手是中国，才叫嚷“不许进行核试验”。因是日本媒体大合唱，中国人就表示“真岂有此理”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政府、媒体只是像猴子一样跟美国学，这样得不到世界的尊敬。”不少中国人及亚洲各国人民把日本说得一钱不值。

“日本是亚洲的好友吗？”青岛大学兴田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的年轻研究员李旭光晚上到我住的灯光暗淡房间访问时，甚至提出这样朴素的问题。他日语说得不好，但他人品好。

他性格开朗、大胆，是个天生禀性好的青年。他极为认真地说：“请告诉我《产经新闻》是什么样的报纸？”

笔者反问：“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他兴奋地说：“我

两年前就读到《产经新闻》，该报未真实报道中国，净是误报。为什么读了令人生气。”

他似乎认为日本的报纸都是不偏不倚、公正中立的。许多日本国民也有这种误解，现在的大学生也这样理解。这样看来，李旭光的误解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想起，即使美国的知识界也有同样的错误。1993年访美时见到一位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研究人员，他指出《读卖新闻》宣扬修宪这一事实，惊讶地说：“这是真的吗？”

在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为数不多的专家对议会作了深刻的分析、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年富力强的中年研究人员对议会有很大影响力。

这位研究人员是研究亚太问题的，笔者与他就日本宪法的将来交换意见，当笔者一说出“环境正在变化”对修宪不满时，他立即像个日本通似地反驳说：“本泽先生你不必担心，首先是在野党、媒体都反对，自民党一意孤行是徒劳的。”

当笔者说“在议会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媒体也这样”时，他很惊讶地一个劲地追问：“媒体是什么状态？”

笔者说明：“《产经新闻》以前就这样。发行份数占日本首位的《读卖新闻》完全变成了修宪报纸。”这时他十分惊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即使是美国的亚太问题专家对日本的媒体情况也完全是个外行。

这位研究人员与青岛大学的李旭光并没有多大区别。更有甚者，熟悉美国议会的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研究人员鼓励笔者：“修宪？不必担心呀，美国也反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不会答应，欧洲各国当然也一样。”接着笔者用《美国的大警告》

（数据出版社出版）一书向他作了介绍。

虽然这样，使我吃惊的是，中国山东省一所大学的一位年轻研究人员每天都读日本发行的右派报纸《产经新闻》，这对《产经新闻》来说可能是一种荣誉。只是“它报道的中国消息总是别有用心，全是误报”，一点也不可信。

第五章 青岛人的说法

日本人应正视历史

笔者再次受到青岛大学兴田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旭光的邀请，1998年7月14日起再度赴山东青岛市作为期一周的访问。该中心负责人伍海华是该大学的金融学院院长兼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是青岛市有名人士。

一打听年龄，是个才32岁的年轻人，再次使笔者惊讶。给笔者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年轻化，对改革充满热情。日航和全日空将目光瞄向将来，从7月起通航，日本和青岛一下就拉近了距离。这次笔者乘坐日航班机，航空小姐石贺田鹤子、菅野香世两人态度和蔼，令人感动。到处听到旅客高度评价机上服务的声音。

令人高兴的是，包括机长在内的大多数乘务员都强烈关心日中友好、日中经济交流。年轻的菅野通过她认识的中国空姐评论中国人说：“与过去勤劳的日本人一模一样。”她喜欢中国和中国人。

日航青岛办事处主任染川孝一郎说，为了知道中国人的想法，他读了拙著《中国的大警告》（数据出版社出版），并相约去参观“青岛山炮台遗址展览馆”，以了解青岛市的过去。青

岛市外办李汝敏、李毅评价这位日航办事处主任是个“认真的日本人”。令人十分高兴。

青岛大学头号日本通李靖顾问到青岛国际机场迎接笔者。笔者与他多次交流和对话，了解到他是个真正的日本通，这里我想介绍几点。为了叙述清楚，首先介绍一下，他是位 53 岁的资深教授。

他再三阐述日中友好和经济交流的重要性与笔者的立场一致。在日本政府和官僚、政治家中，有敌视中国的势力，这些人是政治、军事大国论者，他们对这样的日本人不会忘记发出“警告”。

“日本没有资源，只有依靠贸易，是个受制约的社会，说起来像是个没有两手两脚或者是手脚受伤的人。日本不能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他忠告说：更有甚者，要想高攀做不到的事，就像什么都想要的幼儿一样。要想实现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是再愚蠢不过了。如果硬要去做，不就重蹈覆辙吗？

他皱起眉头接着说：“简要地说，为了日本的繁荣，和平比什么都重要，应该竭尽全力去争取，但一部分日本人并不打算这样做。”重视历史的中国人，不但不忘却过去，而且以史为训，这就是中国人。

同样，希望日本人也学习历史。道路只有一条，不就是彻底实现和平吗？这就需要亚洲和平、稳定，希望日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日本比美国更坏

使李教授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介入台湾的动向。他说强化日美安保矛头指向台湾，在中国人看来是干涉内政。

“日本人企图策划台湾独立，这是问题所在。日本比美国更坏。美国只是从战略上控制台湾，而日本不同。日本人的意识中总有台湾，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危及中日关系。”

笔者就台湾问题与几位中国学者、政府人士多次对话，但他们都没有像李靖那样抓住问题本质。

日本人认为“台湾是日本势力范围”，战后确实还有这种想法。企图与台湾首届“总统”（蒋介石）交往的台湾帮与战前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夸口说“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在拙著《台湾帮》一书中的访谈亦有持同样主张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有关成员，这个日华恳谈会就是台湾帮的老窝。

李靖在说“日本军国主义”这句话时特别提高声调。对中国学者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过去的亡灵，他们分析这十年来日本的右倾现实使用了这个词，确实表现很贴切。

他还指责说，“现在还有日本人把中国的东三省称为满洲，这就是军国主义。”没有认真学习日中关系史的日本人轻易地走嘴说出“满洲”这两个字，这是常见的例子，但笔者也看到充满军国主义意识的日本人，就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讲话中使用了“支那”一词。

这位青岛大学教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更进一步发出警告，

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国土也广大，如果打起仗来对中国是有利的，即使国家被占领了也能抵抗。”他顺口说出可能再度出现日中战争。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

1972年日中关系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已经20年了。双方的政治家都异口同声说“日中关系顺利发展”。虽然是假设，说日中战争可能发生，这又说明什么呢？

李教授说，今天的日中关系的现实确实严峻。中国人对日观绝不是乐观的，原因有几个，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人对遏制中国政策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国人来说这非同小可。如果根据新指针法日本为防卫台湾而准备战争，就不得不考虑可能再次发生日中战争。就是发生了，中国也不会屈服。

中国学者这种对日观是不能忽视的。日本人应该注意到过错在日本方面，在于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家缺乏见识的言论和行动，正派的日本人对这样的政府和政治家应该说“不”。由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焦躁、紧张、失望。

1998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先前的核武器拥有国以经济制裁手段对待穷国的核试验，没收到效果，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大义。传说“印度是为对抗中国的核武器”。

果真如此吗？听听李教授的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相比，后者远远弱小，因而认为由于巴基斯坦威胁印度才进行核试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一是印度要提高其国际地位，二是要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他还补充说：“当然中国的核武器并不是对抗印度。”

笔者直率地问：“这样说来，还是为对付日本军国主义复

活而准备吧？”说这话时笔者正在所住的中银大酒店附近的餐馆和翻译李旭光、李靖教授共进晚餐。

中国的核武器

我们的谈话是直率的。这位青岛大学教授完全敞开心扉，因而笔者只好失礼地提出质朴的问题。

“中国的核武器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吗？”对这个日本人绝不会在口头上提出的重大疑问，他马上回答：“可能是这样。”从以前日本的狂妄反应看，中国人的担心日益增大，中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是自己喜欢那样做，此乃中国当政者唯一的防卫对策。

笔者的立场是只有坚持否定一切战争的宪法第9条才是日本内外政策的基础，因而应反对一切核试验和拥有核武器。废除核武器应是日本在联合国的外交指针，当然对中国和美国的核武器都说“不”。

笔者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应该率先掌握废除核武器的主导权，日本应把核保护伞奉还美国，日中应合作参加废除核武器的活动。

李靖教授推心置腹与笔者交谈，他谈到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不满以及采取的措施，这些都是容易导致21世纪日本、中国及亚洲蒙上阴影的事情。

可以说他的谈话是在敲警钟：日本人，不要往歧路上走！在谈到对中国的日本威胁论时他说：“由于日本粉饰过去的历史，中国保持警惕。日本成不了德国，染指台湾是最有力的证

据日本威胁论不能抹去。”

饭后他还说：“最重要的是互相开诚布公说真话。”误解造成对立。态度暧昧对外交、安全保障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日中之间，互相不说真话由来已久。他对情况了如指掌，把所想到的都说了出来。他认为日中友好必须有两个条件：两国对历史的认识一致，同时日本停止介入台湾。

中国外交部中也有人认为“日本没有复活军国主义”，这也是日本外交成果，但中国研究人员提出“这是怎么回事”？不同意这种看法。

战后经过 27 年，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期间双方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这不正说明民间交流的重要吗？

青岛大学李旭光研究员利用休息日（7月18日）陪同特地来青岛访问的日本记者游览市容。笔者于 1996 年 12 月、1997 年 5 月两次访问青岛，此次是第 3 次，令笔者吃惊的是到处是韩国文字。此次记者提出希望：“如有历史资料馆，希望能去看看。”

他陪同记者去绿色掩映的中山公园附近的青岛山。山腰上有“青岛山炮台遗址展览馆”，这是今年 3 月份刚落成的两层钢筋水泥的历史资料馆。外面天气异常闷热，但一进入馆内，冷气开放十分凉快。而面对蹂躏青岛市民的种种证据，笔者如坐针毡。

展览馆负责人介绍说：“1998 年 3 月 6 日开馆这一天正好是德国侵略青岛 100 周年。”看看陈列的资料，1897 年 11 月 14 日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就以此为借口入侵，德国海军突

然袭击山东省东海岸的胶州湾，占领青岛。青岛位于胶州湾入口处，这就是胶州湾事件。德国自 1898 年 3 月起租借青岛，把青岛变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到 1922 年归还中国。

在展览馆入口处记述：“1891 年到 1922 年，德国把青岛变为殖民地，以后又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

尾崎行雄的真面目

笔者在展览馆最初注意到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法国。1884 年 8 月法国的军舰企图北上侵略北京、天津，爆发了中法战争。当时清朝的北洋通商大臣是李鸿章，朝廷命令他保卫山东。法国战胜，签订了天津条约，越南成了殖民地。1891 年青岛市命名。

在青岛山炮台展览馆二层展出的全是与日本侵略有关的资料。这里的说明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向德国宣战，占领青岛，日本人的行为比德国人更加卑劣。”

尾崎行雄在日本以清高政治家为人共知，历任大隈内阁法务大臣、东京市长，但从中国方面看，他是个地地道道侵略中国的政治家。

展览馆展出尾崎行雄著《并吞中国策略》一书，笔者看了大吃一惊。同时展出的还有日本驻青岛守卫军最后一任司令官由比光卫著《日本并吞中国之计划书》。

在青岛的日本人 1911 年为 312 人，1915 年 10,000 人，1919 年 24,500 人，1922 年归还青岛时 23,556 人。

展出的资料中亦涉及神社。陪同的李旭光大声说：“那时，中国人经过神社时必须低头。”

资料显示当时青岛市的公路和全市地名全改为日本式，如太平路称为舞鹤町，贵州路称为鸣门町。中国陪同激昂地说：“日本连中国文化也要一扫光。”可以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计划是在青岛制订的。

李旭光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亲日派，25岁。他是第一次来展览馆参观，看到各种各样证据亦大吃一惊。

展出的图片中，有一幅是日本人用军刀砍杀中国人，是把照片放大展示出来的，极像南京大屠杀情景。在日本占领青岛时，极可能已预感到要实行大屠杀这种野蛮行为。

在青岛这块殖民地，日本亦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对妇女和农民普遍实行强制劳动，主要是充当纺织工人，称中国工人为“苦力”，实际就是奴隶。

同时大量进口鸦片，用这种野蛮方法攫取巨额利润。1913年鸦片进口量为1,600斤，到1916年达11,714斤。“满洲国”的基础就在于此。

展览馆也展出抗日运动资料。1912年9月28日孙文发表抗日演说，他是从山东省会济南乘火车到达青岛的。展览亦介绍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学生、群众的领导人。

参观结束后就满头大汗登上青岛山山顶。昔日的炮台已没有踪影，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绿色地毯，给人的印象是和平的青岛山。凉风阵阵吹来，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中国青年的主张

青岛以啤酒城闻名于世。这座城市因盛产啤酒而成了综合娱乐城。在这里除了青岛啤酒，还可以喝到各国名牌啤酒，但无论如何啤酒城的盟主是当地的青岛啤酒厂。

说来青岛啤酒的出现是在 1903 年，在历史上和传统上日本厂家并没有参与。啤酒重振雄风是在 1993 年，1993 年在香港发行股票，筹集 16 亿元，设备全部更新，主要的啤酒生产中心全部用德国设备，同时收购了地方的啤酒公司。1996 年在深圳市联合朝日啤酒公司、伊藤忠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规模。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的生活好起来，家家有了冰箱，城镇的餐馆中人人都以啤酒为饮料，可以说这得感谢邓小平。

青岛啤酒厂年产 90 万吨，市场占有率为 3%，青岛啤酒厂办公室主任蔡志佛自豪地说：“2000 年生产目标是 140 万吨，将市场占有率提高到 7%。”

据他说，在日本殖民地时代也曾引进麒麟啤酒技术，但现在仍用原来的德国技术。

1992 年江泽民国家主席到青岛时赞扬青岛啤酒是“中国第一啤酒”，1996 年朱镕基总理来厂视察时曾说：“中国有名的商品是青岛啤酒和龙井茶。”

最先把青岛变成殖民地的是德国，现在仍然可以见到百年前的德式住宅。德国的科尔总理也访问过青岛，受到市民的热

热烈欢迎。与青岛啤酒相匹敌的是海尔集团，其根也是源自德国，“海尔”二字也是来自德语。

在中国要找出厌恶德国的地方是困难的，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起就使用德国人自豪的高级轿车奔驰。中国轿车之冠“桑塔纳”就是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的产品，上海地铁也是德国企业完成的。现在，在中国人看来，德国人清算了过去，是值得信赖的好伙伴，他们在中国商业领域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进入这个啤酒城，边喝德国制的罐装啤酒，边与青岛大学研究员李旭光聊天。室外好像桑拿浴池那样闷热。笔者向这位中国年轻的日本研究人员问到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印象。

意外中的意外，他一开口说得很干脆：“十分羡慕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中国的资深历史研究员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日本的团体精神可怕”，而年轻学者的认识完全不一样。

他赞扬日本人的勤劳：“中国人没有这种精神，不像日本人那样拼命工作。中国的公务员、工人不好好工作，原因可能是人口过多。与之对比日本人集体努力工作，真令人佩服。”

心胸狭隘的日本人

以前贫困时候的日本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最近怎样了呢？就是团队精神吧，与战前没有两样。日本人好像丧失了个性，完全听从上司的命令，中国人并不是这样。在年轻的中国精英看来，可能认为这是“极好”的精神。

负面情况又是怎样呢？

他用不大熟练的日语果断地说：“日本人心胸狭窄，而且可能是最狭窄的！”问及原因，他说还是与历史有关。

“为什么发生太平洋战争？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人说不明白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不愿意承认事实，为什么会这样，我完全不明白。”

青岛大学有许多日本留学生，年轻人之间可能有交流，可他连续说日本人“不明白”、“不可思议”。他感叹不懂历史、不正视历史的日本人“心胸狭窄”。

中国人是喜欢学历史的国民，这好像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关系。中国人非常喜欢历史，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去寺院，因为那里是历史、文化的宝库，同时也要了解不幸的过去，以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知道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日本人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日本人并不想知道原因，这使中国人感到不安。

“中国人心地广阔，是宽厚的民族，虽然受害很严重，但并不要求任何赔偿，南京大屠杀特别骇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有的日本人连这样的事都不承认，实在令人吃惊。为什么日本人不能正视历史？”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宽大的民族。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军队侵略中国造成的损失是天文数字，但中国不要一分钱赔偿。如果中国要日本赔偿人、物的损失，今天就不会有“经济大国日本”。

仅仅这样，很多日本人佩服中国的伟大，但可悲的是也有很多日本人忘记了这点，给人的印象是得意的日本人好忘却，这对宽大的民族来说是一种威胁。

俗语说：“以怨报德”，中国人对日本人可能就是这样看的。重视历史的中国人和掩盖历史真相的日本人之间的差距难于弥合。如果你是个正派的日本历史教师，就应该抛开偏见访问中国，学习历史，认识和平的重要性，以便教育学生，必须全力教育年轻人。目前这种教师还很少，未曾听说过，这确是事实。

他亦断言：“日本没有真正的政治家。”奇怪的日本，见不得人的日本，掩盖过去的日本，竟然没有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这是年轻的中国学者的看法。如果像德国那样有真正的政治家正视历史、反省、谢罪、赔偿，情况就会不一样，而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

“希望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承认历史，致力于中日友好。”这是中国年轻的日本研究人员的呼声。找到掩盖历史真相的当政者是独裁者的例子不难，但在 21 世纪的社会，独裁者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就是说，日本是独裁国家，并不是在世界上自夸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日本这个国家的国民应该是主人翁（主权者），日本不应是独裁国家，但实际上操纵政治的并不是代表国民的政治家。操纵政治的是官僚，这是违反宪法的。这种情况已延续了 50 年，由“天皇的官僚”操纵政治，是官治。

笔者亦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这种事实，交了很多学费好容易才理解。而在一般的记者中，或者学者、文化人中，也有不了解官治的实际情况的。

像笔者以前那样，大部分国民一定认为政治是代表国民的政治家操纵的，外国人及外国记者更是这样想。

日本的政治课题是需要由官治转变为本来应该实行的民治，日本国民要为实现民治全力以赴，然而可悲的是至今国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这充分说明日本是不幸的。

国民的想法并没有反映到政治中去。官僚的意图是由代表国民的政治家贯彻，一部分企业极力巴结官僚，掌握了官僚就可能用国民的金钱为自己谋利益。

日本战败后宇都宫德马即看透了这种实质，他断定日本是个官僚社会，直截了当谴责这些不承担战败责任与 GHQ（联合国军司令部）合为一体、实行官治的天皇的官僚。

中国人与历史

但是宇都宫德马这一提醒并不为国民理解，到现在官僚的违法和腐败暴露后好容易才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细细想来，宪法已赋予国会立法权，政治家如果认真、身体力行的话，就可以实现民治（民主）。李旭光的观点并没有避开问题的要害。

“中国人不会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祖先。中国的历史悠久，因而要学习历史，这点与日本人不同，我们不可能忘记历史。”

这是以前的事了。菊田一夫写了一本名为《你的名字》的剧本，成了 NHK 很有人气的节目。剧本的副题是“忘却就是忘记过去”。日本人是忘记过去的冠军，但中国人决不会忘记，日本要好好铭记在心。

他也这样说：“我们意识到日本人是惯于忘记历史的。”

“中国人从现在稍稍忘记历史，另一方面日本人心胸要宽

广些，这对中日友好乃是幸事。”

笔者十分佩服他的看法。笔者虽然认为不合适，还是想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稍为疏忽，日本人就更会忘记历史了。为了日本，必须充分重视历史。这就是笔者想向李旭光说的。

笔者想问问他与在青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交流的事。

“坦白地说，日本留学生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过去，而中国学生特别了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留学生对这种情况完全无法理解，而从中国学生方面看，日本留学生的无法理解是不可思议的。”

掩盖历史的日本文部省官僚的真面目被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揭露出来了，被战前战后平安活过来的官僚、特别是管理教育的文部省官僚掩盖了的侵略历史，由日本留学生揭露而暴露出来了。

他也提到：“互相学习两国的历史，对中日交流也有好处。”说的完全正确。德国果断地这样做了，结果成功地与法国、波兰和解。日本仍在犹豫，原因是“天皇的官僚”统治着文部省。

“历史是现实的教师。但一味只谈历史也不好，且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正在加深交流。在不忘历史的同时，面向未来，中日两国国民友好下去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青年这种主张真好，日本的年轻学生也会赞成他的观点。日中两国年轻人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

韩国许多人到青岛来。截止 1998 年 6 月韩国的企业有 1158 家、4000 以上的韩国人常驻在这里，日本企业则有 387

家约 920 人。

笔者请李旭光谈谈对韩国人的印象。他说：“一般说来韩国人性格直率，与直率的中国人正好合得来。韩国人直率、诚实 在青岛受到的评价最高。”

笔者曾向宇都宫德马请教与中国人交往的要诀，他当即说：“要诚实。”对诚实的日本人，中国人会以诚相待，韩国人也对中国人以诚相待，这是韩国商业在山东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中国与日本有所不同

笔者虽不提问，但他就中国的体制主动作说明。

“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如果允许完全自由就会招致混乱。民主、人权都重要，但集中也多少必要。民主集中制符合中国国情。”

“那是 1995 年时的事，我就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与一位日本友人交谈过，但他听不明白。我就这样向他解释，求得他理解。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日本就是日本。各国国情不同，政策和制度也应该有异。各自求得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有了利益，难道不应该说是由于有好的制度吗？日本与中国不同，把美国的制度原封不动地向日本和中国出口并不是件好事，只会造成混乱。”

日、欧、美各国的当政者中，也有人拼命要向中国出口一种相同的制度，要搞垮中国的体制，他们这样做正好证明他们是反共主义者，不是民主主义者，是反民主主义者。

民主主义是以宽容为基本的政治思想，承认多数人的价值，也保护少数人，是一种自由主义，决不是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方法，只有这样民主主义才有价值。

把自己的价值观、尺度强加于人，这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中国就是中国。

李旭光的主张有道理，也是中国的历史教训。中国国内没有统一时，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食饵。集中是重要的，虽然多少会限制些自由也是没办法的。这可能是使中国共产党能堂堂正正统治的办法，这样做对亚洲的稳定也作出了贡献。

如果中国自由化，国内混乱，一部分人成为难民流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半岛和列岛可能要沉没，因此应该允许中国共产党有一点点特权。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也许会想到这样的问题。

他还声称：“我是个现实主义者。”远大理想重要，但在这个广阔的中国现实主义更重要。能堂堂正正地向外国人谈自己和对自己国家的看法，这个 25 岁的中国青年人值得佩服。与日本的年轻人相比，笔者感触颇深。

他也谈及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巨人。

“从根本上说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经济政策稍有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到 80 年代就不符合世界潮流了，而邓小平的政策具体化了。他说不论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所谓现实主义指的就是这件事。”

谈及年轻的中国人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看法，这是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两位巨人的看法。

笔者对他个人的美国观也很有兴趣。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有好的经验，中国要吸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向美国学习的东西很多。现在中国的学生去美国学习，但我直言，并不是要全部吸收。”

“1989年中国的民主派企图将美国的东西全部带进中国，结果失败了。他们了解美国，但不知道什么对中国重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在中国还是要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

李旭光断言，制造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派并没有正确了解中国的实情，“自称民主派的学生被某种势力利用、欺骗。年轻人容易受骗。”

他这种主张的背景是反驳认为玩弄人权是正义的日、欧、美的人权派。人权是重要的，极端重要。那么叫喊人权的美国存在歧视黑人和有色人种，又是为什么呢？哪个国家没有人权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权问题，中国也这样，但解决需要时间。李旭光的观点可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谈到“中国人也有好的东西，珍惜人的生命，释放日本兵，收养留下来的日本孤儿，不要日本赔偿”这些事时，日本人一味感到羞耻，完全应该这样。中国人的确是个宽容的民族。

并非勇敢的日本人

“日本学生只学习汉语，对政治、经济并不关心，相反中

国学生十分关心政治、经济。如果这种差别能改变，21世纪就是亚洲的世纪。”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再度谈及历史。

“中国人喜欢诚心诚意的人、勇敢的人，而日本人并不勇敢，不敢正视50年前的历史就不能说是勇敢。德国人正视过去，在商业上也取得了成就。德国人是勇敢的民族。中国人喜欢历史 因此喜欢正视历史的人。”

听他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十分羞愧。这个25岁的青年用地道的日本话堂堂正正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几年前，德国的科尔总理访问青岛，受到市民的盛大欢迎。对青岛人来说，德国、日本都是侵略者，但德国人对历史抱着谢罪态度，日本人却不愿意。”

“向日本友人作说明时，谈及日本过去的侵略，他们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是真的吗’，我作为中国人，对日本人这种态度十分不满。不知道事实，也不想知道事实，这很不好。在日本人中，正直的人确实很多，但不足之处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我希望中日两国国民共同努力，不忘历史，面向未来。未来是最重要的，因而历史是重要的。”

因为李旭光的观点击中要害，应该说没有日本人能反驳。为了能向日本人传达他的观点，笔者拿起笔来。这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义务。

最后他谈到历史问题的核心——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的政治家去靖国神社参拜，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不符合日本潮流，因为靖国神社是祭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地方，这样做只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笔者问：“那么把战犯牌位拿掉就可以了吧？”他回答说：

“不会把东条等人的牌位拿掉吧，不可能拿掉。”好像他已看穿了本质。他断言：“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谁要是去参拜说明他是把日本侵略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看作是正当的。出于这种理由，中国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不值得称他们为政治家。关于这点，中国人是不会妥协的。”

不少保守议员为了拉选票、为了钱而去参拜靖国神社，也有以官僚身份前去参拜的。以首相身份去参拜的有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两人，对他们不屑一提。他们是些为了争取右翼的日本遗族会的选票而卖力气的政治家。

以上是弱冠之年 25 岁的中国青年（青岛大学研究员）对日本及日本人毫不掩饰的看法。只有倾听、同意他的观点的日本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的真正友人。

日本经济人缺乏远见

这里换个话题。1997 年 5 月 7 日晚在青岛市内带有乡土味的一家旅馆内的房间里，笔者有机会与大连市的大学教授刘先生谈话。大连有不少日本企业。

这是一位“倾注热情拼命招徕日本企业”的教授，一个大知日派。据他说，1969 年时中国大力进行反日教育，但到 1972 年时却一下反过来向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变为中日友好热。从反日急剧转向友好，中国的知识界大都思想混乱，“坦率地说，理解不了政府和党的方针。”

毛泽东一周恩来的政策变化使不少中国人感到困惑。这说

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毛泽东—周恩来路线，就不可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苏对立可以说是诱因之一。反过来说，为了对抗苏联，需要实现日中、日美关系正常化。

1978年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领导——江青等四人帮，邓小平取而代之，一掌握实权，就提出改革开放这一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

“1978年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但1978年以后却变为向日本学习，于是中日交流活跃起来，重视引进外资主要是日本企业进东北（大连）、韩国企业进青岛。”

1984年左右泡沫经济发生前，日本企业落户大连。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就停止进入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刘教授皱起眉头这样说。

自那以后日本企业向中国投资下滑，知日派刘教授对此不满，他叹息：“1984年至1990年日本的做法是令人失望的。”“期望是大的，但期望落空后受到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到大连落户的日本企业只是我预想的一半，很遗憾，很不令人满意。”他像瘪了的气球一样向笔者述说，再三重复“不满意”三个字。

他还说：“特别是日本企业拒绝转让技术更是令人不满意。”为什么这样呢？“日本方面特意只转让落后10年至15年的技术，不愿意转让一流技术。原因是日本担心中国强大。”

他也谈到新日铁公司提供技术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描写宝山钢铁厂建设成功的电视剧，就是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大地之子》。实际上中国方面并不这样看。笔

者从几个中国人那里听到的是：“宝山钢铁厂的建设，由于使用了在日本不再使用的旧设备，中国政府、党都蒙受了损失。”

宝山钢铁厂曾一度成为日本要人参观的有名之地，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向中国转让旧技术可能是真的，问题的根源是恶劣的日本企业及背后操纵的通产省官僚，他们一面合唱“中国威胁论”，另一面只向中国转让旧技术，这种日本人只会惹中国人厌恶。

他很生气地开始述说日本汽车界的不可靠。

“那是 1984 年的事，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方面负责人强烈要求日本汽车业界来中国发展，甚至还提出了优惠措施，可谓竭尽全力，但日本不予理会，这件事日方追悔莫及。”他说这些话时不像个稳重的教授。

这几年丰田公司和本田公司拼命向中国工厂进军，而在 1984 年时，中国首先劝导日本的汽车公司来中国发展，日本方面毫不理会，真是愚蠢之极。

当时由于被日本拒绝，中国转向德国企业（大众汽车公司），这就是在上海生产的“桑塔纳”。

“1986 年我参观上海工厂，一个工人发牢骚说‘为什么日本不来？’他的话给我印象很深，坦率地说是日本企业畏缩不前。从那时以来我对日本企业已完全失望了。”

“无论如何我受到的冲击是大的，我已不再考虑日本汽车公司进军中国的事了。拒绝 13 亿人口市场的中国，其理由是难以想象得出的，况且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方面人士极为希望本来发展。不理睬德国企业而宣传日本，但日本的企业和政府只考虑向中国销售，完全无视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真是令人

失望，很是遗憾，这点至今仍令我不满。”

笔者即使是门外汉，但也理解他那毫无顾虑的态度。就好像一个拼命求爱落空的好青年，日本汽车公司到这里来接受中国的“求爱”才是正当的，却站在相反立场上对待中国的“求爱”。

真是滑稽透顶。从这里可知日本企业经营者的无能，缺乏预见及先发制人必胜的素质，陷入了官僚主义。田中内阁提出了“决断和实行”口号，但对现在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不可指望。

不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最近一个时期，日本的媒体宣传中国商业情况严峻、失败，完全没有报道成功的例子。拼命宣传“不喜欢中国”，这样做实在愚蠢。

媒体叫嚷中国不行，商家就到越南、柬埔寨去，结果日本在中国仅有一点点投资。然而只要考虑一下就明白，拥有 13 亿人口的市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这样好的市场到哪里也找不到。

当然，到越南、柬埔寨投资可以，但对中国需要更加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亚洲、乃至对世界都会有贡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宇都宫德马访华时，对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攻势大吃一惊。“真不愧是德国，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将来。”这位京大经济学部的宇都宫也对有 50 年、100 年战略眼光的德国十分佩服。遗憾的是在日本还没有能与宇都宫相匹敌的经济人，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此亦很不满意。

“日本车曾一度占据中国市场 行驶在大街上的车 100 辆中有 70 至 80 辆是日本车，中国没有那么多车，当然国内要求生产汽车的压力很大，政府也不得不屈从这种压力，日本的经营 者并不知道这种情况。”

一味右倾的日本政治家是引起不满的根源，缺乏预见性的日本经营者也跟着跑。

笔者向这位大连市的大学教授请教“日本企业面临什么课题，”

“不是税金问题吧。目前已取消了对外国企业的优惠政策，估计日本企业对此不满。日本企业不习惯中国的政策变化。”

中国的邓小平战略靠的是廉价劳动力 + 优惠外国投资这两条措施。为吸引投资使用的办法是税制上优惠，其前提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到了一定阶段就取消。

当然对外国投资采取优惠政策会使国内企业受到冷遇。由于外国企业资金实力雄厚，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只有破产。哪个国家都不会在政策上不注意这种情况。

这样经过十几年，对外国企业的优惠政策就取消了。因此日本企业便哇哇叫，这是不对的，只能以同样条件与中国国内企业竞争。由于取消了优惠政策而畏缩不前的经营者，不能算是真正的经营者。

教授还作说明：“这是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证据，是进步的标志。”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加盟 WTO，不能维持优惠外资这种双重标准。

当初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将以低成本生产的产品向海外出

口谋利。今天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效，中国国内的销售渠道亦已打开，这种情况是以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明白地说，不要对取消优惠政策一味追究，应该去问问丧失进取精神的日本企业家有什么样的素质。

1995年在武汉大学访问时，武汉大学的年轻研究生向笔者讲了十分有趣的事。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中国政府举行50周年纪念活动。学校内举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学校领导很担心在对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是否会引起摩擦。”

战后50周年时，日本国会围绕不再战决议产生混乱。右翼的日本遗族会为反对不再战决议征集签名，向自民党施加压力。

在中国，由于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呼吁年轻人认识学习过去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当然日本军国主义是攻击靶子。

由于日本国内的右倾影响，大学当局十分警惕“日本留学生是否会反感”。

结果当局是杞人忧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听说有关人士松了一口气。武汉大学这位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样说明原因：“实际上我也担心会出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时日本留学生象往常一样，兴趣仍是踢足球等运动，原因是日本学生并不知道过去的事。”

这不是说笑话，是实际情况。不了解历史的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年轻人，或许小泽一郎也是其中之一。他经常去台湾，不想去大陆那样重要的地方。如果是认真正视过去的政治家，就

一定去中国。去过中国的国会议员，也有不少是不知道过去的。

1997年9月笔者从南京回国途中，顺道访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桥本总领事叹息：“真令人吃惊，到上海来访问的年轻国会议员竟然连过去上海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真是羞耻！”

笔者听了他的话，无言以对。那是意料中的事，很伤脑筋。日本的第二代议员过多，他们去美国留学，学会了吸大麻，但并不想学习50年前的历史。如有幸去夏威夷，只是“想起珍珠港”。可是美军参战的背景、日军侵略中国有关史实都不知道，可以说连造成伤亡3500万人的世纪野蛮暴行的原因都不知道。

年轻的国会议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也不足为奇，因为没有学过，所以不知道。

1997年笔者在二松学舍大学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笔者让国际政经系300多学生读笔者在前一年写的《中国大警告》（数据出版社出版）一书，问他们有何感想。大多数学生这样写道：“完全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样严重，作为日本人感到羞耻。日本政府做出这样恶劣行径却不愿谢罪，连小学生都不如。”

学生在感想中提到初中、高中历史课“没有教”，真是令人吃惊。因而访问上海的年轻的第二代国会议员不知道过去日军的野蛮行为，并不足为奇。

武汉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可能是日本的高中毕业生或者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没有学过“历史”的不幸学生，因而即使中国

学生热情地投入反法西斯活动的学习，他们甚至连这样做有何意义都无法理解。

“闭眼不看过去 对未来是盲目的”德国前总统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即使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这位前总统的话也是十分正确的。因而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是暗淡的。

这是武汉大学年轻研究人员的不安，也是笔者所担心的。这是日本教育界的缺陷，亦是日本尚未国际化的表现。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一种耻辱，决不允许重演。要吸取教训，不能忘记历史。但是重要的是日本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很可怕的。”

“我研究的课题是经济。发展经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重要的，从这点看中日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对历史有共同认识是基础。”

对日本历史教育的不满是非同小可的事。

第六章 坏日本人和好日本人

日益增大的对华交流

从 5 年前起，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数扶摇直上，旅游和商务来华的人数都有了火爆性的增加，总之，中国国家旅游局似乎是笑不停口。虽然亚洲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但是大中国的魅力仍然不减。

作为接受一方的这个国家，最近反而派出了旅游客人。中韩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例。

1997 年 1 月，该旅游局日本负责人张西龙在北京国际饭店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 1996 年）终于突破了 150 万人的大关。”这位肤色白净，西安出生的旅游局的尖子笑着说道。这正是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数字。四五年前，他在东京时说：“希望超过 100 万人大关。”那仿佛是一种臆语。

这 150 万人中商务和旅游的比例是 6:4。日本对华的商务投资大大落后于欧美和台湾，即使如此，这一比例也说明日本对华的商务投资正在不断增加。

经济增长时期的日本企业集中投资在韩国和台湾。这些地区的成本上涨后，又把工厂转移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

亚，对中国虽也开始伸手，但不是那么明显，之后突然又把目光转向了越南和柬埔寨。

媒体推波助澜，其背后很可能是由外务省和通产省的官僚们进行着操纵。“中国的商务失败了”；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政局变得不稳定”等信息到处泛滥。媒体以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契机，明显地在制造这种气氛。

像落潮似的，日中经济交流陷入低潮。抓住这一良机的是美国经济界，其次是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侨。日本的愚蠢给欧美势力以最好的礼品（中国商务），这既是日本企业谦虚的结果，也是傲慢的日本经济界人士无主见所致。

后来，东西方冷战结构解冻，带来国际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使日本的地基显著下沉，加之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造成金融和大建设公司的脑死状态，挨了两拳猛击之后，部分日本企业好不容易才悟到中国市场，再次向大中国进军。张西龙先生提供的数据如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 1996 年的实际情况看，到中国的韩国人已突破了 70 万人大关。商务和旅游的比例是 5:5。“在中韩邦交正常化之前，韩方来华投资集中在山东省，但是，现在已遍及全中国。韩国的经营者动手迅速。”这一点教育了我们。

不过，1997 年以来，韩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危机，山东省也受到它的影响。韩国的金大中政权的应对，不像日本那样，政财界官僚团结在一起，能够坚决进行公正的经济改革。从这一点来看，在不久的将来，韩国是会渡过危机的。

而日本在 1990 年至 1998 年漫长的期间内一直隐瞒了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造成的银行和大建设公司不良债权的处理问

题，仅处理其中的一个问题也需要数年的时间，严重的经济状态引起了政治上的混乱和模糊状态。

压缩公务员的工资、减少半数公务人员等断然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可悲的是在日本，从自民党到共产党，谁也不动手处理。

中国以三年为目标认真对待减少半数公务员、实行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改革，这是需要惊人的改革能量的。但在这个国家里，党和国家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请廉洁的朱镕基总理担任负责人，13亿人民把全部的信任寄托于他身上。

“这是非常严厉的改革，即使如此，如果能搞出点眉目来的话，21世纪的中国前景是光明的。”1998年4月，在访问他的北京住所时，首屈一指的知日派人士肖向前曾斩钉截铁地断

聪明的美国人

张西龙先生提供了如下的资料，令人十分信服。

“1996年美国共有60万人访华，增加的速度很快。政治方面虽有些摇摆，但经济方面进行得很顺利，不消说，这60万人是以商务为中心的。1997年会增加得更多。”他充满信心地说道。

美国在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民主派活动家问题上像每年的例行活动似地谴责着中国。中美的政治关系一直不太顺利。一涉及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双方的不信任就难以消除。

但是，美国经济界人士很聪明。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的逻

辑，向地球上最大的大市场挺进。美国经济界终于抑制住国内的台湾帮和人权派，于 1998 年 6 月把克林顿总统送进了中国，以经济推动了政治。

许多经济界人士随同总统访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自然很感激。新的谈判相继进行。中美接近，使美国人由商务扩展到了旅游。按照张西龙先生的说法，可以说，“美国人访华有了火爆的增长。”

访华的外国人中居第四位的是俄国人。的确，在靠近北京火车站的国际饭店里，映入眼帘的外国人，多数是俄国人。在苏联崩溃之后，俄国人到中国采购，成为一种时尚。他们在北京住廉价的旅社，而且常常肩背手提着数倍于身体体积的商品跑进北京火车站。

这种情况现在如何呢？他们变成了暴发户，住进了北京一流的饭店。据说，从前俄国人“小商贩”的地位就比较高。

他还向我讲述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情况。访日的中国人已达 30 万人，到新加坡等东南亚旅游的中国人也已达 30 万人。

据说“(中国)共有 400 万人出国”这说明中国人腰包里的钱增多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外国人用“贫困”来形容中国，但是今天这种表达方法已经不通用了。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变成了富翁。

人们手里有了钱，也许就想到境外去旅行。开始时去香港、台湾，继而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出境的人已达 100 万人之多，1998 年共有 842 万人出境。

中国领导人热心于邀请世界各国的人访问中国。江泽民主

席在 1997 年新年讲话中说：“欢迎世界各国的人们访问中国。”李鹏总理（当时）在发表演说时说：“让外国人直接看看中国至为重要，这样能够让他们改变错误的中国观，总之，百闻不如一见。人民之间的交流最为重要。”

中国国家旅游局张西龙先生也强调：“如果直接接触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威胁论等就会消除了。如果许多外国人来华访问，从中会产生商机，也会搜集到许多信息。因此，民间交流很重要。”从党和政府领导人乃至一般干部的口中听开放中国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来说，是令人感到欢快的。

他们还认为“外国人的来访，有利于地方城市的治安、卫生和人们的意识”。中国的国际化，使国内政策也变得高级了。

日本人太傲慢

“旅游事业有利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可是，日本在接受外国人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为什么日本人在国外朋友很少呢？值得思考。”

张西龙先生突然对日本做了一个带有请求性的发言。这究竟又是为什么？是什么激怒了他呢？我很想听一听。

“也许日本人有钱，但如果让我坦率地说，那就是傲慢，认为自己了不起！”

他是中国国家旅游局负责日本工作的资深职员，同许多日本人有过接触。为了宣传中国的旅游，曾带领无数的日本记者访问中国各地，认识各种各样的日本人，十分细致地了解过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他分析日本在外国没有真正朋友的原因时，指出“问题在于那种自认为了不起的傲慢态度”。过去，东南亚的人也常常指出这一问题，但是，被中国人的尖子再这么一说，我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是多么严重。

不久前，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我的朋友柏谷秀男律师，每月都召集麻布高等学校毕业的人聚会，举行虎之门讨论会，演讲人由会员轮流担任。1998年6月12日的讨论会，演讲人由日本电气公司海外调查统辖部部长桑原孝担任。

他以“通过个人电脑事业看到的中国商务”为题发表演讲，他常常到上海出差，负责指导日本电气公司（NEC）和中国企业合资生产个人电脑的合资公司。桑原十分注意开展同中国社会的交流，中国人很信任他，是深受信任的日本人之一。

他在谈话中向我漏了这么一句话：“许多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这可真不好办！”在日本商人中摆架子的日本人确实不少。在白种人社会中看不到的日本人这种令人讨厌的可耻的品质，可以说是某种民族歧视，它证明：日本人从根本上来说，尚未确立起人权意识。

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虽说我不认为这是战前民族优势教育的延长，但是在曾经遭受日军侵略的亚洲各国的人民看来，自然会误解为军国主义依然缠绕在日本人身上。教育中存在着原因。

轻视别人的“官僚意识”最浓厚的势力是东大学阀出身的官僚们。在他们看来，政治家也没个样子，问题存在于接受他

的一方。许多到国外去的日本人都让小东大官僚给予关照，流露出这种“官僚”意识，这样就很难获得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张西龙先生的指责完全正确。

他进一步说道：

“日本旅游客人到哪里都是集体行动，而不同市民进行对话和交流。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的旅客有很大的差异。”

“大家一起走 闯红灯也不怕。”就是这个意思。在旅游地这种集体主义也没有改变。“并非仅仅是语言问题”，外国人眼里是这样看的。1993年，笔者在美国旅行一个月左右，在各地美国人都是这样说的。他们指责“日本人不想融进美国社会之中，而把自己的社会封锁起来”，“日本人不想融进中国社会，偏偏净说中国人的坏话，这是毫无说服力的。”日本留学生不少就是这么一帮家伙。

“在这个工作中感到的是，日本在接受外国人时的态度是不好的，务必请你们改善一下。”

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当时的）法务大臣秦野章也曾明确地说过，入境审查官员尤其如此。对于外国人不要以“官僚”意识来应对。

“下飞机以后接受入境审查，日本人和外国人是区别对待的。日本人那一边，“嘭！嘭！”地盖上章顺利通过，而外国人那一边窗口少，排起了长队，要等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种拒客于门外的姿态。通常应优先外国人或同等对待。到日本去时，最先碰到入境审查，就让人感到烦躁而讨厌起日本来了。怎么会这样呢？令人费解。”

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对外国人的入境审查、无论怎么

说，都不是对待客人那样亲切的态度，真是不像话。法务省应该对审查官进行再教育，马上改正态度。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能改变（对方）严厉的对日观。

“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领事部申请签证时，总是令人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不能说是亲切的。”

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产生同样感觉的日本人不少。他们由于工作量太大，所以才冷淡。但是，国外的日本大使馆领事负责人则有必要改进工作态度，这是外务省的职责内就能够处理的事情。

中国人在申请签证时产生不愉快的心情，后来在入境审查中又遇到令人厌烦的事而不能忍受。还不仅如此。

令人厌恶的大门口

“海关检查行李时 检查官问道，‘带手枪了吗？’实在是太失礼了。日本的高科技是世界一流的，用那么野蛮的口吻询问之前，不能先用机械检查一下吗？这简直是一种对待罪犯的态度，这一句话，就决定人们讨厌日本了。令人感到遗憾！”

张西龙先生是三十多岁的优秀干部，性格明朗，是一位令人产生好感的中国男性，在日本的名声也极好。他根据自己和同事们的体验，给我们讲述了事实。

日本竟存在着询问“带手枪了吗”的恶劣的检查官，真是令人大吃一惊。这种质问不是对暴力团才提出的吗？真是野蛮的独裁国家的做法。

国与国的关系，不允许存在上下关系，像人与人的关系那

样。可是日本对中国却采取歧视态度，而没有贯彻对等原则。这是审查旅游签证时发生的事。

“中国对日本人发放旅游签证，这是很普通的事。可是，日本对中国却不承认旅游签证。今年（1997年）4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但是又附加了年龄限制和收入等种种条件。”

“净是些苛刻的条件！在澳大利亚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以签发，而邻国的日本却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这是歧视！是很严重的问题！”

日本官僚们的头脑有些失常。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什么大人物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国际化呢？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对本国国民如此，对外国人也显示出一种“官僚”意识，而且把它升格得像法律似的。即便不是张西龙，换了别人也会悻然大怒的。

他开始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位朋友到日本入境时卷入了纠葛的一件事。

“我的同学在千叶县的一家建设公司里工作，由于这种关系，从中国沈阳市进口铺装公路用的石头。因此，决定邀请沈阳公司的负责人去日本。他是根据研修制度入境日本的，但是在成田机场却被海关扣起来了。”

“见他总也不出来，我的朋友找海关进行交涉，对方说因为在非法逗留者名单上有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拘留了。虽然提出了抗议，但是对方不予理睬。请想一想吧！13亿人口的中国，有多少相同的姓名啊！”

“他们把那位中国人带到另一间屋里，想详细询问情况，但是语言不通，结果把他拘留起来，海关人员不但不听我那位

朋友的说明，态度也很粗暴。来自沈阳的这位中国人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一直感到焦躁不安。”

“(日方)建设公司总经理听到我那位朋友的报告，火冒三丈，愤怒地提出抗议，但是，海关却硬说要遣返！”总经理说：“你认错人了。”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要向你们的上司投诉！”并举出了政治家的姓名，这时海关职员才作了让步。

“那位中国人足足被拘留了四个小时，但官方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根本不讲人权。他是一位研修生，有保证人，有日方的公司，访问单位一清二楚。如果真是非法逗留者的话，那么可以进行搜查嘛！总而言之，日本的人权主义，对外国人是不适用的。这位中国人说下次再也不想去日本了。”

人是平等的。根本的问题可以说是人权教育进行得不彻底。只要稍微能为别人着想或有点同情心的话，那么，这么点事根本不成问题。

“机场和港口是日本的大门，是迎送外国客人的地方。如果入境审查官和海关职员认识这一点的话，问题就会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由于把客人断定为罪犯，所以才发生了纠纷，这就是反日和厌日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由像秦野章法务大臣那样的政治家主管法务省和外务省的话，问题肯定可以得到改善。

就任法务大臣或外务大臣的人，应首先去视察一下空中和海上的大门。

“在国外没有朋友的日本人”变成了孤家寡人、国际孤儿，这暗示着日本将处于孤立。

中日友好协会的肖向前先生说：“中国人能够尊敬的日本

政治家是大平正芳前首相，其理由是大平先生有一种日本人最欠缺的对第三者、对别人的同情心。”

日本人也有好的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我听到了一席有趣的话。说这话的是日本玩具商“万泰”（音译）的合资企业（福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铭森，他也兼任福万香港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办公室设在有香港“银座街”之称的金钟道。

1 月 18 日下午 2 时左右我们在附近一家餐厅一起吃午饭。在宽敞的餐厅里，到了这么晚的时间，依然是热热闹闹的一片盛况，由于不动产和股票热，这个自由贸易港里，感受到节日气氛的人们沸沸腾腾。

香港饮水靠大陆供应，人们洗脸用海水。处境困难的香港商人商业活动却十分活跃，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登堂入室。例如家用的电话，整天使用也不要钱，没有工作的人拼命地打电话，就找到了新的商机。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的优势虽有所减弱，但是人们坚信，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仍会压倒上海，回归之后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林铭森率领的福万经营得很顺利，由于生产深受欢迎的“电子小鸡”而利润倍增。

他多次说：“这都是托睦浦先生的福啊。”所谓睦浦先生是指日本人而言，是万泰派驻福万的人物。“没有睦浦先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福万，万泰真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好人。万泰的领导人真是了不起。”他轻松地说道。

“说起来，万泰当时的总经理真了不起。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他们是为了日中友好而建立合资公司的，他着眼于日中友好，在福州建立了公司。”

不消说，万泰也是一家企业，并不会胡乱进入福州的。当时北京和上海都是投资的有力候选地区，但是最终选定了福州。据万泰公司总经理说，福州人不说假话，态度认真，而且有技术。“市政府热心，对我们也很有利。万泰派睦浦先生常驻五年之久。”他笑容满面地这样说道。

使福万副总经理如此感动的这位叫睦浦的日本人，究竟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总而言之，他人品好。大学毕业，又懂技术。最重要是同中国人认真地进行交往，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能够耐心地听取中国人的意见，因此，从没有吵过架。他耐心地传授日本的经验，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在五年间把自己二十几年累积的能力全部倾注出来了。”以无私的心为公司尽力，每当发生严重问题时，他总是率先认真地对待，是最辛苦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一切都是为了中日友好，令人经常受到感动，真是可敬的人。今天的繁荣完全托睦浦先生的福。我们之间能够坦诚地进行交往。他对中国人和蔼可亲，我们很尊敬万泰的领导人睦浦先生。”

福万的工作人员从两位日本人看日本，寄予日本和日本人以信任。这真是罕见的事例，但这是事实。

纠纷来自感情纠葛

林铭森先生谈到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发生纠纷的原因时作了如下的分析：

“日本企业中的纠纷大致是来自感情的纠葛。因为日本经营者不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国民的感情，这是感情问题，是人心问题。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这种感情。真心、诚实是决定胜败的招数，睦浦先生则是有真心的。”

“感情问题之一是同过去的历史问题有关，也许可以说是共有的历史认识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即使面临困难也不逃跑，而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而是满怀信心地拼命加以克服。对这种态度，中国人也会以相同的感情来回报你。这就是中国人。以心换心的交往是牢固的，可以说这是成功的秘诀。”

福万公司是 1985 年设立的，当时职工只有 100 人，到 1997 年 1 月，已超过了 2000 人。

“同中国人的交往要以诚相待。就是要诚实。如果真心实意相待，必定也能取得对方的信任。没有诚意的人，是得不到别人信任的！”以前这样教导我的是宇都宫德马先生。他和福万公司副总经理的说法完全一致。

尊敬两位日本人的林铭森先生向我披露了这样的目标：

“如果中日关系友好地团结下去，就不会遭受白人（欧美国家）的欺负。日本的技术和资本，同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很

好地结合起来，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相反，则会被欧美所压倒。因此，我要把中日友好向子子孙孙传下去，这是我的使命。”

“真正的政治家考虑到中日友好，心胸狭窄的政治家则着眼于自身的利益而行动。从这一点来看，田中角荣是作为真正的政治家而受到人们尊敬。”

53岁的福万公司副总经理不断呼吁中日友好，真是令人高兴。他并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如此才服从的。两位日本人对中日友好真挚的努力，令他感动，这是他的亲身体会。

中日友好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 21 世纪亚洲的未来。如此，建设繁荣、和平的亚洲自然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香港的年轻人

我在香港遇到从大陆顺利进入这一地区的一家人，这就是陈德辉的一家，他 38 岁。“我是前年独自一个人来这里的，住在一间狭小的简易公寓里，从早到晚干活，直到天黑时才回来。后来把儿子也接来，让他打工。”早婚的陈德辉现在有妻子、两个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一家五口，靠贷款购买了一套高层公寓，全家生活得很好。

“回归中国以后的香港未来会如何呢？起码三年内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共产党注重面子，即使有些勉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支持香港。这样下去，没有什么不满的。”

“我听说，为了避免北京市场发生混乱，政府在香港投资 4000 亿元。这是稳定香港的措施，没有可担心之处！”

对于一个中年男子来说，一家团聚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挑剔的。22岁和18岁的两个儿子都在工作，妻子也在打工，他对于偿还200万港币的贷款利息充满自信。

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则从另外的角度看香港回归。年轻人既讨厌政治又讨厌警察，他那个18岁的儿子说：“政治太可怕，它一变，生活也就变，令人感到不安。此外，公安（警察）老瞪眼盯着你，这不就失去自由了吗？”

在香港已生活数年的陈德辉先生，对狭小的香港是十分了解内情的，他正关注着太子党的动向。“他们借老子的光发财，他们是腐败的首恶。”可以说，这是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在民主主义尚未确立的国家里，第二代人的冒进尤为显著。日本也是第二代人世袭社会，他们对变革的反应迟钝是推迟变革的阻力。

38岁的他一直希望尽快地看透在香港社会暗中活动的这股伤风败俗的恶势力的实质。百姓、大众虽然无知，却是聪慧的。

据说，香港许多有钱人对香港回归中国感到不安，但是，从大陆来港不久的像百姓代表似的陈德辉的夫人却不介意。她笑着说道：“由于我们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所以觉得没事！只要干活就能够活下去。只要有工作，就不必担心。”她也是中国女强人之一。

我还见到他们的一位亲戚，她是在美国结婚的，现年28岁，由于生孩子回到了父母的娘家来。当时媒体都报道说美国经济景气，但是她当即予以否定，而且说“如果香港回归之后，没有变化的话，我们想从美国回来。”

从大陆刚来港的 22 岁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就公安警察问题展开了有趣的争论。

“在福州，一次乘出租车，警察说我没有付钱而进行拘留。而香港的警察在餐厅吃饭如数付钱，也不抽烟，还脱了警服。”

他来香港之前一直住在福建省的福州市。目前在香港的一家餐厅干活。他根据自己亲身体验讲述了大陆和香港警察的差异。

对此，他的女友进行了反驳。她是该省一所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她说：“坏警察仅是少数人，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他对福州抱有一种极坏的印象。他打断她的话反驳说：“香港的警察态度和蔼，问路时能够认真作答。餐厅里发生问题，打个电话，五分钟就会来，发句牢骚也不生气。在这方面，中国则完全不同。”

父亲是地方政府干部的女朋友也不示弱。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回归。下一步是澳门和台湾，香港是他们的样板。所以，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我相信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这是好事。对那些坏警察是不会置之不管的。”

笔者记录了他们两人的争论。在日本记者的面前，两位年轻人进行着自由而活泼的争论，对此我从内心表示欢迎。

近来在香港，为反对日本右翼团体在尖阁群岛（钓鱼岛）修建灯塔而举行反日游行示威。“对政治毫无兴趣”的陈德辉先生也参加了抗日示威游行。我问是何原因？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可以领取 400 港币的津贴。”参加领津贴的示威游行，这日本的工会很相似。

这位先生的两个儿子都说：“在电视里看了这件事。但赚

钱更加重要。”旅居美国的那位女亲戚笑着说：“我在美国也看了有关这件事的电视。旅美华人知道此事，如果能领到 200 美元 我每天都去参加。”

在老百姓眼中，严重的领土问题仅如此而已。他们全家对于重视普通话表示关注地说：“在香港出现了普通话热潮。从前这是被人们忽视的，但是在回归后，情况为之一变。真好啊！”

我试想变个话题。在战后 50 年的 1995 年，在中国，根据史实摄制了《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在中国各地成为人们的话题，不知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一家之主有些兴奋地答道：“《南京大屠杀》那部电影真是令人吃惊，我看了好几遍。它是基于事实拍的。”两个儿子中的哥哥说：“在香港有录像带出售，我也买来看了。我还看过 731 部队的录像带。”弟弟说：“我在电影院里看过一次，也看过录像带。”

父子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恨日本人，非常讨厌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不人道，同样都是人，可是为什么只有日本人才干出那么残酷的事来呢？”对于香港的未来看法各异的陈德辉一家人，一谈起过去的历史，看法就一致了。

在福州看过南京大屠杀影片的（儿子）女朋友难过地说道：“我看过三次，每次都流泪不止，无法入睡。”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作为日本人的笔者。

一位在电力公司工作的 40 多岁的男子插话，他双手抱着年幼的孩子，他是旅居美国的那位女性的父亲。

“我们这一代人决不能忘记过去。我认为，两国人民是友

好的，但是日本政治家是危险的。例如，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为什么不把那些史实告诉孩子们呢？”

在此之前一直哄着外孙，对周围的争论漠不关心的稳健的中年男子，话题转向历史问题之后突然开口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说话不多的陈德辉夫人也开了口。“中国人是很善良的，可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残酷呢？他们也有老婆、孩子吧，军队和军队打仗，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日本兵却欺负和杀害一般老百姓。我听祖母说，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日本兵的欺负，她把脸上涂满黑墨 好不容易才脱了险。”

旅居美国俄亥俄州的 28 岁的女子，似乎想起了在美留学时的情景开始说话。

“日本留学生根本不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说那全是谎言，不相信我们所说的情况。去年，我也看了《南京大屠杀》影片，心中十分难过，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尽管这样，日本的年轻人不了解过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许今天的日本人确实不错，但是，我们不能信任丝毫不了解过去的日本人。”

13 亿人口的中国重视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香港普通老百姓家里，一家的普通团聚也议论历史。

第七章 胡来的政治家与 日中青年的呼声

靠不住的为政者

一部分官僚和国会议员刺激中国人感情的愚蠢行为，就是不正视、轻视历史和介入台湾这两个问题。后者是中国内政的最大课题，前者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史无前例的侵略造成的。

可以说这是日中关系正常化进展迟缓的原因。德国与邻国成功和解而日本却不愿意和解，这决定了两国的差异。即使是在 1998 年迎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0 周年时，双方的隔阂依然存在，其根源是日本政府和政治家对上述两个问题大放厥词，这当然损害了 13 亿人的感情。

作为主权者的日本国民只要今后仍然容忍这些恶劣的当政者和官僚，日本人就不会得到中国人的信任。不但是中国，全世界也这样。德国的亲日派忠告：“日本应与过去诀别，”是对孤立的日本抱有悬念。

但是，对日本来说严重的是，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日中间这种理所当然的纠葛可以说完全不理解，完全不懂，这也是大众媒体应负的责任。重要的媒体编辑权在电视方面是被邮政官僚、新闻方面是被银行等企业资助者所控制，很难反映出

实情。

日中间存在的对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无论哪一个问题都要使主权者理解和认识，这是当政者和媒体的课题。如果这两件事做好了，21世纪的日中关系、亚洲的和平和稳定也就有了保障。本书写作的目的也就在此。

主权者即便对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真的有所认识，也不能归功于那些靠不住的政治家。公职人员应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新指针应废除，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活跃日中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21世纪一定会名符其实地成为亚洲世纪、幸福繁荣的世纪。

但是面对这一大好潮流，顺应的势力和倒行逆施的势力正在政界和媒体界斗争。相当多的知识界明知而默认，也有学者狡辩说“靖国神社就是文化”，这样一来无法谈得上相互理解。

以前，知识界人士向邻国和欧美的研究人员解释说：“不久之后，右翼犯罪分子和国家主义者就会老死，以后学习和平宪法的一代就成为主流，不必担心。”即使到现在，也还有人向外国人作这样的解释。

但是从1985年起，接着是到1993年以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定了这种乐观看法。当时任人民日报国际版主编的张虎生尖锐地指出：“战后50周年的1995年以后的中日关系不妙。”在这之前一直受日中两国政府甜蜜的外交辞令毒害的笔者，听了他这句话，像是遭雷击那样受冲击。

后来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1998年仍然是甜蜜的外交辞令。两国友好的基础像是建在沙堆上的楼阁那样危险，因而为了日中友好而不断努力，在日本更为需要。

中国关注年轻一代

几年前笔者在北京会见面向中国年轻人的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徐祝庆时，他说：“我们不轻视日本的老政治家，但也不重视他们。问题是在于年轻的一代，年轻的政治家追求什么？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

他的说法颇有道理。21世纪的日中关系并不是由奥野诚亮、藤尾正行、中曾根康弘、梶山静六这些过时的政治家构筑，应该由三四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负责。

但是，这些年轻的政治家能胜任吗？坦率地说笔者没有信心。笔者曾为政治杂志采访过年轻的国会议员，从实际体会中判断，只有很少的议员能正确理解、接受和平宪法。

剥下假面具的日子来得很快。主角是农水相中山昭一（小渊内阁），他一个劲地咋舌说：“有其父便有其子。”他的生父，已故的一郎是有名的台湾帮代表人物。他只不过是只注意小事的官僚，从他那一副相貌看，在永田町有“北海的黑棕熊”之称，看上去有些令人生畏。

就是这个一郎，他说以兵器产业工会作为后盾的旧民社党与自民党最右派极为相似。他彻底改变了从前所谓的旧民社党是自由工会政党的错误形象，真是令人佩服，该党后来的发展确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田中内阁时代的中川一郎是台湾帮的自民党年轻右翼，在政治上一贯反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思想、政治信条的就是这个第二代昭一农水相。

1998年7月30日他刚进入小渊惠三内阁举行记者会见时，就暴露出其真面目，引起国内外关注。在提到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所写到的第二次大战中的从军慰安妇问题时，他说“我怀疑”，他这样说并不令人惊讶。

据《朝日新闻》汉城消息，8月1日韩国《东亚日报》第一版报道“日本农水相一派胡言”该报还断言：“由于农水相是负责谈判韩日间渔业协定这个最大悬案的最高负责人，因而会影响渔业谈判；在10月金大中总统访日前，对希望结束过去历史问题争执的韩国政府和国民将会产生影响。”《朝日新闻》亦登载韩国市民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声明“对历史认识有问题，很遗憾”，要求农水相辞职。

当时由于国家主席江泽民预定9月访日，中国报纸对这个问题没有报道，但是中国青年报东京分社社长孙文清就农水相肯定历史的发言及其父亲的过去作了批评。

肯定过去的青年议员

父亲是彻头彻尾的台湾帮并与中国对抗，儿子肯定、赞扬过去历史，疯狂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国民对抗，被嘲笑为“右翼第二代的悲惨命运”。

还应该提及的是，1997年2月他纠合了众参两院国会议员87人成立“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科书的年轻议员会”，自任代表，是其歃血为盟、结成青岚会（田中内阁时）的父亲的故伎重演。

而且他组织及宣传出版书籍的手法与其父亲也完全一样，

这就是《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会编），他提出“提供不符合事实、反日的教科书给孩子们学习，这些孩子能领导下一个时代的日本吗”这一疑问，并竭力煽起民族主义，纠合了 87 个年轻议员。父亲的青岚会势力不足 20 人，儿子却能纠合 107 人（众院 84 人，参院 23 人）之多，可以说这是青年右翼议员大聚会。正因为这样，很容易使日本在 21 世纪陷于孤立。

根据他们的资料，列出 1997 年 11 月时参加的议员名单：中川昭一（代表）、自见庄三郎（主席）、谷津义男、木村义雄、中山成彬、松岡利胜、八代英太、狩野安、小野清子、森田健作、保坂三藏（以上副代表）、卫藤晟一（干事长）、高市早苗、小山孝雄（以上干事长助理）、森英介、古屋圭司、小林兴起、滨田靖一、吉田六左卫门、中野正志（以上副干事长）、安倍晋三（事务局长）、松下忠洋（事务局长助理）、下村博文、渡边博道、北岡秀二、山本一太（以上事务局次长）。

饭岛忠义、石崎岳、今村雅弘、岩永峰一、江口一雄、远藤利明、大野松茂、小野晋也、小此木八郎、金田英行、龟井久兴、木村隆秀、熊谷市雄、熊代昭彦、栗本慎一郎、阪上善秀、桉井郁三、櫻田义孝、佐藤刚男、佐藤勉、清水嘉与子、新藤义孝、菅义伟、砂田圭佑、园田修光、武部勤、田中和德、谷川秀善、田野濑良太郎、中岛洋次郎、长势甚远、中谷元、根元匠、能势和子、林干雄、原田义昭、桧田仁、平泽胜荣、松村龙二、三浦一水、持永和见、山口俊一、山口泰明、柳本卓治、吉川贵盛、渡边喜美（以上委员）。

赤诚德彦、荒井广幸、植村繁雄、海老原义彦、江渡聪

德、大田丰秋、奥山茂彦、嘉数知贤、金子一义、河村建夫、岸田文雄、木宫和彦、鸿池祥肇、小林多门、阪井隆宪、佐田玄一郎、佐藤静雄、盐崎恭久、铃木正二、铃木恒夫、泷实、田中昭一、棚桥泰文、谷细孝、户并田彻、虎岛和夫、长峰基、野田圣子、桥本圣子、驰浩、平田耕一、松本和那、村田吉隆、目方信、山崎正昭（以上观察员）。

以上名单中因亦包括 1998 年 7 月参院选举中落选者，稍有出入。即使这样，还是举出了方方面面的人物，这些人要求“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记述从军慰安妇章节”并在全国各地开展运动。对此，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国民会怎样想呢？

钻进政权中枢的右翼议员

国内外发行的《时报》8月8日报道，在中川率领的自民党青年右翼集团有问题的议员中，许多人就任小渊内阁的政务次官。

担任政务次官的达 13 人：森田健作（文部省政务次官）、保坂三藏（通产省政务次官）、高市早苗（通产省）、小山孝雄（劳动省政务次官）、滨田靖一（防卫厅政务次官）、松下忠洋（农水省政务次官）、北岡秀二（法务省政务次官）、石崎岳（北海道开发厅政务次官）、远藤利明（建设省政务次官）、谷川秀善（国土省政务次官）、田野濑良太郎（自治省政务次官）、根本匠（厚生省政务次官）、林干雄（运输省政务次官），加上中川（农水相）、野田圣子（邮政相），共有 15 名右翼议员就任政府要职

8月14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发表了题为“对历史认识明显倒退的小渊内阁”的特别报道，列举了有问题的内阁议员。该报介绍以下16名阁僚向和平宪法挑战，可以说他们是美化过去的政治家。

宪法调查委员会设置推进议员联盟（简称政宪议联）成员有：首相小渊、厚生相宫下、通产相与野谢、邮政相野田、劳动相甘利、建设相关谷、自治相西田、科技厅长官竹山、防卫厅长官额贺、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井上。自主宪法既成议员同盟成员有首相小渊、外相高村、厚生相宫下、农水相中川、建设相关谷、自治相西田、防卫厅长官额贺。

日本国会议员恳谈会成员有：首相小渊、农水相中川、建设相关谷、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井上；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成员有建设相关谷、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井上、环境厅长官真锅。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成员有农水相中川、建设相关谷、自治相西田、防卫厅长官额贺、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井上；龟井静香领导的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成员有：农水相中川、总务厅长官太田。

1997年4月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参拜的成员中，在上述名单中除高村、宫下、与谢野三阁僚外，涉及阁僚13人。给人印象是小渊内阁右倾十分明显。可以评价为不正视历史、企图美化过去、改宪派控制的内阁。亚洲各国人民不得不保持警惕。

阁僚相继大放厥词

顺便提到的是，日本政府的右倾是从高喊“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中曾根内阁开始明显起来。作了相当于阁僚狂言的历史发言者占相当比例。对侵略战争等历史认识有问题的例子有：文相藤尾正行（1986年，中曾根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1988年、竹下内阁）、法相永野茂门（1994年、羽田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1994年、村山内阁）、通产相桥本龙太郎（1994年、村山内阁）、文相岛村宜伸（1995年、村山内阁）、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1995年、村山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1997年、桥本内阁）等。

文相藤尾说日韩合并“形式上、事实上都是两国同意后成立的，我认为韩国方面也应该考虑有某些责任”，由此伤害了韩国国民的感情。国土厅长官奥野狡辩说：“白色人种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却认为只有日本是坏的。谁是侵略国？是白色人种。难道日本是侵略国家？是军国主义？”

藤尾是早有定评的台湾帮，奥野是旧内务官僚战争肯定派。法相永野是个旧军人，在媒体采访时，他暴露出自卫队干部的真面目，竟然说“南京事件是捏造的”。环境厅长官樱井狂叫：“我并不认为日本是为侵略战争而战。亚洲与其说是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毋宁说是民族得以新生。”

通产相桥本在回答时称，是不是侵略战争他表示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发动了战争这是事实，但是否是侵略战争还很难说。”从语言的定义来说，是否就是侵略，这确

实是很微妙的。”

文相岛村说：“侵略就是战争，如果是日本干了就要追究到底，世界上战争的事例多的是。”他坚持要肯定过去的侵略战争。总务厅长官江藤一上台就美化过去：“进行殖民统治，日本也做了好事。”原日本军官、官房长官梶山对从军慰安妇问题，根据自己的“体验”美化过去，但由于遭受批评马上收回。关于韩国问题，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也发言，因遭到抗议马上收回。

以上表现出政治家信仰国家主义的方方面面。到底是自由主义政治家，否则不会如此大放厥词。

首相的暧昧发言

笔者手头有田中角荣等历代首相就侵略战争进行答辩的资料，这些资料再次勾划出为政者的可疑性。

“是否是侵略这种直截了当的答案，只能由后世历史学家来作出。”

这是 1973 年 2 月 2 日田中首相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辩。一面坚决实行日中邦交正常化，另一面却不能明确说出对历史的态度，由此可看出角荣政治的局限。

“是不是侵略战争，我不能说是，非常遗憾，我只能这样理解。”

这是 1978 年 10 月 18 日在参院外务委员会上福田赳夫首相的答辩。当时在福田首相背后是前首相、甲级战犯岸信介。1982 年 9 月 14 日铃木善幸首相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上的答辩，

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却相当痛快。他说：“关于对日本过去的行为，我感到要深刻反省、反省。”

1985年10月29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中曾根首相发言：“中国也有侵略事实。”但反过来看，亦可以理解为没有侵略事实，他说得很含糊。

1989年2月18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竹下登首相用角荣式的语言把责任转嫁给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侵略战争，但这事我认为应该是由后世历史学家来评价。”

1991年4月10日参院预算委员会上，海部俊树首相说：“我国过去进行战争，给邻近各国国民造成重大损失，这是事实。不能否定我国过去的行为是侵略。”

1991年11月15日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宫泽喜一首相也答辩说：“我国在过去的战争中，给邻近各国国民造成重大损失，这是事实。不能否定有关我国的行为是侵略。”

细川护熙刚就任首相在会见记者时，就侵略战争作的发言受到亚洲各国好评。1993年8月23日在众院全体会议上，他也发言说：“我国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许多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哀，我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加上反省、道歉这样的话，在首相的答辩中是首次听到。

1994年5月25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羽田孜首相的发言对侵略行为的说法有抵触，他说：“侵略战争这个词，不能说这是侵略行为吧？”

从社会党委员长登上宰相宝座的村山富市首相亦不用侵略战争这个词。1994年7月21日在众院全体会议上他说：“关于侵略战争这个词有各种各样议论，如我先前表明信念的演说中

所说过的那样，我再度认为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等给许多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我站在深刻反省的立场上，怀着不再战的决心，为创造世界和平而尽力。”

附带一提的是，在两个月前的 5 月 12 日，村山首相曾以社会党委员长身份质询，要求羽田内阁“为表明国家对侵略战争的过错，在战后 50 周年纪念日时举行的国会上通过谢罪和不再战决议。”

这样看来，历代内阁对接受“侵略战争”这种国际常识的抵触姿态已很清楚了。

作为实施宪法的内阁法制局断然拒绝承认“侵略战争”，即使是社会党首相也不允许说成是侵略战争。在会见记者时说话走嘴的细川首相也不得不改口说是侵略行为。

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其背后有其缘由，因而日本国首相的答辩都是那样暧昧。尽管口头上说反省、谢罪，但从日本国总理大臣口中说出来的话都否认侵略战争，引起亚洲各国国民的愤怒，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一语道破就是侵略战争，只有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才可能反省、从内心深处谢罪、发誓不再战。为什么不能这样痛快地去呢？

以后要体现在行动上，如能做到，与亚洲各国国民就可以和解。连幼儿都明白的事，日本的执政者都不愿意去做，只是死缠住战前天皇主义不放。1995 年 8 月 15 日村山首相在《战后 50 年首相总结》一文中虽然写着“我国在不久前的一个时期，由于国策失误走上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广大国民特别是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还是不承认是侵略战争这一国际常识。

社会党委员长虽然当上首相，亚洲各国国民在感情上还是不能宽恕的。

阁僚参拜靖国神社

众所周知，靖国神社祭祀进行侵略战争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中国和亚洲各国国民的愤怒指向成为侵略战争精神支柱的靖国神社。国会议员、阁僚等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亦表明他们对战争态度暧昧。不仅这样，还说明他们肯定、赞美侵略战争，因此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愤怒之极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998年8月15日阁僚们象例行公事那样，又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实为可悲可叹，引起了严重事态。与邻国国民真正的交流目的在于相互理解，这样一来完全失去了机会。对连人所共知的国际常识都全不明白的国民代表，邻近各国政府、国民当然感到厌恶。

在8月15日战败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阁僚有：农水相中川昭一、厚生相宫下刘平、运输相川崎二郎、邮政相野田圣子、劳动相甘利明、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井上吉夫、国土厅长官柳泽伯夫。15日以前参拜的有：建设相关谷胜嗣、自治相西田司、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科技厅长官竹山裕、环境厅长官真锅贤二。共有13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

同一天右翼团体举行集会要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反对参拜的市民也举行集会，遗族参加了此集会。在政党一

级 公明党在新宿车站西口召开街道演说会 手握话筒的滨四津敏子代表就农水相中川关于随军慰安妇问题的发言严厉批评说：“日本的阁僚多次重复这样的发言 招致亚洲各国的不信任。”

如果在野第一大党民主党采取同样的立场，情况会大不一样。但该党干事长羽田孜在 8 月 15 日率先参拜靖国神社，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同一天超党派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会长 原自民党干事长绵贯民辅 会员 302 人）召集 54 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按党派分：自民党 42 人，民主党 3 人，自由党 6 人，改革俱乐部 2 人，无所属 1 人。

1998 年 8 月 15 日许多亚洲各国的记者也进行了采访。笔者请中国青年报东京分社社长孙文清谈他采访的感想。

“这次 8·15 采访是第 3 次，给我的印象是右翼团体进行活动的人士从老年人转向年轻人，军国主义思想已转向年轻一代，令人担心。13 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说明他们完全没有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日本宪法规定政教分离，这也违反了，十分严重。国会议员中也有樱内义雄、羽田孜及属自由派的宫泽派议员。小渊首相可能也真的想去参拜。前首相桥本 8 月 15 日没去参拜。从我们这方面来说 这些都令人毛骨悚然。”

更有甚者，“8 月 15 日在靖国神社，人们唱着军歌、扛着上了刺刀的日本军枪，完全没有一点和平气氛。而另一方面在千鸟渊神社参拜者很少，给人的印象是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那里并不祭祀着甲级战犯。在那里还举行护宪、人权讨论集会，社民党党首土井批判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集会显得冷冷清清，令人遗憾。在中国人看来，不可能相信 8 月 15 日参

拜靖国神社是反战、和平的，而正好是相反。”

到在祭祀着夺去 310 多万日本国民的性命、夺去数倍于这一数字亚洲各国人民生命的甲级战犯的宗教法人靖国神社一看，参拜者络绎不绝，相反到近处的和平墓苑（千鸟渊战死者墓地），参拜者稀稀拉拉。即使不是中国记者也会认为这是“反常”的。

这就是继承战前的日本，是没有确立人权的日本。所谓民主不过是假面具。对不能进行反省和谢罪的日本人，不知中国的年轻人如何看待。

中国青年的对日观

笔者手头有一本名为《中国、日本、我》的作文集。这是代表日中两国的朝日新闻和中国青年报两家报纸为纪念 1997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而编辑的，作者都是两国 1972 年出生的年轻人，下面介绍这些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评论。

上海同济大学王媛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她写道：“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谈日本有名的神社建筑时，有人问日本留学生长泽：‘你知道靖国神社吗？’他回答说：‘那是公园。’我们大家谁都没有笑，我们也没要求他一定要记住，但我们自己是不能忘记的。”

她毫无顾虑地指出，日本留学生对历史无知，毫不关心的态度使人感到惊讶，这就是日中之间的深沟。

祖母是日本人的龚志坚（南昌陆军学院政工教研室教官）写了小学时代的体会：

“语文先生问‘现在日本的文学为什么有汉字’班上谁也没想出这个问题，我自告奋勇举手回答‘日本的文字是在古代就吸收了汉字逐渐发展过来的’，先生表扬了我，但坐在我后面的几个同学嘀嘀咕咕说开了。”

“放学后他们骂我是‘日本鬼子’我哭着回到家中向祖父诉说了后悔心情。这时祖父告诉我说，祖母是日本人，我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的血。我长大后，随着知识的增加，好容易从中日近代史到现代史找到了问题的真正答案。”

出生于江西省的龚志坚写道：“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国社会，仍然讨厌日本和日本人。在初中和高中学习历史时，自己注意到其中的原因。”

他还写道：“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日本人民也希望和平，战争祸首是日本帝国主义。”许多日本人和我们一样渴望、拥护和平和友好，但是在日本有一部分人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还公然侵犯我国岛屿，这使我感到担心、愤怒。”

山东省泰安市刘雪菲（泰安市接待处）写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好象是忠告：不顾及亚洲各国国民感情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可能开展活动的。

她还从重视历史的中国人立场作如下说明：

“听说日本人中也有人无法理解中国为何不忘历史，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以史为鉴的思想方法这个传统，没有饱尝过被战争带来的切身痛苦。中国自古就是个宽容民族，不忘记历史决不是要报复 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对内团结国民、使国民自立 以防止外敌的欺侮 对外则渴望中日和睦共处。那些任意歪曲历史的言行，中国人将其看作是引起新灾难的定时炸弹。”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四年级陆乐归纳了与日本留学生一起访问南京时的体会：

“到达南京的当晚，和我一起旅行的日本留学生有纪拿出最近日本出版的中国导游手册，说想去看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有点意外，但我的心中马上有一种热烈的感觉，同时又夹杂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和困惑的心情，因为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的。”

“从纪念馆出来，我们都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毫无力气地瘫软在台阶上陷入沉思，一天都不怎么说话。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洋平突然说“请原谅”，我惊讶地看着他，他那发自内心的谢罪的话，令我猛然不知如何是好。”

“与他交往很长时间了，但到现在才初次有心与心的坦率接触。”

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日本年轻人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面对过去，不可逃避地认真反省过去，说出谢罪的话，中国的年轻人也受感动。如果日本国民都象洋平那样，日中间的刺就会马上拔去。

应修改对华政策

江西省南昌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彭根平这个年轻人坦率地表达了中国人的对日感情。

“我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首先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如何。概观中日关系近代史，中国一贯是受害者。中国政府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子子孙孙友好下去’、‘面向 21 世纪构筑中日关

系’，可日本有一部分人要修改教科书，把侵略说成侵入，否定南京大屠杀，桥本首相等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

“还有一部分日本人跳出来鼓吹‘中国威胁论’，更有甚者，日本政府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简称指针），谋求加强军事力量，扩大防卫范围，把矛头指向中国。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修改对华政策。”

“日本某中学生曾写过‘日本军救了亚洲 他们是英雄’这样的话，引起我的注意。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横行的证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期望和平。”

北京大学东方语系研究生赵宛秋断言：1972 年邦交正常化“意味着新历史的开端，但绝不意味着已没有必要进行善后处理。”证据就是 1995 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调查，即中国城市青年讨厌的国家，日本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在她看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是“一个是有着很强的武士道精神、忠君、残忍、富于侵略性，再一个是有钱。”这两点都是说日本人不好，很遗憾，笔者认为她的话是对的。

她还总结邦交正常化 25 年日中间的交流“基本上局限在大城市或特定的人，范围没有扩大。”这点也是正确的。

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记者黄晓拟也提到历史问题。中国记者认为，“正确认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相互信赖不可缺少的前提”现在没有这个前提“原因全在日本方面。”

他断定：“少数日本人不顾历史事实，再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其他许多日本人却保持沉默。”

笔者希望读者注意他这种看法。对于美化过去的政治家和官僚的言行，问题就在于那些以第三者自居的日本人。例如不少媒体并没有报道对农水相中川发言的严厉批评，也有的日本人并不知道这位农水相的发言内容。他作为中国记者，尖锐地指出日本媒体应负重大责任。

日本如果不彻底反省其侵略罪过，“饱尝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对日本增加军费、向海外派兵这些行动无论如何是不能理解的。”他说现在要求日本“正确认识历史，彻底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样“才能得到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太各国的信赖。”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助理研究员刘洪亮述说了从家乡河北省农民那里听来的重要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家乡的大地也受日本军队蹂躏，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村里许多人牺牲了。那时村里的一位老人认识一个日本兵，他妻子在日本，他发牢骚说‘我不愿意参加战争’。”

“这位老人由于与日本兵有过交流，他向我们说‘要记住历史，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刘洪亮引用了河北省农民的话，提出四点希望：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搁置意见分歧，冷静、实事求是地处理领土问题；加强中日青年交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培养中

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从以上作文可知，中国青年期望对日友好的大前提是正确认识历史。文部省也好、历史教师也好需要更自觉地认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二松学舍大学生的宪法观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了注意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外，还注意日本右翼、民族派主导的政治、军事大国论的动向。其中突出的是以修改宪法为名修改第 9 条的动向。

这也是笔者关心的政治课题之一。果然在实行宪法第 50 个年头的 1997 年，超党派的国会议员成立了所谓改宪议员联盟。会长就是以前被看作鸽派的长老、前外相中山太郎，背后操纵的是前首相中曾根和小泽一郎等信奉国家主义的右派国会议员。小泽一郎打着把日本改造成“普通国家”的旗号，目标是修改第 9 条，一直在进行活动。

笔者在《改宪阴谋》（数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述了其中的实情。笔者把这本书作为教材，让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的学生阅读。媒体并没有对这一引人注目的重大政治动向作通俗易懂的报道，这些学生的反应大多认为当然是愿意和平，用一句话说是“对永田町的改宪潮流说‘不’”。

许多学生不理解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但读了《改宪阴谋》后一下子明白了。

例如青砥祥子说：“日本真正的国际贡献应该是彻底实现和平宪法基本理念——和平，并由此大力转向安全保障政策。”

“由于要改变由新指针而进行的军事合作，应该废除现行的日美安保体制，构筑新的日美关系。”

雨宫一幸寄来的感想说：“改宪派这么多，实在令人恐怖和惊讶。”理所当然他是认为护宪派是主流的学生之一，他还写道：“很想记住护宪派、改宪派的议员名字，不投他们的票。”

岡泽大辅也持同样的看法，因而诉说“国会议员真无聊，要是他们有空闲应该考虑世界和平”。

大森爱写道：“我认为第9条特别重要。进行战争只有伤害人，什么好处都没有，谁都会这样想，如今为什么要改宪？真的无法理解。”她还强调：“我认为日本遵守第9条，向世界呼吁放弃战争是会起作用的。”她也反对以PKO（维和）之名派出自卫队作国际贡献。

五十岚裕美在参观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时说，第一次注意到日本是战争加害者，在寄来的感想中写道：“惟一被炸的国家日本也是加害者，投下原子弹是有原因的，结果就形成了宪法第9条。”“了解了改宪阴谋，就知道宪法第9条的好处，我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感到自豪。”

小川直子听了曾经是军人的祖父的一句话才知道宪法第9条，她讽刺说：“不但战前派议员，为什么连战后派的国会议员也要改宪？他们没有学习历史吧，很同情他们。”她还发誓：“媒体没有报道 但我要牢记真实的历史。”

不关心政治的石谷里美知道了那些政治家是旧日本军官出身、当上了自卫队干部后又进入政界，成为小泽一郎的亲信，热心于改宪，她说思想上受震动，那些人在国会堂堂正正谈改

宪，或者对教科书记述从军慰安妇表示不满，她提疑问：“日本成了旧军人当国会议员的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般大学生完全不知道担心日本动向的中国，稻濑诚贵说：“中国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万里长城和众多的人口，但读了《改宪阴谋》后，我才明白完全不一样，日本人也不知道过去，受了媒体的毒害。”他懂得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

给中国以补偿

冲村佳昭主张：“正如铃木善幸首相所说的那样，日本国宪法堪称世界之冠，日本要遵照第 9 条，认真考虑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对从军慰安妇问题等要坦白承认、谢罪，不再重犯错误，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向中国补偿。”

大泽仁志高声呼唤：“现在日本不正是处于危机状态中吗？改宪议联、PKO 法、新指针，这些不就是正在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的标志吗？重要的是每个国民都要阻止改宪、遵守和平宪法。”

石桥文平诉说：“以前我对一个和平的日本从未抱有疑问，但是现实中像改宪派中曾根、小泽这样的政治家很多，我受到震撼。修改第 9 条可能使日本再度陷入战争，因而要根绝兵器产业、正视南京大屠杀等，努力恢复与邻近各国的信任关系。”

井出英作注意到有一位年轻女议员大放厥词说“（日本）过去没有责任”。他还披露自己的想法：“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方法，正视历史、深刻反省。”

上野哲生重视改宪和兵器产业的关系，他指出：“由于修

改第 9 条，日本财阀企图再度振兴军需产业。”

江口朋子坦率地写道：“作者提到‘军事力量不能保证国民的幸福与和平’，这句话使人感动，我希望那些失常的政治家认真学习历史。”

令人高兴的是她也写道：“第一次见到这样有趣的大学教科书，希望许多人都来读它。”

秋田年已的读后感写道：“我一直在想，要是全世界各国都采用和平宪法就好啦，我被永田町的严重事态震惊，同时为自己平时的无知而愕然，我要培养能看透政治内幕的能力。”

一般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实为可悲，其原因是媒体没有直率报道永田町的真实情况。缺乏诚实的商业新闻剥夺了国民了解真相的权利。

但是一旦将真实情况告诉学生、年轻人，如上所述，年轻人反应会很好，他们重视和平，都很认真地读完拙著《改宪阴谋》，这说明意识形态并不是居第二位的问题。说起来，作为一个在和平中生活的人，当然应这样对待，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宪法第 9 条是理解的。

第 9 条真了不起

这一事实，应该告诉各国，特别应该告诉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的邻国。以上都是二年级学生的反应。似乎需要再介绍一些学生对第 9 条的真实想法和对右派的反驳。

田村良一的祖母是从韩国被强制带到日本的。他写道：“祖母清楚地记得曾拒绝为伊藤博文印刷一千日元纸币的事。”

他也不忘指摘日本人对历史含糊的卑劣态度。他还写道：“在读这本书之前，没有注意到中曾根和小泽的勾结以及小选举区制的企图。”其他许多学生亦有同样的感想。这说明永田町的内幕并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

内山由起子惊讶地写道：“关于小选举区制，在学习政治学课程时已学过，但关于其背后隐藏的意图和目的老师没有教过，不用说小选举区制是走向改宪的里程碑。”小熊亚希子也这样看，她还写道：“现在我真正觉得在日本将要发生大事，希望停止改宪。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引起中国和韩国人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大森佐八贺说“第一次知道”有旧内务官僚。阿部洋子说：“我知道第9条很好，读了《改宪阴谋》再一次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能过和平生活多亏有宪法第9条。”

木岛岳说，媒体错误地宣传在为国际贡献的美名下允许派自卫队的PKO合作法和小选举区制的优越性，“我对此感到震惊”还指出“必须像德国那样完全承认过去的错误。”这些单纯的学生基本上都重视和平，只要向他们提供正确信息，他们的反应是真诚的。

以下再介绍一些看法。

“由于存在自卫队还企图建立以大幅度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战争为前提的法制，应正确解释第9条，不承认自卫队。（喜友名美和）

“在初、高中时已学过第9条，没必要改变第9条，不论胜败战争只会伤害人类，我对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政治家极为不满。（崎道康明）

“对那些说我没有参加战争，我没有责任的年轻政治家我感到愤怒。（田代雄一）

“老实说，自己对政治完全无知，非常遗憾。永田町、国会的事都不知道，也没兴趣，只是对评论家、议员的政治感到可怕。（高田有纪）

“日本企图重复历史。第9条被政、财、官的右派、民族派歪曲。媒体应提供正确的信息 这是其社会责任。（高桥范继）

“即使修改宪法，我也不希望修改第9条。对此中国等其他国家已表了态。如果修改第9条，将使其他国家受到更大冲击。（张千慧，台湾留学生）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日本的政治家都为第9条自豪，现在我感到愤怒。因为有第9条，亚洲各国国民才信任日本，要去掉这种信任支柱 是哪条神经作祟？（龟山贤树）

“在小学时就知道日本国宪法，在初中时学过第9条，对这种要改变第9条的动向，我觉得很害怕，十分不快，无论如何要阻止改宪。（寺田佐苗）

“我们这一代人在初中、高中时学过第9条，知道第9条有多么好，和平有多么好。军事不能确保国民的幸福与和平，不需要自卫队。为取消自卫队可修改，为实施新指针而进行修改没有必要。（关根奈央）

应为日军的罪行谢罪

“我访问了广岛，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我认为日本作为

惟一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呼吁销毁一切核武器，并应该真心诚意地就日军的罪行向亚洲各国谢罪。（铃木聪子）

“以前教科书中并没有记载南京大屠杀，许多事件可能也没有教过，我为此感到不安，绝不能修改现在这部好宪法。”
（多多良彰吾）

有人说，‘青年们呵，要认真监督政治呵！’我认为应向把苏哈托赶下台的青年人学习，年轻一代应站起来，把 21 世纪的日本建成真正有民主的社会。”（濑户惠一郎）

“日本应是国民起主导的民主国家，但是现在我才初次注意到掌管国家的政治家和国民的想法有很大距离。有主张改宪的政治家，有与兵器产业勾结的政治家，但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种危机。”（佐佐木雄作）

“我认为和平宪法对日本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有了宪法才有日本的发展、和平、民主、自由。如果修改第 9 条，日本的和平、安全就成问题。据中国青年报调查，九成的中国青年回答说希望和日本友好，我也一样，我认为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才来留学的，我对企图再现日本过去的严重错误而出现的改宪动向，感到十分悲哀。”（高巍）

“何以要修改第 9 条？谁都讨厌战争。政治家由于其需要总是企图改宪，一部分媒体也迎合了这种倾向。标榜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报纸刊登了改宪试行方案，这不就是一种精神控制吗？这是不正常的。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并向世界呼吁和平。”（白户胜）

“坦率地说，当我知道存在改宪动向时感到恐怖。”（川原

洋介)

“宪法的制定已有好些年月，为适应社会变化，我曾认为是否也需要修改宪法，也该承认自卫队。这大错特错了。(涉尾郁惠)

“有希望改宪的国民吗？如果通过投票决定，绝对不会同意改宪。我不希望损害这部世界之冠的宪法。(小西洋司)

“有人指出原自卫队干部议员的后台就是兵器产业，使我震惊。把兵器产业作为后台的改宪议员在国际贡献的美名下，企图使自卫队派往海外合法化，也令我惊讶。(濑尾良司)

国铁总联合会了不起

“认真地说我对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媒体、政治家感到恐惧。(铃木真吾)

“军队只是战争的工具，不能保卫和平。所以绝对不能走再军备道路，需要监视永田町和媒体的动向。(小坂祐也)

“像国铁总联那样成立保护宪法第9条工会联络会，实在了不起。(佐佐木亮一)

“即使不知道日本国宪法，也应知道宪法第9条，因为它很重要。竟然有的政治家要修改第9条，我十分惊讶。(斋藤浩之)

“政治家明明知道应该放弃战争和不拥有武力，但还是明知故犯。有人说如果为了自卫，也可以进行战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阪田勇纪)

“在战争时期武力可能起作用，但那不是要回到昭和年代？

不是美化过去了吗？（佐藤裕树）

“我出生在和平的日本，希望一直过和平生活。如果修改宪法，日本可能再次进行战争，倒退到战前的军国主义。人生下来不是为进行战争 绝对不要战争。（小林祐子）

“如果修改第9条会怎样？我没有想过。但是如果真的修改了，亚洲的每个人都会不安，这么一想我就害怕。不是修改而是改坏 这样说比较恰当。（千叶裕）

“利用 PKO 等反复说要往海外派兵，日本国民也听惯了，麻木了，孰不知这会引来亚洲各国不安。日本不就是美国操纵的木偶吗？（竹下忠宏）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永野茂门发言时是怎么想的？应该去看看大屠杀纪念馆（受害者）是普通的孩子呀！（出水惠子）

“日本国民应该正确认识过去，对受伤害的人提供赔偿，直到满意为止 应表现出新日本的姿态。（竹泽诚）

“多亏第9条才有今天的日本。如果改宪，日本可能再次回到军国主义时代。（工藤舞）

“现在日本危险，没有健全的政党、媒体右倾，右翼、战前派要修改宪法。（柴原史）

“护宪斗争重要 因而健全的媒体不可缺少。（斋藤真妃）

“要篡改世界上值得夸耀的和平宪法的人竟是国会议员，真是可悲。我几乎怒不可遏。（越智爱）

“回想起那些辛酸体验，有人竟然要修改宪法，真是岂有此理。（菊池冴子）

“我的弟弟参加了自卫队，令人惊讶的是薪金很高。防卫费很高。我认为自卫队应成为不拥有武力的、应付灾害的组

织。(清水大辅)

由于版面限制，介绍学生对《改宪阴谋》(数据出版社出版)的读后感到此为止。尽管只介绍了这么一些，但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与亚洲各国国民步调一致，对改宪说“不”，表现出真实的想法。他们的主张粉碎了改宪派的野心。我对他们寄以期望。

有正确主张的学生还有许多，他们是：

三浦宪之、吉冈健太郎、森芳夫、西原俊也、永峰理惠、松山冴里、山田环、林智辉、和田晃一、松长秀宪、吉井宏志、三川雅贵、三原敬太郎、成田真纪子、永山奈穗美、羽田野稔、鸟居一郎、目黑康行、中岛刚史、丸山雄司、山田雅大、比奈田香织、望月友树、山田高宏、山崎良子、桥本阳子、山下晶、前田武史、酒卷将人、藤崎直生、长尾基兴、小川直树、高安敏行、山胁诚、筱原达也、高木宣幸、君岛里奈、小岛崇、及川直人、山崎和平、松居潮、山田浩一郎、吉田贵德、竹内绫、西田弘毅、南贵志、福井将二、平田一记、大槻润、久保真一、栗山祐介、市川进太、吉泽涉、秋山由美子。

可以说听讲的学生八成以上是理解日本国和平宪法的。笔者的印象是只要在初中、高中认真讲授第9条，便可使学生打下认识和平重要性的基础。

日本的媒体应觉悟过来，作出能满足年轻人期望的真实报道。这样一来，21世纪的亚洲将是光明的。

第二部

架设日中友好桥梁的人们和团体

第一章 国铁东线工会捐助“希望小学”

松崎明会长的一席话

1998年2月6日傍晚在东京池袋车站前的首都饭店，《国铁改革》（人物出版社出版）的著者、国铁东线工会会长松崎明举行出版招待会。这是国铁总联委员长柴田光治和国铁东线工会委员长柚木泰辛等任发起人才得以举办的。平时一向表情严肃的松崎只有在这时才显得轻松。

来自媒介的人士除了笔者还有《每日新闻》的岩见、岸井等编辑干部。国铁东线日本董事最高顾问住田正二站在原官方立场写的行政改革的书刚由读卖新闻社出版，他在会上发表了鼓励演说，还表示十分感激国铁总联前委员长福原福太郎。

为盛大招待会所感动的松崎手握话筒突然喊道：“我打算用书的版税在中国山区建一所小学献给儿童。”这么突然的话，笔者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那是他的一片诚心。这几年来笔者有机会多次听他讲话，老实说这次讲话是最打动笔者的一次。

说到国铁总联下属的国铁东线工会的特点就在于对和平运动的热心。形成对比的是民族主义中心的联合会，他们与永田町步调一致，成了可疑的工会集团。而国铁总联及其下属的国

铁东线工会是联合会的成员，但没有参与联合会的右翼化。

国铁东线工会对蔑视和平的政府、政党、联合会一步也不退让，站在希望和平的人民大众立场上，不断开展保护宪法的运动。不追随越来越大的日本社会右倾潮流，为保卫宪法第 9 条一刻也不松懈，也反对强加在百姓、工人头上的沉重消费税。

这样看来，它是真正把立足点置于国民中的一根蜡烛般的基层工会、健全的工会。当然工会的职责是改善会员的劳动条件，但面对不幸的过去，日本工会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它有责任和义务清算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去。

只有真诚地这样做了，才算是与协助侵略战争的产业报国会决别，才是与近邻亚洲各国国民实现和解的惟一道路。如果能成功地和近邻各国国民构筑友好关系，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在 21 世纪前途才是光明的。

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只有彻底实行和平主义，才能把在 21 世纪有作为的通行证掌握在手里。国铁总联和国铁东线工会完全有理由堂堂正正地参加和平运动，换言之，只有他们才能尽日本人的理所当然的责任。

因而必须首先正视历史，不能避开近现代史，要从正面来理解，深刻反省，以人的良心彻底谢罪、赔偿。

不幸的是，由于文部省实行掩盖近现代史真相的教育，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并不知道过去。由于无知，采取不关心态度，因而国铁东线工会的领导人采用到悲惨的现场去的方法，竭尽全力将他们年轻工人派出去参加和平研修。他们向波兰的奥斯威辛派出 1000 名研修生，也向冲绳、中国派出许多工人，确

实取得巨大成果。

笔者对他们这些努力表示钦佩。只有真正的工会领导人才会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

国铁东线工会日本最高顾问住田正二高度评价国铁东线工会以及领导该会的松崎，仅仅是因为有上述的劳资关系。在松崎出版招待会上，住田本人也发表了演说，因为他们俩人有着特殊的信赖关系。

胞兄被迫参加侵略战争

松崎说，想为中国内地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孩子“建一所小学”，这是很自然的，作为和平的一环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他还另有一个原因。

在招待会上，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他亲哥哥的情况。他哥哥当时也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是军国教育的受害者，志愿服兵役，被迫参加侵略战争，在中国战死。被军国主义摆弄的哥哥的悔恨生涯是松崎参加和平运动的出发点。

“哥哥在大陆丧命，在死去之前恐怕杀过中国人，我要替哥哥赔偿 因而要这样使用版税。”

他是计划为贫困的中国儿童建设小学，受到出席人员的热烈喝彩。

他说：“让我们帮助贫困的中国孩子们创造教育环境，那就是希望小学。如果可能，计划通过与日本的孩子们交流，为 21 世纪日中和平交流打下基础。将来如果他们能来日本留学更好。我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和平交流，牢固确立 21 世纪的日

中关系。”

在偏僻山区建立小学的构想充满浪漫情调。中国人无论是谁都会由衷感到高兴。听说日本企业中也有掏出一部分利润捐赠建校的。

捐赠企业利润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中国社会却高度评价这样的企业，何况工会领导人松崎掏出版税建设学校，中国人更是格外感动。笔者在听到他的想法时，心潮澎湃，在会场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派遣视察团到北京

附带说一下，国铁东线工会向中国派遣研修团是从 1996 年开始的。战后 50 周年的 1995 年，笔者组织南京·卢沟桥访华团（日中和平交流 21 人）时，该工会派出了五名成员。这样看来，笔者计划访问南京时，可能就是大规模往中国研修的开端。

他们去中国研修并不是游山玩水的观光旅游。常见的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的视察一定是游山玩水，但是国铁东线工会组织的研修旨在从正面正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一位国铁东线工会的前研修部长高桥在笔记上写道：“在中国见到的实际情况是日本军虐待和杀戮中国人。在我们研修中接触的人民虽抱有反日情绪，但为了未来的和平，他们声称中日友好至关重要，他们向我们谈了他们决不能忘记的真实历史。”

高桥还说研修成果之一是年轻的日本工人能亲身了解到今

天的中国社会。工人的目光集中在中国工人所处的现实上，特别是“不能忘记贫富差别”。

“工人、农民的工资很低，听说数千万人失业。越是到地方去，生活越是贫困，因而一部分孩子不能上学，只好工作。给那些孩子们在和平条件下创造一个能学习的环境，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中国研修的国铁东线工会的人都有“通过学习过去，应该考虑怎样赔偿”这种真诚的想法，这样，他们终于找到自己能胜任的课题，那就是“为孩子们创造能够学习的环境”。具体说来就是集中到建设“希望小学”的计划上来。

日军的野蛮暴行与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之间，明显地有因果关系，着眼点就在这里。从1996年起实施的500人研修，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

据前研修部长高桥说，参加研修的一位成员高声说：“我祖父是加害者，难道不能作某种赔偿吗？”

就这样，松崎明率领的国铁东线工会落实了在中国建设小学的计划。

1998年4月，为进行调查，工会组成了访华团。一行首先访问了在北京市内设有办公室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笔者和儿子春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在历史认识上与国铁东线工会有共鸣

顺便提一下，希望工程是1989年10月30日设立的，是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计划、推动的公益事业。由于广泛地得到国内外的资金援助，创设了希望工程基金，利用这些资金让贫困地区不能上学的孩子能继续学习，完善学校设施，发展教育事业。

到 1989 年 8 月，已经收到捐赠的款项 11 亿人民币，结果资助了 160 万孩子，建起了 4000 所希望小学。

谈到建设学校，很容易想到的是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由于这种学校相当于日本山沟里的分校那样的小学校，是儿童很少的小规模的学校，所以只需 20 万人民币、或者 300 万日元即可建一所学校，这样建成的小学称为希望小学。

几年前曾听说过这样的美谈，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募捐建设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除了上述的建设小学外还有：援助贫困地区儿童 6 年的教育费每人 400 元、援助改建校舍资金 10 万元、援助 3000 元希望图书费等。第 1 项的 400 元是提供给儿童作为 6 年学费的。中国一般家庭也率先支持这项工程。

国铁东线工会松崎等人访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由副秘书长李宁接待。最初这位副秘书长显得有点紧张，松崎直率地坦露自己的心情说：“我的哥哥 18 岁时作为志愿兵被派到中国大陆，把枪口对准中国民众，为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现在日本政府利用日美新指针，周边一有事就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大陆。我害怕日本再次对中国国家和人民重犯过去的错误，在这个危机时刻，遗憾的是日本的工会并不出来反对，但我们不与他们为伍。”“731 部队进行的人体试验和虐待中国人的行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具体行动，为什

么他们竟成为这样凶恶的人？如果日本军队不侵略中国，中国早已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的活动不是同情，而是义务。弥补哥哥造成的麻烦是弟弟的义务。我想建学校，把学校作为交流场所、和平据点。”听了松崎的话，这位自己也曾是钢铁工人的副秘书长站起身来说：“你的话令我感动。”

副秘书长语气坚定地说：“你们要做的事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今后不断交流，为了世代加深友情。”本世纪很快就要过去。回顾过去百年两国间发生了许多事，中国人民感到不愉快，一想到历史，真的不好受，心情沉重，因为日本给人民带来了太严重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要把这件事告诉下一代。”

中方负责人对国铁东线工会会长的历史认识有共鸣，很自然地把中国人的想法和盘托出。在吸取历史教训这点上，双方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访问过日本三次，知道日本人民希望和平，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人民，面向 21 世纪中国和日本能加深友情。我们特别希望加强两国孩子们的交流。1991 年在日本举办绘画展览，所得收入用于希望工程 中国的农村对此表示谢意。”坦率地说我国一部分农村仍然贫困，原因是自然环境恶劣，也有历史原因（侵略战争）。我们不会忘记为民族解放牺牲了的人，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就尽力而为。目的在于发展教育事业。”

据说由于日本军队侵略遭受破坏的地区也是希望工程的主要对象。看来与国铁东线工会建设小学意图完全一致。作为日本人的补偿，这最为理想。

“支援方法，一是向因贫困不能上学的孩子提供学费，二

是在没有学校的地方建小学。迄今的实际成绩是，向 180 万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建了 5600 所学校。今天我想陪大家到北京附近的希望小学去看看。这是一所较好的学校，实际上不少学校条件更差。”

时任国铁东线工会研修部长高桥等，就具体问题提问，副秘书长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国贫困县的实情，据说总数达 592 县，其中云南省有 70 多县。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县与日本相反，是比市要小的单位。

“打算均衡地在各地兴建小学，但支援者也有自己的希望，因而无论如何都有些偏向，特别是延安和井冈山这样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地区就差一些。”

松崎访华团在桃源乡

离中午还有一个小时，国铁东线工会的希望小学调查团乘小面包车去视察在万里长城北边准备要建的学校。

出了北京市郊到长城这一段路，高速公路已经建成。笔者这时突然想起 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自己作为新闻记者同行的情景。由于党内斗争而疲劳不堪的首相一面走一面偷偷地问笔者：“中国方面欢迎我们吗？”

大平首相作为田中内阁的外相，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发表了联合声明，接着在受台湾帮压力下谈判日中航空协定时，又多次访问中国。大平首相甚至眯缝着他那细小的眼睛高兴地说：“令我感动的是人们自发地欢迎我。”女婿、首席秘书森田一、官房副长官加藤纮一（前自民党干事长）亦在身边，代表

自民党的前首相羽田孜也同行。

在相当于日本国会议事堂的人民大会堂一间大厅里，在举行由日本国总理大臣主持的答谢宴会上，加藤用中国话发表演说，笔者吃了一惊，因为从未见过用中国话演说的外国政治家。这时笔者也在繁忙的日程中抽空与友人吉田兴亚一起去长城游览，因为以后能否有机会再来很难说。日本大使馆给我们租了一辆中国产的“红旗”轿车。途中“红旗”鸣着警笛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公路上挤满了马车、汽车和旧式大卡车，我们坐的车不断地超越过去。我们在寒风中登上长城，不时地按相机快门，当然都是黑白相片。

值得回忆的是，当时买了绣有长城图样的刺绣，现在还挂在父母房间墙壁上。当时天气虽好，但在寒风中两颊也受了冻，没有闲暇仔细看看巨大的城墙。在长城附近山上，伐木工人扛着砍下来的木头的身影进入眼帘，此时在乡间长大的笔者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这次去长城是在4月7日，自然环境已完全改变。原来要花足足两个小时才到长城，现在却用不了一个小时。在临近山边时看看前方左右的山峦，不由倒吸了一口气，山花烂漫啊，一直到山顶，都在一片粉红色的花丛包围中，以后一打听才知道这花叫山桃。

长城附近除了山还是山，从山脚下的原野到山顶，完全被粉红色的花所遮盖，真是一幅由自然力量织成的美丽的花毯。我们一行为这一美景所陶醉，一时看得入迷，好一阵才按动相机快门。

笔者脱口而出：“桃源乡到了！”平时虽知道“桃源乡”这

个名字，但平时并没有挂在嘴上，因为这是文学界表达空想的用语。这是笔者第 43 次访华，但按捺不住还是第一次。

为日本和平运动尽力的工会代表乘车奔向长城北边的希望小学，桃源乡出现在眼前，那里的师生都来欢迎访华团一行，真是令人高兴。

这所希望小学位于从长城乘车不到一个小时的田园地带，正如李宁副秘书长所说的属于受益的一类，校名叫沈家营信孚小学（校长张金禄），是美国银行资助建立的学校。

校舍是砖和水泥结构的四间简易平房，分别隔开为两间教室，最里面的一间用作教员室。在教员室前听了说明后到里面一看令人吃了一惊，那里只是随便摆放着四张好像是 50 年前做的粗糙的木制桌子和椅子。

以前在柬埔寨旅行时，笔者亲眼见到赤脚学生学习的十分贫困的学校，现在看到的这间教员室的桌、椅与柬埔寨那里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笔者战后曾在千叶县君津郡马来田村小学（现木更津市马来田小学）学习过，这里的设备甚至不能与那时的相比。教员室条件之差，真是难以想像。与中国城市的学校相比，这间教员室设备之低劣，简直算不上是设备。

“这个村在 60 年代由知识青年建起了这所学校，这所用石头和砖盖起来的学校已经 30 年了，破旧得很。1997 年 8 月美国的银行赠送 20 万元，施工三个月后又重新建起来，这在本地区是条件最好的学校。”

当地负责文教的官员为我们解说：小学的儿童约 150 人，都是附近七个村的孩子，在当地居民看来是高级学校。150 个小学生的表情都很开朗。学校也有运动场，但没有一件体育器

械。

往教室里一看，大孩子和小孩子混杂在一起，笔者以为是一、二年级学生同在一间教室，实际并不是。由于未上学的儿童不少，一年级既有七岁的，也有九岁的学生。

松崎家和工会资助 17 所学校

这里的行政区属沈家营乡人民政府管辖。全乡人口 11,654 人，小学生 1100 人，学生一般是步行上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只有很少一部分骑自行车上学。

笔者询问张金禄校长“缺什么东西”时，他回答：“学校没有电灯，也没有运动器具。”在称为音乐室的教室中只有一台四五十年前制造的旧风琴，可能连声音都没有。音乐室成了教员的自行车存放处。

教室前面院子里杂乱地种了一些小树。问及这些小树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是“星期天到山上去挖来的”，因为没有钱购买庭院树木。美国银行现在正计划第二次援助赠送桌子。

松崎问当地政府文教官员：“附近还有没有贫困学校？”他要了解一般学校的实际情况。那位官员马上答道：“有。”问及“能否去看看”时，回答说可以，坐车去用不了半个钟头。于是我们立即到下一所学校去参观。

这所学校叫香村营小学。我们到达时是下午三点左右，儿童们正在放学，300 多人的小学熙熙攘攘。只看一看砖墙，就觉得这是一所还可算过得去的小学。

但是一进校内，那环境令人心里凉了半截。周围只是一片

农田地带，连像运动场的广场都没有。砖盖的三间平房已有30多年，破旧不堪。

教室的玻璃破损，用报纸遮盖起来挡风。窗框和墙壁也用报纸糊起来，用报纸抵挡冬季冷风，这是他们智慧的表现。

教室很小，吊垂着一个没有灯伞的电灯。窗户没有玻璃，用报纸封着，阳光无法照进来，即使这个小小电泡点亮，教室也不可能照得很亮。

进入教室一看，没有地板。说没有地板是撒谎，是泥地板，无数的孩子的小脚踩在上面都踩得很坚实，爱搞恶作剧的孩子坐过的地方都塌陷下去了，地板好像坑洼不平的道路一样。

教室中央孤零零地放着一个烧煤炉子，在这严寒的北方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城市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只一天就会感冒。

我们也看看音乐室。只有一台坏了的旧风琴，没有其他像样的乐器。放学后教室里那个没有灯伞的电灯就关了，虽然才是下午三时，但因窗户用报纸封起来，室内像是晚上一样黑暗。

听说“这个学校没有五、六年级学生”，原因是教室破损，不能学习，高年级学生转到远方的学校去上学。从外面一看，他们已不再使用的荒凉教室好像小马厩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蜘蛛网，窗户被严重破坏，像是个闹鬼的凶宅。

但是孩子们十分健康，用好奇的目光围着访问者，闪烁的目光对着照相机，在照相机前摆好姿势，都是些快乐、开朗的孩子。他们衣着简陋，但充满生气。

松崎喊了一声：“我要在这里建设学校。”对于国铁东线工会会长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当地政府官员也吃了一惊。他继续说：“我家在这里建，工会在别的地方建。我个人想在这里建设学校。”

他还提出希望在小学校里建一块镇魂碑，但地方政府的官员对此表现出不满：“日本政府不是尚未谢罪吗？”

他这样回答：“我们正视历史，坚决反对阁僚等人捏造的谎言，日本人的血统和文化本来就是来自中国和朝鲜，他们称中国是父母，却进行了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我们反对他们这种行为。日中两国孩子们的交流是重要的，我松崎家 50 年、100 年都要继续做这件事。”

乡政府负责文教的官员对松崎的发言很受感动，他回答说：“明白了，谢谢您的提议，我们将全力支持，按您的希望去做。”两人的对话的确令人感动。

国铁东线工会 1998 年第 14 次定期大会号召会员开展“建设绿风希望小学和为日中和平架桥”运动。据该工会资料，1996 年到 1997 年共派出了 500 名会员到中国去研修。

现在该工会正号召全体会员：“为了使肩负光明未来的孩子们能在和平、安全环境下生活，怀着对日本发动战争赎罪的心情，推进建设希望小学运动。”结果决定包括松崎家在内共建 13 所学校，以后又增加到 17 所。

他们开展这一运动的特点是时间长达 10 年，参加的成员有工会会员及其家属，甚至还有同学会、外围的合作团体，范围很广。以建设小学为轴心，同时支援学费，赠送学习用品、图书等，还帮助培养教员。

各种交流的加强，起到了日中和平桥梁的作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建几所学校。中国报纸也关心国铁东线工会的活动。《光明日报》等还报道“和平工会在中国制作了有宪法第9条字样的衬衫。”

国铁东线工会的“希望小学”建设地及落成日期

	“希望小学”建设地点	种类	预定落成日期
1	河南省光山县	村立	计划中
2	青海省贵南县森多乡完加六村小学	村立	99年9月1日
3	吉林省长县腰子乡羊依山小学	村立	9月1日
4	吉林省长县三团乡109村小学	村立	9月1日
5	辽宁省兴城市南大山满族乡英河小学	村立	9月1日
6	河南省信阳县董家河乡楼房小学	村立	9月1日
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汉旗老虎沟村小学	村立	9月1日
8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差乡中心小学	乡立	9月1日
9	湖北省巴东县水布镇三友坪小学	乡立	9月1日
10	北京市延庆县沈家营乡香村营小学	村立	——
11	河北省武邑县清凉店镇鲍贤兰小学	——	——
12	辽宁省大县新开镇铁南村小学	乡立	校舍已建成
13	四川省古玉田乡中心小学	乡立	6月1日
14	辽宁省中县高台堡满族乡中心小学	村立	校舍已建成
15	黑龙江省肇源县浩德乡老山村小学	村立	9月1日
16	黑龙江省宾县乌河乡乐陵村小学	村立	9月1日
17	吉林县白城市北区保民农场中心小学	乡立	9月1日

第二章 周恩来总理关注创价学会

中国大使馆里有创价大学第一期留学生

1998年9月15日，创价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左页整版刊登了池田大作名誉会长和中国驻日大使陈健会见的大幅照片。这是陈健大使拜访东京信浓町圣教新闻社时的情景。

报道并未特意地叙述同年6月池田先生会见了来日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在场的赴任前的大使陈健先生。关于和笔者同年龄的胡锦涛先生，已在拙著《中国的新领导》（骏骏堂出版发行）中作了介绍。正因为是21世纪的中国头号领导人，所以胡锦涛先生来日时，无论是永田町、霞关乃至新闻媒体都注视着他的动向。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学会池田先生之间的交流渠道非常畅通。

在这篇报道中还谈到这样的内容：“在场的程永华参赞是新中国派到创价大学的第一届留学生。二秘蔡红也在创大留学，这些成了话题。”这又有力地说明学会多么重视中国。

圣教新闻还谈到：“陈大使称赞30年前名誉会长提议日中邦交正常化有先见之明。”所谓池田先生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提议是指1968年9月8日，作为当时创价学会会长在第11次创价学会学生部大会上所做的讲演。

讲演的要旨据吉田实撰写的《日中报道回顾 30 年》(潮出版社)中说：“中国问题从我们所倡导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来看，也是必须触及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个肩负未来和平的青年人，愿意和诸位一起思考这个问题。”讲演中毅然表示代表中国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做了说明：“池田名誉会长的提议，通称 1968 年提议，在中国尽人皆知”(9 月 8 日圣教新闻)并且作证说：“听说 1968 年 9 月 8 日这个划时代的提议，翌日就由光明日报社驻日记者刘德有先生(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向中国拍发了详细电报。”

刘德有先生是光明日报社首任驻东京支局长，该报是以面向中国知识界的高级报纸而闻名。插一个题外话，我的拙著《中国的大警告》(数据出版社发行)也是由该报前支局长陈志江介绍给中国的。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印刷 10,000 册，其中 100 册赠送给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

王效贤女士当过周恩来总理及其夫人邓颖超女士的翻译，她对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个人关系作了下述证词：“周总理为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从 60 年代初起，就一直注视创价学会。1960 年、1962 年，高碓达之助先生(原众议员、历任经济企划厅长官、通产相等职)访华。记得那时候，高碓先生向周总理建议：“创价学会现在还是个小团体，但它是不能忽视的庶民团体。”周总理在会谈后向工作人员指示：“要调查研究创价学会。”

高碓达之助和池田提议

她还对《圣教新闻》的采访回答说：“1964年前后，中日友好协会前会长孙平化被派遣去当驻日代表，努力与学会进行接触。”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黄世明也在9月7日的《圣教新闻》上说：“池田先生早在邦交正常化前3年，在小说《人间革命》中就说必须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69年10月出版的池田大作的著作《人间革命》第5卷181页~182页写道“日本应该主动地和地球上所有国家尽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首先要排除万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学会对中国的关心通过高碓先生传达给周总理，周总理向中国各对日组织发出指示。高碓先生访华是1960年，那正是日本国内岸内阁强行修改1960年安保（条约）而闹得很厉害的时期。该内阁的反华姿态正因为首相本人是台湾帮的鼻祖，所以反华是彻头彻尾的，日中关系处于最坏的状态。但接下来的池田勇人内阁把舵从政治转向经济，日中关系也由紧张转向缓和。

另一方面，提到学会1960年5月3日在东京·两国日大讲堂池田大作先生就任第三代创价学会会长，开展爆炸式传教活动取得了成果。“3年间会员从150万户一跃达到300万户”（《日中恢复邦交秘话》）现在想来高碓达之助先生肯定会注视这样跃进的自由民主的学会，原因也许有二，其一他的私邸在学会本部的信浓町；其二国内各宗教团体都显示出保守、右翼的本质，而学会则贯彻了自由民主、和平主义。

作为把学会介绍给中国的人物，还有松村谦三（原众议员、历任厚相、文相、农相等职）和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等。前朝日新闻记者吉田实在 1998 年 9 月 16 日《创价新报》上介绍后者注视前面提到的池田提议，并撰写了评论。竹内的评论说：“超越信仰的不同，超越政治心情的不同人就会产生共鸣，‘有德不孤独，仁人虽稀罕，天下并非无’，这最好地赞美了池田提议。”

池田——松村会谈

评论说松村谦三先生也是被池田提议动了心的人物，并且写道“松村老人在第 5 次访华前的 1970 年 3 月底，拜访池田会长，说‘我想务必让你见见周恩来总理’。对此池田表示感谢，同时认为恢复邦交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搞，承诺将此大任托付给公明党。”

中日友好协会前会长孙平化先生的《与日本交往三十年，中日友好随想录》（安藤彦太郎译，讲谈社）中也写了周恩来总理早就注视学会的事。

“据我所知，这股（创价学会）社会势力早在 60 年代初，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重视了。有一次我访问日本回来，去中南海西华厅周总理办公室亲自向总理汇报过。在我的汇报中引起周总理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日本道路上下交差，建设高速公路解决城市交通堵塞的经验；二是关于创价学会的跃进和势力的不断扩大。”

“周总理要我们找机会同创价学会接触，高碓达之助也曾

向我们提过类似的建议。之后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访日时，与创价学会干部接触，我访日时也通过作家有吉佐和子的介绍与创价学会干部进行了恳谈并会餐。”

关于有吉先生和学会的关系《恢复日中邦交秘话》（奈良日日新闻社）介绍了这样的轶事：“1965年6月17日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和有吉先生这一天有机会进行了几次恳谈。这时两人之间的话题是还未恢复邦交的日中关系。有吉先生通过文学在中国结交许多知己，对中国非常关心。”

还有，在同年6月下旬，有吉先生给创价学会青年部长（现会长）秋谷荣之助打电话说想给你介绍《光明日报》记者刘德有和LT贸易（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驻日事务所首席代表孙平化先生。据说秋谷先生在得到池田会长许可后，在东京港区八芳园进行了会谈。

1968年池田提议的根子比一般人们了解的还要深。

顺便说一下，从岸内阁到池田内阁的日中关系，请与孙平化一起工作的同事肖向前（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来解说的话，其情况如下。

政治由松村掌管、经济由高崎负责

“战后的日中交流从1952年开始。最初的四五年速度较快。从中国去的访日代表团从1954年开始，我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团。到岸政府，中日关系骤然变坏了。岸首相访问台湾，支持台湾进攻大陆。进而在长崎我朋友举办的展览会上，中国国旗被撕毁。但日本政府采取无视态度。这就是1958年5月2

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由此两国关系迎来了最坏的事态。之后日本国内围绕 1960 年安保条约，开展了广泛的打倒岸内阁的国民运动。岸下台后，成立了池田内阁，之后中日关系立刻大为变样。新政权因重视经济把舵转向高速增长。池田内阁采取和中国大搞经济交流的态势，1962 年缔结了备忘录贸易（注：1962 年 9 月，松村谦三先生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接着同年 11 月高碓达之助经济使节团和廖承志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之间交换关于日中相互贸易的备忘录，称之为 LT 贸易。）

当时，日方政治由松村谦三先生、经济由高碓达之助分工负责。双方在相互承认政经不可分原则下进行交流。之前的 1959 年石桥前首相来到北京，宇都宫德马也一起来了。

公明党背后有池田会长

在贯彻敌视中国的岸内阁时代，前首相石桥访华，大家认为背后有松村、高碓二人在支援。这种努力在池田内阁开花了。另一方面，在池田大作率领下学会开展强有力的活动，再加上松村、高碓、有吉等亲华派方方面面鼎力相助，双方开通了畅通的交流渠道。中国和学会真可谓一拍即合。

表面上这些活动是由公明党推动的。笔者作为政治记者注视着 1972 年邦交正常化。当时对突然登台大显身手的竹入公明党的内部情况不可能了解，然而现在由于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原委已公开，其原因已很清楚了。

根据 1998 年 8 月底开始刊登在《朝日新闻》上的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的秘话，公明党公然提出中国问题是在

1968年4月11日第六次党大会上，会上强调“应设法使中国加入联合国，尽快实现恢复邦交。”这是在池田提议四个月之前的事情，当然这背后也有池田的意向。该党于1969年1月17日提出“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应做些什么”。并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三个月前即4月17日，竹入义胜在福冈市内和来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会谈。6月8日表示废除日台条约后，立刻由委员长亲自率领的公明党代表团从6月15日至7月6日到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

1971年10月25日，中国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从北京向世界发布了作为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的中美联合声明。同年5月，公明党派遣以二宫文造为团长的第二次访华团，接着田中内阁一成立，紧跟着7月底，委员长亲自再次访华，同周恩来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起草了中方联合声明草案（竹入笔记）。这样公明党巧妙地抢在各党之前在日中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关于竹入初次访华，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证明，周恩来一竹入会谈一开头，周恩来总理发言说“请转达我向池田会长的问候”。没有池田会长就不会有竹入访华。

池田先生不折不扣地实行了向松村先生的承诺，起了很好的作用。顺便说一下，池田勇人内阁之后下一个佐藤荣作政权和岸政权一样，同台湾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同时，那时自民党内以福田派为中心，而且台湾帮的始祖前首相岸信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作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断和为此采取的政治行动是要掉脑袋的，需要勇气。右翼的匕首确实在

等着初次访华的竹入委员长。

周恩来会见池田

池田先生对日中友好作出了巨大业绩，1974年12月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周恩来总理还勉强地会见他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当时他非常感动，自己执笔将它写下来，“总理挺直腰板，浓浓的眉毛显示他意志坚强，握手时的眼神好像射透对方的心窝，但又充满柔和。”

“现在想起来，周围的紧张空气似乎是对8亿人民的领导人的敬爱和护卫、担心病体三者交织在一起似的。”

不管是谁，都会对受人信赖、尊敬、期待、充满慈爱的对待而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喜悦。20世纪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所显示出来的热情的眼神以及深厚的友情，使日本宗教界的头号领袖深为感动和怀念，这从上述字字句句的话语中可清楚地看到。

一直和池田先生一起支撑学会日中友好活动的是副会长三津木俊幸先生。他是学会中负责中国方面事情的。谈起他最值得回忆的访华观感要数1990年池田访华了。中日友好协会寄来了邀请信，学会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说：“现在去不好。”但是，池田先生却说：“困难时伸出手帮助，才是朋友、友情！我去。”随即决定访华。同时有300名会员跟随，所以中方受到感动是理所当然的。

三津木先生述怀说：“当时谁也不想去中国，日本政府也中止了日元贷款，北京机场空空荡荡。孙平化先生说：这是我

一生中最高兴的事。”

笔者也有一件事忘不了。那是 1989 年 9 月，访华采访了北京的情况。前驻日大使符浩（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接受了采访，总算成功地写了报道，但遭到社内的反对。那时住宿在北京饭店，几乎没有客人，到夜晚感到好像幽灵要出来似的，饭店内黑暗冷清。

可是对池田初次访华，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高兴的。明确地说，中国方面也有戒心。学会会不会在中国搞“折服”（搞强制传教活动——译注）呢？池田会长声明“我不搞‘折服’，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不同。要友好第一。”之后，廖承志先生曾诙谐地说：“快要搞折服了吧！”但池田会长仍作了同样的回答。

友好第一的池田方针

学会的方针是对中国不搞传教活动，现在还是贯彻这个方针。努力以友好第一为根本同中国进行交流，这是加深与中国政府和党进行交流的原因。本来公明党与小泽一郎合为一体，委身于改宪、扩军潮流时，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不仅是对该党、就是对学会也投以怀疑的目光。但今日小泽一郎离开了，疑虑也就溶解了。

由于这个原因，学会和中国交流的层面非常广，历史也久。由于巨大组织在推进，所以其成果亦大，和笔者一个人集结 20 人到 50 人的团员，为日中和平交流奔忙相比，规模大不一样。学会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强有力的，实绩也很

大。高碓达之助、松村谦三两位先生注意到并推荐给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里有一本创价学会日中友好青年交流团整理的名叫《金桥》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面记录了学会九次大规模的池田访华的情况。第一次访华从 1974 年 5 月底到 6 月中，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杭州、广州。在北京见到了廖承志夫妇、孙平化、张香山、赵朴初、李先念（副总理）等要人，廖、孙、张三人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大重镇。

第二次访华，周恩来总理向池田先生提出希望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池田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这是 1974 年 12 月上旬的事。

1975 年 4 月，第三次访华时又见了邓小平先生，会谈大概长达两小时，并被委托传话：“要三木首相拿出勇气作出决断。”说明对学会的期待有多么大啊！这是基于对学会拥有公明党这个巨大政治势力作出的正当评价吧！

1978 年 9 月，第四次访华，访问了遭遇过大屠杀的南京。在北京同已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进行了恳谈，和李先念副总理进行第二次会谈。1980 年 4 月，第五次访华，再次会见了周恩来的夫人，加深了交流，并会见了华国锋主席。笔者 1979 年 12 月随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是首次访华，主席大而厚的柔软的手至今还记得。

1984 年 6 月，第六次访华，同邓颖超、胡耀邦总书记进行了会谈。1990 年 5 月，第七次访华，会见了周恩来夫人，还见到了李鹏总理，江泽民总书记。第八次访华（1992 年 10 月）也再次见了李鹏总理，1994 年 1 月第九次访华，访问了

深圳。

中国留学生在创价大学

通过池田一系列的访华，可以了解同周恩来总理相遇为开端，这条强有力的线一直在延伸着。池田先生满怀这种思念，在亲自创办的创价大学（东京八王子市）于 1975 年 11 月 2 日种植八棵樱花树以示纪念，命名周樱。1979 年 4 月 7 日，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团一行 20 人访问创价大学时，又种植名为“周恩来樱”和“邓颖超樱”两棵“周夫妇樱”，以示纪念。

创价大学一方面接受中国留学生，同时在与中国大学进行交流方面也倾注力量，其中之一就是赠送图书。北京大学 6200 册，复旦大学 3000 册，武汉大学 3000 册，四川大学 1000 册。多年来，该大学开展的广泛的和平、教育、文化活动受到高度评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授予他为名誉教授。

他们“要一个劲紧跟池田会长”。1979 年青年部第一次访华团（50 人）、教育部访华团（26 人）妇女部第一次访华团（55 人）、1980 年创价大学访华团、壮年部第一次访华团、1980 年医学部访华团、1984 年创价学园第一次访华团、1991 年青年文化访华团。学会正是这样投入全部力量继续进行着日中交流活动。

号称有会员 700 万户的日本最大宗教团体的日中和平交流，的确是有勇气的壮观的民间交流。要能产生第二个第三个

学会该有多好啊。

中国领导人对学会如此努力进行日中民间交流抱有很高的期待。1997年11月13日，来日的李鹏总理在东京赤坂迎宾馆会见池田名誉会长、秋谷会长时，作了如下发言：“船航海须有舵手。我希望日本这条船今后也向和平方向前进。要是这样，我想中日两国能世代友好下去。”

一般认为李鹏总理发言的背景是对于加强日美安保、新合作指针、周边事态相关法案、有事法制等改宪扩军潮流，期待学会掀起和平运动来加以制止。接着总理还说：“我支持名誉会长关于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应把交流搞得红红火火。”中国政府充满期待，想通过民间交流使争取和平的潮流变得坚不可摧。

1998年4月22日傍晚，来日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政治局常委）在会见池田先生时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关系不单是两国之间的问题，不仅是中日人民的利益、发展与和平，也深深地关系到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过去10年间，池田先生为发展中日友好，在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今后也希望池田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为两国友好而尽力。”可以说对学会表示了极大的期待。

用“1997年工作报告”来追溯1997年学会走过的历程，那就是2月池田先生访问了回归前夕的香港，4月秋谷会见了台湾李登辉总统，好像池田先生为中国，秋谷先生为台湾，二人分工负责似的。5月池田先生相隔13年后访问了上海，同相当于日本参议院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上海大学校

长) 进行会谈，席间提出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希望小学”的计划。

据说学会在贵州省毕节的流仓村建设了第一所希望小学。据 10 月 28 日《圣教新闻》称，流仓村是在从贵州省省会贵阳向西行车 6 小时的山岳地带。说是土地全被岩石覆盖着，没有可耕种的旱田。住在该地有 30% 的人过着无电生活。

在这里建设三层楼的“希望小学”，村民的感谢之情恐怕非同一般。日前在奠基仪式上，儿童敲锣打鼓，用各色彩旗表示欢迎。学会派三津木副会长出席，代读了池田名誉会长的贺词。

九州青年部 1994 年 9 月实施了学会访问南京的计划。访问了大屠杀纪念馆，朱成山馆长陪同参观了纪念馆。9 月 25 日的《圣教新闻》报道说：访问者直接听了屠杀事件的受害者李秀英（76 岁）的证词：“我负了伤，怀着的孩子也死了。现在重要的是下一代青年要为中日两国、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携起手来生活。”

池田先生的和平运动在日中交流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章 日本财团的医学交流

笹川良一的意外业绩

“笹川以改良麻疯病疫苗为目标，1974年（昭和49年）设立财团法人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就任会长。”

“以外，日本大学医学部从中国每年迎来100名医学研修生（这个事业从1987年开始，有上千名学医的中国人能在日本大学、医院、研究所接受培训，这为提高中国的医疗水平，改善日中关系作出很大贡献。）同时对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癌研究机构——癌研究会提供巨额资金，对巡回医疗设施不完善的离岛的巡回医疗船的建设、捐赠与制订爱滋病对策进行合作，对老人福利设施、残疾人福利设施等进行建设，对培养从事福利医疗工作人员进行援助，对笹川及船舶振兴会的医疗活动进行援助，范围的确很广。”

以上是佐藤诚三郎的著作《笹川良一研究》（中央公论社）中所写的一段话。这里所说的船舶振兴会即现在的日本财团（会长曾野绫子）

关于笹川良一先生，在这本书中作者也介绍了他的负面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右翼中心人物”、“日本幕后操纵者”、“赌博的局头”、“极端沽名钓誉和极爱显示自己

的人”等。

但另一方面，据说笹川先生通过医学培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就是组建日本财团这一点千真万确。这是新发现。

笔者原来全然不知道这种情况。在月刊杂志《政界》出版社编辑部干部的指教下，初次拜访了日本财团。拿到了有关资料才了解到日本财团意外的一面。

一般说来，要是社会部记者的话，也会一头扎进右翼问题，在这条线上也能接触到关于笹川良一先生的情报。但对于一个从事政治记者的人来说，很少有机会直接见闻他的情况。而且能提到笹川先生姓名的政治家，似乎只有把前首相岸信介称为“岸君”的前劳动相千叶三郎。

在千叶先生所属的鹰派福田派里，有不少笹川的崇拜者，因此都知道作为首领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同笹川先生的亲密关系。我见到生前的笹川先生只有一次，是在自民党右派议员的招待会上，估计大约 80 多岁了，但他跑步似的登上讲台，令我大吃一惊！心想真是“怪物”。

他儿子笹川尧是个议员，我曾见过二三次。风传他与永田町的暴徒滨田幸一吵架说“教训了他一顿”，这是我见他的契机，曾正经采访过他一次。那时他公开说“我是良一小老婆生的孩子”。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我听到笹川良一先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亲自来到北京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顿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反共主义、天皇主义的笹川先生又是为了什么呢？

日本财团是日中友好团体

其回答是我开头写的佐藤著作的一段话，也是日本财团提出搞日中友好活动的原因。在该财团广报部为我准备的促进事业里有《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实施十年进展情况》，是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东京虎之门）和日中医学协会（东京神田）于 1997 年 3 月整理出来的资料。

我浏览了一遍，不由得表示赞叹。笹川等搞的促进事业是正经的，规模之大甚至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说自己输他一筹。

他为中国医疗培训事业作出了贡献，所以对此谁都拍手叫好。对保护人的生命的事业进行支援，不管对方是谁都值得赞许。而且，它是在日中友好的事业中扎扎实实地推进，所以中国对此是很感动的。

1998 年 9 月 18 日，在东横线“都立大学”前车站附近的餐馆里同总社在上海的中国大报《文汇报》驻东京支局长徐启新吃饭时，笔者提出日本财团的事，他马上说该财团“致力于医学交流”。

好像中国新闻工作者早就把日本财团作为日中友好团体看待了，这也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本书主要提到创价学会、国铁东线工会、日本财团、宇都宫德马先生，但恐怕除此以外为日中友好奔忙的民间团体、企业、个人还有很多。即便如此，还不能说是充分的。

以前在东京四谷宇都宫德马事务所曾听到当时的众议院副议长鲸岡兵辅先生这样说：“中国人为日本人的十倍，一个日

本人要和十个中国人交朋友，如果实现的话，恐怕日中间再不会出现不幸的历史了。”

日本财团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是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在医学领域的友好和合作而设立的。具体说，邀请中国从事保健医疗的专家到日本来，通过在日本的各医疗机构（包括研究所、大学）的培训培育人才，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同时，推进医学、齿学、药学及其他各有关领域的技术和学术交流与合作，目的是为提高日中两国医疗水平作贡献。

中国是中医国家。许多日本人错认为西医好，但以西医为基准的日本医疗潜藏着重大的缺陷。例如，正如我的中医朋友王炯、李静平两位先生所指出的，第一，日本医生与患者不接触，只凭数字（数据）诊断，所以误诊并不罕见；第二，产生用药带来的新疾病。

说起医学培训，容易认为日方单方面给中国医务工作者提供医疗技术与学术，其实，中医的优秀东西也传授给日本西医，其结果正如设立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目的所说的为了“对提高日中两国医疗水平作贡献。”

笹川先生投身于日中友好的理由，按笔者推测也许是与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有关吧！也许是作为战前曾率领过右翼政党（国粹大众党）的笹川先生的一种反省和补偿吧！

他专心致志地搞这个问题是在 1986 年 8 月。当时，在北京笹川良一（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会长）、石馆守三（日中医学协会理事长）、陈敏章（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三人签订了《关于笹川医学奖学金的议定书》。

翌年 6 月，中国卫生部在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内设立笹川

医学奖学金日语培训中心，是来日前培训日语的基地。日方在春、秋两季各办三个月，由日语专科学校帮助，每期各派 4 名日语教师。

10 年培训 1000 人

第一届 49 人，三个月期间埋头学习日语后，在 1987 年 10 月全体踏上日本国土，分配到各医疗机构，培训一年。

1988 年 4 月，第二届 50 人来日本，以后每年 4 月和 10 月两次，中国医务工作者各 50 人，到日本来培训。一年招待 100 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可谓是大规模的医学交流。本来应是政府办的事，由民间代替来办。

三个月的日语特训是不充分的，似乎应更扎实地培训日语。于是中国卫生部在 1991 年 3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日语）西安医科大学（英语）分别开始五个月的语言培训。

同年 8 月，在北京进行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实施五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卫生部授予笹川、石馆两先生“中国卫生奖。”利用这个机会成立了“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同学会”，这是接受奖学金学生的同窗会。

研修生中，优秀人才再次被邀请到日本搞研究工作，为此于 1992 年 4 月在北京由笹川阳平、悬田克躬、顾英奇三人签订了“笹川医学奖学金特别研究者邀请制度”。除研修生以外，再加上研究者进行医学交流。

在这个制度下，于 1993 年 1 月，分别邀请了 10 名。截至 1997 年 4 月，特别研究者 60 人，研修生竟达 1000 人，这是令

人惊讶的业绩和成果。可见笹川良一先生对日中友好倾注的热情相当之高。

1994年6月，“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同学会”在中国贫困地区之一的山东省德州地区实施了归国研修生义诊活动。当地居民和政府当然非常感谢。实际上并非只此一次，以前研修生每年都到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巡回一次，搞义诊活动。这很了不起。

到欧美和日本留学的中国优秀人才中，不少人就这样定居下来了。这些人憧憬生活丰裕和自由，忘记了祖国人民的生活。但笹川奖学金的学生和研究者，以为祖国人民服务作为其原则，义诊正是奖学金制度的目的。

达1000人之多的奖学金学生的男女比例是男性为696人，女性为304人，平均年龄大致30岁左右，是当今中国医学界的主力。进入21世纪他们中间肯定会产生领导干部。

从培训专业来看，医学830人，药学85人，齿学41人，护士28人，其他16人。日本的接受机构是国立大学464人，国立机关100人，公立大学60人，公立机构26人，私立大学326人，私立机构24人。

研修生的出身遍及全中国，但北京（126人）、辽宁省（52人）、吉林省（100人）、黑龙江省（51人）、山东省（120人）、天津（45人）等东北地区为多。可以理解为对过去的一种补偿的意思。

此外，上海（58人）、江苏省（55人）、四川省（52人）、陕西省（42人）、广东省（32人）、湖南省（26人）、湖北省（25人）、河南省（24人）、河北省（21人）、浙江省（21人）

福建省（19人）也有，保持平衡。

从内蒙古（10人）、新疆（9人）、西藏（2人）来的，也接受了。可以看出是从中国各地邀请了青年骨干的优秀医生和研究生的。可谓是相当细致的布局，是前景广阔的医学交流。

提供 32 亿日元

尽管如此，这样大规模的长期支援是没有先例的，超越了报名的范围。其规模是一般民间团体不敢干的，这也是笹川先生鲜为人知的一面。

1000 人的培训费用竟达 3,228,743,611 日元。我对如此庞大的笹川资金表示惊讶，同时也为日中友好使用这笔资金表示敬意。即使是来自赌博的资金，其贡献也不应否定吧！

对特别研究者 60 人提供的经费为 208,659,024 日元，支付语言培训 230,455,012 日元，这也值得钦佩。作为培训基础语言学补助费，追加 10,853,461 日元。

用于研修生每人一年支出 300 万日元。主要费用为：生活费 20 万，住宿费 63 万，培训费 326,000 日元，语言培训费 221,000 日元，国际航空运费 121,000 日元等。可以说这是绝佳的待遇。

“他们在接受自己的医疗机构专心研究各自的课题。由指导老师给予指导，作为他们的研究的后盾。由研修生和指导老师密切合作进行研究。”

“研究生不大习惯日本生活，必须在有限的一年时间内取得最大成果，总想好好利用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他们心中

都这么想。”

“许多研修生感到一年研究时间太短，为适应生活环境需要半年，能集中研究的就剩半年了。希望如有可能以特别研究者再次来日本继续研究。但是有人认为即使一年也是运气好，从内心表示感谢。正因为如此，希望回国后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把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和研究成果贡献出来。也想把自己学到的传达给同行的医师们。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使命。”

这是日本财团广报部所作的记载。该广报部访问国立癌中心中央病院和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对研修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跟踪。

殷东风先生（36岁），特别研究者，在国立癌中心中央病院，课题是“关于固形癌的药物疗法的临床研究”，是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主任。他表示“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用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劲头十足。

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金铁雄医师（39岁）在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泌尿科），作为研修生正在努力进行“尿路性器癌的基础性临床研究”，说“在中国只进行手术，但在日本能学到先进的方法，表示感谢。”露出满意的表情。

在该医院研究中西医学的朱瑾波女士（31岁）说：“在中国必须看许多患者，没有时间研究，想在日本补起来。”

日本财团广报部还跟踪研修生回国后的情况。北京急救中心的张肃西是内科医生，很好地运用了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心脏血压研究所的学习成果，患者非常感谢。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孙大为（33岁）在东北大学医学部妇产科研究室学卵巢癌的研究引人注目

该医院张娟娟（36岁），在都立驹逾病院学习医院管理，现致力于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设立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院管理。

和邓小平交流

中日友好医院是笔者作为特派员随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日方决定给予无偿援建的。在该医院工作的周正先生（38岁）、王娜亚女士（44岁）、杜金行先生（32岁）分别为外科、耳鼻喉、心肾内科的医生，都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上。杜金行先生从事东洋医学和西洋医学的结合研究（中西医结合）。他们都是研修生、研究者，笹川奖学金的学生，是中日友好医院受人注目的人物。

把在日本的研究应用于中国的中医，是中药研究所的吉力医师（44岁）、高思华医师（37岁）的目标，他们都是富山大学的，还有张飞跃先生（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李平先生（新泻大学），顺便说一下，1955年成立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对西医产生很大的影响。据说包括中药研究所等有关研究所在内，工作人员超过4000人。

中国从1978年底提出改革开放政策，进入所谓邓小平时代。最先在沿海地区开花结果。海外投资是导火线，因为窗户打开了。到80年代中期，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证实。

笹川和邓小平的相遇就是在这个时候。已成为“盟友”的福田赳夫先生于1978年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之间

的隔阂消除了。

据笹川阳平理事长撰写的《外务省不知道的世界真面目》（产经新闻社）说两人见面是在 1985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人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国宾客时，通常是等候客人入室。但是，这一天邓小平先生来到屏风外面，而且父亲突然拥抱出来迎接的邓小平先生，把他抱了起来。被抱起来的小个子邓小平先生的两只脚浮在空中。而且两人吻着脸，互相拉小手指立誓。”

“周围吓呆了。这是父亲最拿手的表演。父亲向显得诧异的邓小平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初次见面的笹川先生解释说，在日本男子汉之间信守誓约不是握手而是拉小手指。邓小平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之间就像百年知己似地融洽。”

战前率领反共右翼政党的笹川良一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实力人物邓小平的相会，确实令人感兴趣。现在两人都已成为不归之客，无法确认其真伪。但据前面提到的著作，似乎两人的会谈确实是坦率的。

“在公开场合，不谈具体案件的邓小平先生直截了当提出了当时大陆台湾之间成为政治问题的京都光华寮问题。当然还涉及至今仍是日中间悬案的教科书问题。因为笹川先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希望务必加以关照。”

知道光华寮问题的日本人很少。这个问题关系到大陆与台湾政治各个方面的非常麻烦的问题。笔者也采访过，在东京时报上撰写过连载报道，后来整理成《大陆与台湾》，据说这本书一部分已被台湾当局烧毁了。

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诉讼问题，而且由于法院（高等法

院)承认光华寮所有权属于台湾方面,而使两个中国论表面化。中国对此摆出严厉态势,日本政府也苦于应对。据说邓小平向 笹川先生解释,说明邓小平先生事先对 笹川先生的本质研究透了。

邓家与笹川家的交流好像是很深的。阳平理事长道出了这种关系。他说:“邓家长子邓朴方先生是设立残疾人全国组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时,被邀请到日本学习建立组织的秘诀。”三女箫榕女士担任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中方副会长。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也令人吃惊!据说这是 1989 年设立的,是否该说值得钦佩呢?是否晚年的笹川先生是爱上了中国了呢?

不管怎样,邓氏家眷参与进来的日中友好活动,是很广泛的。阳平理事长还这样泄露:“在电视里看了邓小平先生的葬礼,电视荧屏放映出和遗属站在一起的江泽民先生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悲痛的表情。在场的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七人。我分别都见到了,有许多事值得回忆。”

第四章 宇都宫的米诺法盖恩 制药公司支援留学生

为日中友好抛弃乌纱帽

提到个人大规模支援中国留学生的人，那就是亲华派宇都宫德马(前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和他交往是在1972年，从笔者当政治记者开始的，因此又久又深。笔者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受宇都宫先生和前首相大平正芳两人的影响。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没有比宇都宫先生更可信赖的政治家了。这不限于中国问题。对于政界违法腐败的可耻行为，虽是自民党议员也堂堂正正地加以抨击。

需要政治评论时，只要给宇都宫先生事务所打个电话就成。山谷隆二、吉田良雄、大田薰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秘书组总是替我向他通报。只要版面有余地，准把宇都宫先生请出来在报上刊载他的正确言论。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关于宇都宫先生的报道量像喂马饲料那样多。

乍看这样做容易被认为不公平，有偏袒心，但并非如此。作为公开的报纸受理政治家的言行要求有一定的水平。但是，因为都是水平低的政治家，所以宇都宫先生出场自然就变得多了。如果说要问责任在哪里，那么它反倒在永田町。

他在言论的中心机关（国会），的确以论战赢得了日中友好。为了改变顽固的美国议会的态度，他作了拼命的努力。为处理日中问题，他甚至去做日美关系的工作，开展大规模国际活动的政治家，当代颇为罕见。宇都宫先生才是头等国际政治家。

我知道宇都宫先生关照过中国留学生是在不久以前。大多数人都擅长向他人显示自己的成果，而宇都宫先生却正好相反。

首先从他本人口中一次也没听到过“关照留学生”的事。无意中知道此事是在五六年之前。由宇都宫先生自己当社长的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的总务部长偶然泄露出来的。

但是仍无法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想特意向本人确认这件事。这次迫于需要，为了采访，我询问了宇都宫事务所，事务所指名让我去找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的砂口胜吉先生，因为他是前总务部长，是支援留学生的负责人。

他 77 岁辞去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的职务，任职到近 80 岁，这也是少见的。当然有特殊的原因。

砂口先生是历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俊二先生创办的寄宿制中文专科学校康德学院（三年制）毕业生。据说康德学院一学年只有 10—15 人，所以好像是一种英才教育的先驱。驹井先生就任总务长官时间不长，是因为与关东军阀合不来。驹井对中国的爱慕发展到创办康德学院，想让有作为的人才为日中友好起作用。所以和当时的政府和军阀划清界限。

据说他对中国的认识是与支持孙文等革命派（南方派）的宇都宫先生的父亲太郎陆军大将等的立场相同。陆军的主流

(萨长军阀 采取措施支撑旧势力(北方派))

顺便说一下，宇都宫大将是佐贺出身。驹井先生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农学部。驹井先生仰慕新渡户稻造先生，进入札幌，但并不信奉顽固的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倒是可以说与此相反。

宇都宫大将历任驻英大使馆副武官，是日英同盟的主角。亲身感受英国式的民主主义，与支援清朝旧势力的陆军主流相对抗，他支援孙文的革命势力。

在对中国认识上，驹井先生与宇都宫大将情投意合，结合在一起。驹井先生的女儿辽子嫁给宇都宫家也是因为有这种共同的立场。这似乎与宇都宫先生战后努力从事日中友好的政治活动有关。

战败后，康德学院自然取消，驹井先生就奔波于重建二松学舍大学。作为女婿的宇都宫先生也作过短暂的努力，现在康德学院的毕业生都担任该大学的中文教师。据说该学院的校友山谷隆二先生也是该大学的教授，但他转业到宇都宫先生经营的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工作了。砂口先生比山谷先生晚一期，也是康德学院毕业的。宇都宫先生收下了解除兵役踏上日本土地的驹井学校的两个门生，这两人一直到近 80 岁还在工作的奇怪原因也在于此。

公费留学生住职工宿舍

亲华派宇都宫先生关照留学生是从 1980 年开始的。对象差不多都是从中国来的公费留学生。公费留学生由日本政府和

中国政府提供学费两种情况。两者之间在学费上有差距，尤其是后者学费少。

也就是说，即便是公费留学生，生活也并不稳定，只要不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留学生必须全力以赴去打工。现在许多中国留学生与其说学习不如说必须努力打工。

但是，受到宇都宫先生支援的留学生则享受特殊待遇。他们能住在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的职工宿舍（神奈川县大和市中心林间）里，而且有二居室三栋楼，三居室五栋楼，提供相当于日本人住的或比他们住的更大的住宅。

“为确保公平，让本人负担国际电话、水、电、煤气费，除此之外一切免费。（砂口先生说）是破格的待遇。

还说：“国内电话？那由我们付钱，因人而异，有人每月要用二万、三万日元。电话常用，因在外国生活，这也是很自然的。（同上）

辽子夫人慰问留学生

文部省招待的留学生每月支付 18 万日元。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为 8 万日元。8 万日元生活一个月并非容易。要是来日本打工的中国人有 8 万日元就能生活得很好了，但留学生就不能踏踏实实地学习。于是宇都宫先生每月支援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 4 万日元。

“留学生一点儿也玩不了，生活非常简朴。宇都宫夫人辽子常常给他们送东西。他们像爱母亲般地爱戴夫人。她去世时他们都非常难过。”

盂兰盆节和岁末，夫人给留学生送去自己积攒的部分私房钱。砂口家里也有时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用餐。气氛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留学生能安心努力学习。

直到最近还是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参赞的曲德林先生（前清华大学教授）也从 1991 年 7 月至 1992 年 10 月，住在中央林间的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宿舍，在东京工业大学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我见过曲德林先生一次，那是为拙著《中国的新领导人》（骉骉堂出版发行）采访时，和朋友有泽志郎君（前外相秘书）在清华大学见到的。那时并不知道曲德林先生和宇都宫先生之间的缘分，砂口先生告诉我他的情况后，不禁马上感到亲近起来。

公费留学生平均在日本停留二年。1980 年来了 7 名留学生，二年后的 1982 年 4 月回国。他们是：刘业成（哈尔滨）、张志华（沈阳）、李国华（北京）、赵伯阳（唐山）、江国泰（西安）、扈传俊（山西）、邬晴晖（广东）、赵伯阳留学北里大学医学部，其他人都是东京工业大学。

1982 年 4 月开始，第二期学生是：郭存济（上海）、陈庆令（上海）、钱端芬（长沙）三人都进了东京工业大学。1984 年 5 月开始的第三期学生：刘勤（长春）、洪汝桐（成都）、王永文（北京）三人。他们在中国大学是副教授一级或是研究员，回国后都成了教授。

也有长期留学 6 年的，这期间从硕士课程经过博士课程取得理学博士称号。1982 年 10 月至 1989 年 4 月，留学东京工大研究生院的有 5 名留学生。他们是：贺斌（浙江大学）、陈福

明(哈工大科大)、潘焕旭(西安交大)、马树元(天津轻工大)、赵群飞(西安交大)五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过了一年的培训生活。可以说没有宇都宫的支援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从1983年10月到1990年的长期留学生有：梁瑞兴(清华大学)、郭卯应(武汉工大科大)、朱晓凡(横滨国立大学)、黄莉(清华大学硕士)4人，都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

1985年至1993年，刘学年就读于东京工大研究生院，1987年至1993年5月李伏桃(东北工大)、唐东雷(哈工大科大、信州大学研究生院硕士)二人在东京工大研究生院分别取得博士学位。

一、二年短期留学生有：林其骏(1981年5月~1982年7月)、尹成东(1981年6月~1983年6月)、李元变(1982年8月~1984年8月)、金光旭(1983年3月~1984年3月)、叶文青(1986年4月~1988年6月)、扣学华(1987年10月~1993年5月)、朱晓君(1988年6月~1991年6月)、屠萍官(1989年2月~1990年2月)、章思耀(1990年10月~1991年10月)、曲德林(1991年7月~1992年10月)、郑敬德(1993年10月~1996年6月)、王宏青(1987年2月~1993年8月)12人。其中尹成东、曲德林二人取得博士学位，朱晓君、王宏青二人留学横滨国立大学，其他在东京工大。

截止1998年9月，在中央林间米诺法盖恩制药公司过留学生生活的有：谢磊(1994年11月)、高智龙(1995年10月)、王丽莉(1996年10月)三人。谢磊湖南大学毕业后，通过清华大学硕士课程在东京工大研究生院进修三年级博士课

程；高智龙从哈尔滨建筑大学毕业后就读东京工大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一年级，王丽萍在该校攻读硕士课程二年级。

宇都宫太郎和驹井德三的遗言

宇都宫德马先生对这些中国留学生熏陶说：“请把在日本学到的成果带回中国，为中国人民工作，同时也希望理解日本，为日中友好而尽力。”

按宇都宫先生的指示照顾留学生的砂口胜吉先生说：“宇都宫伟大之处就在于自己的事业上完全不用留学生，专门为了日中友好。这确实了不起！”

他追忆往事说：“宇都宫太郎和驹井德三的理想是日中合作建立一个新亚洲。德马先生也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支援留学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想辽子夫人也有这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就读于东京工大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的贺斌先生，现在美国依利诺依大学任副教授。据说刘业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工作，是那儿的负责人，最近退休了。赵伯阳任唐山医院院长，郭存济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陈庆令任上海石油化学研究院院长，钱端芬是湖南大学理学部教授。

一到春天，宇都宫先生开赏樱会欣赏自家院里的樱花，邀请熟悉的政治家、新闻工作者、中国大使馆馆员等，同时也一定加上留学生，款待他们。

笔者也有好几次参加这样的赏樱会。像政治家三木武夫、铃木善幸、河野洋平、土井多贺子、鸠山邦夫等都是常客。笔者家里和三木先生、河野先生一起拍的纪念照片就是在宇都宫

赏樱会上拍的。在这个集会上还结识了最近成为研究日本首屈一指的赵階琦先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同时，还和中国青年报徐启新君（现文汇报东京支局长）常相约一起去拜访中央林间。

总之，就读于宇都宫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必要为生活而奔波，学习努力和俭朴的生活使他们取得了更大的成果。他们很好地体会了宇都宫先生的坚定信念：“希望以强烈的使命感掌握新技术新学问，回国后贡献给中国人民。”

辽子夫人诚心地帮助在日本遇到困难的留学生，可以说她的照料像慈母一样。宇都宫先生对待中国留学生像家属和亲戚一样。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厌恶日本而回国，但宇都宫家的留学生都成了亲日派。

第五章 日中和平交流 21 世纪 会的小小活动

把《中国的大警告》送给抗日 战争纪念馆

提起北京郊外的卢沟桥，这是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出现的名桥。1937年7月7日夜，日中两国军队在这里发生冲突，由此引发日中战争。1997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60周年，中方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笔者作为日中和平交流21世纪会的代表参加。我在分组会上作了简单的报告，不仅是中国学者，还有美国和香港的学者也赞不绝口，令我不知所措。

我是以“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正视历史，其根源何在？”为题，谈了拙著《天皇的官僚》（数据出版社发行）的要点。

这个研讨会邀请了日本东大名誉教授卫藤潘吉以及杰出的中国学者参加，笔者有幸与他们同席。能有此殊荣还得归因于笔者于1997年1月15日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拙著《中国的大警告》（数据出版社发行）就在这天译成中文出版了。其中一百本赠送给抗日战争纪念馆，因而应邀出席了赠书仪式。那时馆长张承钧邀请我参加七·七国际学术研

讨会。

顺便说一下，提出希望翻译《中国的大警告》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先生。实际参加翻译的是该所袁蕴华、马俊威、贾继业、刘学斌、常志忠五位，只花了十天就翻完了。印刷出版也只花了一个月。《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加藤千洋也惊讶地说：“完成得真快。”

翻译出版的形式完全超越了想像。当然不是由我提出来的要求，是因为拙著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

1997年春，访问东京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肖向前亲自打电话到我家。此人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事先做准备工作的有数几个中国外交部的重要人物之一，此人以前在北京只见过一次，是由朋友徐启新介绍的。

肖向前是中国头号日本通。此时他问“小泽一郎是何许人也？”当时我感到奇怪，反复问“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于是他告诉我：“田中角荣秘书早坂茂三君刚刚来解释说，‘他是领导今后日本政界的人物。’”，在当新闻记者时代，我多次见过早坂先生，因他是笔者所属新闻社的前辈。

但和肖向前先生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给我来电话。因为笔者不在家，听说他拨了好几次电话，我后来才知道，深感过意不去。

《中国的大警告》使我们俩人再次见面了。肖向前说：“很好，这本书把中国人想说的，由你日本人写出来，你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我们在旅馆宿舍一见面，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人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宇都宫德马的秘书山谷隆二先生

（当时）也鼓励说：“由于这本书的关系，中国人觉得在日本也有诚实的日本人。太好了。”

关于《中国的大警告》还有一个轶事是 1997 年 3 月组成的自民党访华团来华，团长是小渊惠三前首相，此外同行的还有前外相中山太郎和武见敬三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时，21 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最先向三位政治家介绍了《中国的大警告》。

小渊先生在此之前买了十本书。

江泽民主席说以史为鉴

言归正传。1997 年 1 月 15 日午后，中方在北京机场准备了一辆旧面包车。来迎接的原以为只有我儿子春树（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学系）一人，结果翻译负责人袁蕴华也一起来了，就这样一行人从机场直奔卢沟桥。

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白介夫、（前北京市副市长）馆长张承钧、副馆长齐密云、魏永旺、刘建业，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刘述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总经理高竣瀚等在等候。

赠书仪式一开始，中方向笔者表示感谢，我深感不安。此时，参加者一个接一个出来宣读致词：“冷战结束后，日本的进步势力削弱了。因此出现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势头，而且矛头指向中国。1995 年在国会通过暧昧的不战决议，1996 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掀起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运动，再

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这些奇怪的活动引人注目。但正确认识历史是友好的基础。不能忘记 1937 年。”抗日战争纪念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也是谋求和日本人交流的场所。重要的是通过中日友好为亚洲和平和稳定作贡献。”

中国和中国人的焦虑在哪里呢？从这些发言中就不难理解了。

参加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白介夫先生致词说“江泽民呼吁以中日友好为前提来尊重历史，要以史为师。总的来说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不正视历史，否定历史的倾向正变得严重起来。”

他还强调：“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同时也不会忘记日本也有正义之士。中日友好人士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是日本的爱国者。如果热爱日本 就会正视历史。”

日本史学家一般容易肯定明治时期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笔者对此抱有很大的疑问。白介夫先生指出的是正确的。不总结明治史和昭和史，是不能公正评价侵略中国历史的，希望真正的史学家振奋起精神。

在日本轻视历史教育，是战后教育的致命缺陷。文部省给近现代史盖上盖子，并一直由死抱住战前观点的日本史教师把持着。

大学入学考试中近代现代史也完全被忽视，并给它定位为无用和无益的学问。笔者也是受害者之一。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它阻碍了日本国际化。天皇的官僚的责任当然是严重的。

条约缔结 20 周年的和平交流

日中和平交流 21 (中国称日中和平交流 21 世纪会) 是笔者命名的, 当时是基于这样的坚强信念: 日中友好不仅对日中两国, 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能作出贡献。本来这个信念不是什么特别的新东西, 它也是 1972 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的共同认识, 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只不过由一个爱好和平的平凡之人来加以实行而已。知识分子往往想用笔和嘴办成事, 不付诸行动。笔者把日中和平交流 21 作为立脚点, 作一点自己小小的实践。

幸运的是有人出来帮助只有一支笔的笔者, 他是中国医生王炯君 (JCT 社长) 和他的妻子祝智慧女士, 由他们二人照料事务局。我打定主意组成友好访华团时, 他们就主动出来同中国方面联系。没有他们二人的支援就不会有日中和平交流 21。

1998 年 8 月 25 日开始组成了为期一周的第 4 次访华团。访问地是日中战争爆发地卢沟桥, 桥旁是抗日战争纪念馆, 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的 1997 年这里进行了大整修, 现在焕然一新。

为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福田内阁) 20 周年, 此时派了 20 人 (实际 21 人) 的访华团。当然, 这是在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后援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我想借此机会对提供帮助的有关各位表示感谢, 特别受到旅游局东京事务所的刘桂香所长的很大关照。这里我想介绍一下 21 名团员名单:

多田实(名誉团长)、多田富久江、本泽二郎(团长)、本泽真知子、青山惠美(事务局长)、青山幸一、中山圣雨、中山米奈子、本泽和一、本泽千代、桐谷二三代、吉田正司、宇佐美邦子、斋藤茂一、玉盛清、一番濑隼人、寺户晶子、田村良一、高桥利明、高桥信子、本泽春树。

多田先生为前《读卖新闻》政治部长、该报编辑局次长，后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是安全保障问题的权威，同时和笔者一样搞自由民主的政治评论活动，这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母校中央大学开办多田讲习班，是该大学内受欢迎的讲习班。

多田又是 1972 年 9 月田中访华团访华时活跃的记者团团长。他在繁忙的日程中抽空访问了卢沟桥。还有热心从事和平运动的国铁总工会的玉盛清先生也参加了，这给访华团锦上添花。

访问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日本人还很少。特意访问北京但去卢沟桥的日本游客并不多，因为旅行社没有把卢沟桥列入观光路线。

毋庸讳言，在纪念馆里陈列了许多为证明南京大屠杀和 731 部队等日军野蛮行为具有决定性的资料。这并不是为了进行反日教育，而是希望让年轻人正视历史，使日中友好坚如磐石。这一点也可以从这里展出田中访华的情景得到了了解。

日中友好从卢沟桥、南京开始

笔者认为想要谈论日中友好的日本人，应该首先访问卢沟桥或南京。可以说：“真正的日中友好，从卢沟桥、南京开

始。”不学历史的日本人是不会访问这里的，我认为这样的人只是假亲华派。

实际上，参观这里的多数日本人首先准会学到历史的经验教训。通过正视极其不幸的过去重新认识和平的重要，重新宣誓不再打仗。从内心反省祖先侵略中国、激发谢罪和补偿的情感。中国人会以宽阔的胸怀温暖地包容这样的日本人，因为中国人是宽容的。

不幸的是即便是祈求和平的日本人也几乎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可以说，日本国内无数组织和团体全力以赴参与这种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日中和平交流 21 可以说是先驱。

参观卢沟桥纪念馆的前两天（8月28日）我们礼节性拜访了发行份数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国青年报总社。社长徐祝庆是我的老朋友，我知道他想问什么问题，就请代表团中的大学生谈了参观纪念馆的感想，因为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但是，说实在的，内心也有点忐忑不安。日本的青年人在中学和高中的历史课上没有学过侵略中国和日中战争的详细情况，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对过于刺激的史实表现出不知所措，但过不多久才知道这不过是杞人忧天。

寺户晶子（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经系二年级）第一个举手。她说：“坦率地说，我过去对日中战争一无所知。来卢沟桥之后非常清楚了。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能具体了解日军对中国人干了些什么。”

无知变有知，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寺户最先注意了日中战争，这是很好的。在此基础上以种种实证资料理解了日军的野蛮行径。

不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史实，而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就连大学生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又是刺激。但只要走进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的年轻人就能和中国人共同拥有历史。

她的发言更进一步具体地加以展开。

“我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的内容，可是现在不同了。日军一个接着一个地杀害无辜的中国人，其行为之残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作为日本人不应该说不知道就完事了，我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而感到非常惭愧。”

“还有，过去听说中国人是宽大的，实际来看一看，才能真正体会到。听说日本不去处理战后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但尽管如此，中国还和日本进行交流，这不禁令人十分感激，而且感到不可思议。我认为应有诚意处理好战后遗留问题，从内心向中国表示谢罪。”

“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有被原子弹爆炸的纪念馆，介绍了被害者日本的情况。战争结束纪念日新闻媒体也尽报道被害者的情况，但加害者的情况几乎没有。因此，抗日战争纪念馆让人清楚地看到加害者的日本，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总之，我认为应尽快解决战后处理问题。”

寺户君的发言是发自朴实的内心的呼喊。由通晓日语的记者苏海河把它翻译出来。“想知道日本年轻人的想法”的徐祝庆社长，被她的话感动得快要从小桌子后面站起来。

日本学生谈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感想

接着，田村良一君发言。他每天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到深夜，这样的学生现在是很少见的。他用想法积攒的辛苦钱参加了日中和平交流 21 访华团，他的志向真是宏伟。

他提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说：“这是四五年前的事，我曾参加过第 49 次纪念广岛和平仪式。那时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知道了原子弹的恐怖。看了可怕的照片感到悲痛。”

“然而，在卢沟桥能够了解到加害者日本的历史事实。加害者的责任必将被追究，即便是同样的战争悲剧，日本人更为疯狂。”

田村君谈到了自己的亲人的事，他说：

“我祖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制绑架走了。对此感到非常憎恨。战后已过了 50 年，然而日本政府仍继续坚持暧昧的态度，应（向亚洲各国人民）认认真真地赔偿、补偿。”

他的话没有拖泥带水，像个男子汉，归纳得很好，谈了结论。我不禁为他的勇气所感动。他谈了读拙著《改宪阴谋》（数据出版社发行）的感想，也同样作了尖锐的揭示。

下面是四年级学生一番濑隼人举手。他最早赞成日中和平交流 21 访问计划，是个和田村君一样的好青年，老实而有坚定的信念，对海外的志愿服务感兴趣。

“受到很大冲击。我说不好，但很震惊。能了解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

他热心听我的讲课，并坦率地说：“通过本泽先生的讲课

和书《中国的大警告》知道了大概，但实际一看，差别之大感到惊讶。”

笔者在讲课中间也尽力谈谈中国的情况以及日本近代现代史，因是现代新闻媒体所面对的负面部分。一番濑君是通过笔者讲课，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情况之后，站在卢沟桥上的。

但史实更加悲惨残忍。他用“受到很大冲击”几个词来表达。可见资料和实证照片比讲课时学到的更能抓住日本青年的心。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觉得自己好像不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而糊里糊涂生活过来似的。关于战争，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我只知道日本战败了。来到这里，我完全明白了。日本战后没有向受到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谢罪。我觉得还没有谢罪的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真正的交流并没有开始。”

德国人民战后与纳粹决别了。现在还举国同法西斯继续进行斗争。相对而言，日本则是暧昧地处理了所有问题。其罪魁祸首正如笔者在《天皇的官僚》（数据出版社发行）中所指出的，许多日本人是不知道那些情况的，甚至也不想知道。

参观卢沟桥的二松学舍大学的学生都同样呼吁“应该谢罪，赔偿，”要像德国一样。一番濑君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既然现在的领导人不谢罪，我们这一代就必须正式去谢罪。谢罪到原谅为止。我想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日本和中国之间不幸的历史，由此才会开始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他于9月8日从千叶县柏市老家给我写信，信中也写道：“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知道了决不是他人的事。既是日本人就要承认事实，拿出诚意来谢罪。要尽可能让更多的日本人

了解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日中交流。”

听了学生的发言，多田先生作补充说明，他说：“关于赔偿问题，由于中国方面的好意已经放弃了。问题是没有很好的谢罪。右翼政治家否定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企图从教科书中把它一笔勾销。”

感动了中国青年报社长

千叶县市原市经营美容业的桐谷二三代也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最好拿到广岛和长崎去永久展览，把抗日战争纪念馆移到东京去，怎么样？”

一直听着学生们发言的中国青年报社长眼睛湿润了。他说：“我太感动了。”又说：“把历史事实告诉他们，这样做可以引出正确的结论。请大家务必理解的是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日本的责任问题，因为只有很好地总结过去才能很好地推进今后的日中关系。所谓历史是过去的经验，既有好的经验，也有痛苦的教训，这些都助于教课。这样做是希望相互都走正确的路。中国希望和日本和平友好相处，因为这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日本，也有利于亚洲。为此双方青年人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徐祝庆社长是从人民日报社论委员转到中国青年报的，对日本明治史有很深的研究。他是尤其对日本青年的素质感兴趣的头号中国新闻工作者。

有的团员没有机会在中国青年报上谈感想，就寄来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印象。国铁总工会玉盛清在从北京到东京的飞

机上，用天桥宾馆的信纸写备忘录道：

“实际看了现场和资料，还是很逼真的。参观中好像身体变得僵硬了。如果生长在这个国家的话，如果小孩子参观这里的话，会怎么样呢？置身于对方立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教育的不健全，真的不可思议。了解日本侵略事实的真相多么发人深省，由此才开始友好的第一步，的确是这样。”

他在谈到学生们的感想时写道：“听了这次学生们的发言，要珍惜这种心情，不要把它抛弃。希望他们不要被社会潮流冲昏头脑。”

这里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国铁总工会会员平时的心情溢于言表。

主妇中山米奈子寄来的祝词中说：“我认为日中和平交流21争取和平的工作，好同这次参加活动的全体成员点了一把火。希望会后肩负新时代的青年一代参加。”她指出了青年人参加的重要性，确实如此。

某画报设计师的丈夫圣雨君寄来感想说：“731部队等日军在中国的野蛮行径，以前在书本上知道，感到愤慨。但因时间的流逝、工作的繁忙和注意自己的生活而开始遗忘了。这次通过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强烈地感到战争使人疯狂到如此地步。军国主义真可怕、愚蠢。在饭店早晚眺望窗外，注视着中国人怎样生活，脑子里浮现出过去日军曾攻到这里，人们到处逃窜的情景，恐怖感涌了上来。强烈感到再不要重复过去，希望人们都同样地幸福。”

札幌啤酒干部社员高桥利明交给我的笔记中写道：“正如学生们所说的，战争再也不能打了，应该与有着二千年友好关

系的中国继续进行子子孙孙的和平交流。这样有意义的旅行还是第一次。”

千叶市建设业者斋藤茂一发表感想说：“战后已经过去 53 年了，但至今仍责任不清，使用着‘友好’这样的词语，感到悲哀。但愿青年人以宽阔的胸怀，加深日中友好，为面向新的 21 世纪而努力。”

受到白介夫、张承钧的欢迎

访问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 1998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过后，一进纪念馆后面的大门就是接待大厅，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就在那里等候。

与张馆长见面是在 199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6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分别之后的事。同白先生是在 1998 年 4 月，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接待室刚见过面。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8 年 7 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介绍了日本人访问该纪念馆的有村山富市首相（1995 年 5 月 3 日）、社民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1997 年 3 月）、前首相羽田孜（1997 年 7 月）、前首相宇野宗祐（1990 年）、自民党太田诚一访华团（1997 年）等。笔者 1 月 15 日的赠书场面带照片也一起刊登了。

张承钧馆长为访华团详细说明了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经纬。他在感谢赠送《中国的大警告》后说：纪念馆建造于七七事变 50 周年的 1987 年 7 月 7 日，在 60 周年的 1997 年 7 月 7 日扩建改造，目的是让中国的青年人学习从 1937 年开始的日本军国

主义者侵略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为了让现在的日本人学习历史教训。

吸取什么教训呢？

“第一，这么大的中国一瞬间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何在？在于现代化的落后，让青年人知道这个原因。第二，让他们学习战争的残酷性，懂得和平的宝贵。由于侵略战争中国人受害者达 3500 万人，日本人民也蒙受巨大的苦难。参观这里教育他们反对战争 珍视和平。”

张承钧馆长的说明简洁明了。他在绝佳的致词中继续说：“中日间有两千年的交流。近代一个时期，两国有不幸的历史。我们要不忘过去，引以为戒，以此教育中国的青年人。国家主席江泽民说以史为鉴，中日两国要向前进，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下去。愿和日中和平交流 21 世纪会一起携手为和平而努力。”

据抗日战争纪念馆调查，访问纪念馆的人数约 900 万人，其中，日本人 11 万人。张承钧馆长又说：“上周六接待了日本来的 300 名青少年。”这是好消息。

大家要求北京市元老人物白介夫先生“谈谈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对我来说，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是忘不了的，尤其是 1942 年日军大规模侵略。战斗中，八路军参谋长就死在我的附近，离我不到 500 米。”

“当时，我是河北日报记者，报社约有 200 名员工，而其中有 47 人被杀害。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中幸存者真是命运好，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白介夫先生轻描淡写地谈了他自己的体验。 78 岁

的白先生在谈了日中两千年交流之后，谈到了不幸的近代现代史。

“中日两国长时间进行友好交流，而关系变坏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1873年日军侵略琉球群岛把台湾变成殖民地。由此开始的中国抗日运动达70余年。日本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侵略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在这个卢沟桥附近开始大规模战争，一直继续到1945年8月。这期间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夺去3500万人的生命。最残酷的是南京大屠杀。截止目前为止的调查，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而大多数是南京的普通市民，有一部分是中国士兵。”

前北京市副市长为抗日战争幸存者的证人，简洁地叙述了残酷无比的过去的侵略，接着他又继续说：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不大向国民进行这样的教育。有段时期发生教科书事件（铃木内阁）。文部省把侵略改写成进入，几十万军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清楚。最近美国畅销的《暴行在南京》中谈到了大屠杀，日本驻美大使对此竟提出抗议。我想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正视历史的，但有一种倾向是极少数右翼分子企图修改过去的事实。”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日本国民在太平洋战争遭受的损害一百年也忘不了。同样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间，尤其是从1937年以后的8年间，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害，中国人民一百年也不能忘。这是理所当然的。连希特勒也没有干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

白介夫先生坦率地吐露了中国人的真情。他指出的愚蠢的驻美大使就是斋藤。恐怕是屈服于右翼的压力吧！严重伤害了

中国人的感情，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白介夫先生想利用中曾根的发言，向日本人转达中国人的想法，把中国人逼到这样的地步，究竟有几个日本人注意到了呢？

北京市元老最后说：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过去的事呢？原因是因为日本部分右翼分子否定过去的历史。这岂止百年，更长时间都忘不了！”

“德国正式谢罪了，很好。日本为什么不能呢？德国前总统对日本说，如果不很好承认历史，日本就不能营造一个新形象。正如作者在《中国的大警告》中所写的那样，要正视历史，不这样做，中日友好就不会顺利。”

在抗日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就任北京市要职的白介夫先生头发虽白，但具有庄重的大人物风格，非常健康。据说在打网球锻炼身体。

在白先生之下，负责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切活动的是张承钧馆长。两者之间有个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刘述礼先生。可称是白一刘一张三重奏。

参观馆内之后，在纪念馆食堂吃饭，白、张两位先生也一起就餐。他们从早到下午近两点，一直陪同着日中和平交流21访华团，笔者深受感动。

肖向前先生长时间的讲演

和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肖向前先生也来热情接待我们，他是中国头号知日派，是中国外交部的活字典，也是在东京推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人物。他体

察北京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的意图，在东京站对日工作的前列，是个非常活跃的“金刚”。

“我青年时代，从中国辽宁省作为当时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的大学去学习，就是筑波大学的前身东京文理科大学，但在那里开始了我的革命活动和抗日运动。东京有进步的书店，像内山书店等。能在神田的神保町搜购马克思、列宁的书籍，专心阅读。当然也出售中国的书籍。”

肖向前先生从他和日本的最早的关系开始讲演。侵略中国的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满洲国这个傀儡，进行殖民统治。据说日本是为了更彻底统治满洲国，作为留学生把肖向前先生派到东京的，但是，他在东京觉醒了，参加了革命运动和抗日运动。

“当时的满洲国和日本政府让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是想培养亲日派，给他们以相当的自由。我比一般的日本人多一些自由，在东京常和日本的进步人士举办读书会，后来成立革命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结合搞统一行动。”

现在的肖向前先生是个大好人，他朴实的性格完全是个东北人模样，和蔼的表情来自于完成一切的满足感。像他这样的人在东京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情景简直很难想像。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我按党的命令回到满洲国搞地下工作。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我在东京。日本如与美国开战定会失败，这是一场法西斯反法西斯的战争，估计会很快结束。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也有人做同样的预测，日本海军也是如此，山本五十六也知道。”

日美开战，中国共产党估计日本败北，于是命令肖向前回

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1946年开始国共内战，1949年新中国诞生，历史发展急剧变化。

“进入50年代，逐渐有人从日本来到中国。清水是坐小船来的。1952年8月（应为5月——译注）帆足计等三人访华，他成为战后首次访华的日本政治家，是以个人身份来的，由此开始了民间交流。从那时开始我和孙平化担任接待工作，一直做有关日本的工作。十年前我离职退休，现在80岁了我们还有些联系。战后的民间交流从1952年算起已有46年了。周恩来常说饮水不忘掘井人。”

1952年开始的日中交流，到邦交正常化花了20年时间。一想起这点，是不应该忘记掘井的人们的。邦交正常化前访华要有舍弃生命的决心。笔者熟悉的宇都宫德马先生由于是执政党的一员，需要作好放弃大臣等官职的一切精神准备，也包括被自民党开除。

实际上，宇都宫先生无论人格还是见识都无可挑剔，但始终没轮上大臣的职位，排除在所有政府要职之外，但他还是向日中友好挺进。为日中友好尽力的政治家确实很多，但甚至要抛弃一切官职而努力的政治家，笔者只知道宇都宫先生。

例如藤山爱一郎先生在岸内阁任外相，功成名就后努力从事日中问题。石桥湛山先生甚至当了首相，他们都值得评价，但宇都宫先生则是彻底无冠专心致志于日中关系的，这太伟大了。周恩来总理说的掘井人，最先应列举宇都宫先生的名字。

只要有诚意一次就够

肖向前先生全然不顾桌上的茶水，专心致志地用流利的日语谈了吉田、岸、池田历届内阁的对日外交之后，谈到自己直接参与的 1972 年邦交正常化工作。“为什么 1972 年这个问题解决了呢？那是钻了中美关系改善的空子。这样邦交正常化走在美国前面了。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30 分钟前通知日本，激怒了佐藤荣作。中日关系的活动变得频繁起来了。特别是报道机关劲头十足。”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的 1971 年，我还在乡下党校（五七干校——译注），由于藤山组成超党派访华团，我被叫到北京，见到了藤山先生，知道他决心恢复邦交。财界也动起来了，先是关西财界，接着关东财界派代表团来。”“在藤山访华期间，划时代的复交三原则写进了联合声明，点子是宇都宫德马先生出的。三木武夫、古井喜实、竹入义胜等政治家及财界首脑一个接着一个来了。”“1972 年 4 月藤山先生来，对周恩来说：下届首相除福田赳夫以外，不管是谁都要搞日中邦交正常化。自民党总裁选举是 7 月上旬，我 7 月 3 日从香港首次乘日航赴日。我相信藤山先生的分析（田中取胜）。但接到指令说，如果福田当首相就出不了国了，所以要尽快访日。在飞机上日本报纸报道田中、太平、三木三派联合，因此我想：已不成问题。7 月 7 日田中内阁成立，中旬孙平化率上海舞剧团来东京。藤山先生召开欢迎孙、肖酒会，除田中首相之外，政府要人都来了。见此，我想不用担心了。”

日中邦交正常化风驰电掣般瞬间就解决了，像郁积起来的能量突然放出来似的。但此时不应忘记宇都宫先生等无数民间掘井人流血流汗，渴望日中友好的人们的热情溶化了坚固的冰墙。

肖向前先生的历史证言长达两小时以上。他还回答了几个问题。80岁老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说出来的日语是极其精巧的。他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福田内阁）、大平内阁的日元贷款以及21世纪的日中关系，并断言：“下世纪的亚洲是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纪。”

他还说“有个担心”，当然是指日中关系，说：“当中国对日本的蛮不讲理的言论加以批评时，就会有人出来说‘拿出证据来’。反复使过去合法化。重要的是教育。必须告诉他们坏事就是坏的。”

“说话是否发自真心的呢？如是真心诚意的话，一次就行。中国人是宽大的。”

听肖向前先生的发言，我对日中和平交流21的小小活动越来越有信心了。

结 束 语

本书是 1996 年编写的《中国的大警告》（数据出版社发行）的姊妹编。1998 年正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0 周年，这是《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出版的原因。

中日两国当政者都把“日中关系在向前发展”当成口头禅。现实怎样呢？在经济领域是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果，但政治领域是很不正常的。实际上国家主席江泽民本应 1998 年 9 月访日，但表面上以中国遭特大洪水为由，推迟到年底。

这是没有先例的。真相是由于两国事务当局以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日本为前提，草拟联合宣言方案时，围绕台湾问题意见无法协调。

日本表面是为了照顾台湾当局的意愿，而其原因在于日本僵硬的态度。再加上日本政府竭力奉行强化日美安保、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等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政策，中国方面对这样的日本政府不信任，根子也在日方。这样的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名存实亡。

日本的安保政策的核心部分是以中国威胁论为前提的。其背后隐藏着日美台产军复合体制扩军的野心。当然有关方面照例收买了新闻媒体的可能性很大。不能报道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与独裁国家并无区别。

这样从政治方面来看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情况决不令人

乐观，事态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采取了劝说政策，才勉勉强强地回避了危机。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相互理解不够。尤其是日本方面的理解不够，可以说这是决定性的。在代表日本国民的政治家中依然有人毫不掩饰岛国居民特有的气质的非国际性发言，那帮家伙无意中拒绝了国际化。这些想以狭隘的国际主义来找到“正义”的右派势力的抬头，涉及政界、官财界、学界、新闻报道界，战后的历史教育也是灾祸的真正原因。企图使明治史合法化，掩盖脱亚入欧的殖民地侵略战争史，由于继续进行这种颠倒事实的历史教育，妨碍了和周边各国人民共有历史。

本书在这种非国际性右翼史观逆时代的坏潮流中逆水行舟，要面向邻居，把邻居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乍看不禁感到似乎很难做到，但决非如此。谁都渴望和平，因为这个地球上的人们都欢迎和平。拒绝日本精神上现代化民主化的势力不可能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

而这项工程决不是为了邻居，是为了日本人，为了日本。这才是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惟一道路。

最近还在东京四谷事务所见到了 92 岁的宇都宫德马先生，我再次问他：“为什么要喜欢中国？”他马上回答说：“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邻居和邻国，不是吗？”

这是宇都宫先生拒绝一切官职投身于日中友好的原因，他才是无冕帝王。他在青一色反共时的自民党内像唐吉诃德似的持续呼喊日中友好，被当时实力人物所厌恶所憎恨，结果未能得到阁僚职位，在永田町是罕见的政治家。

笔者对这样的宇都宫先生非常爱戴。他抓住刚 30 岁出头的年轻政治记者的笔者，费尽唇舌唠唠叨叨地说“要重视中国”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本书反映的全是笔者亲自实地获得的中国人的心声，不是被称为学者的那种抽象的作文。它是中国人感情的喷发，或者还有些个人的想法，但是，这些是代表中国 13 亿人的真心话。也许有特定人物的特别的体会和信念，但对相信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的笔者来说，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像一支锐利的枪尖刺进胸膛。

说是战争结束了。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算起，已经过了 53 年。然而日本和中国，或日本和亚洲各国的战后问题仍然没有完结，这就是现实。《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阐述了其一部分。

当然，有些人想努力让战后问题真正地结束，也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日中的未来。第二部介绍了为日中友好而努力的鲜为人知的人与事，当然，都是民间交流。我痛感有必要把民间交流的范围扩大再扩大。

无论如何，必须把日中和平交流作为 21 世纪的主流。

日中和解的成功，不仅使中国和日本的经济交流飞跃发展，而且能使 21 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可以在世界上形成从以军事为中心转变成以对话为中心的和平潮流。

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

责任编辑:周 夏

封面设计:彩奇风

中国日本问题研究丛书

《小泉纯一郎面面观》

[日] 本泽二郎 著

定价:15.00 元

《帷幕后的奸雄——中曾根康弘外传》

[日] 本泽二郎 著

定价:20.00 元

《战后日本遗族透析》

[日] 田中伸尚 田中宏 波田永实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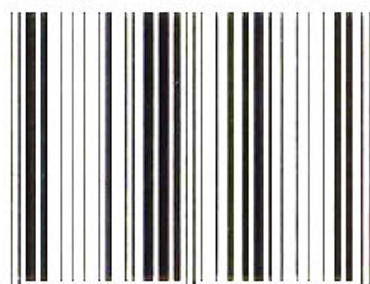
定价:14.00 元

《战后补偿的思考》

[日] 内田雅敏 著

定价:12.00 元

ISBN 7-5077-1977-4



9 787507 719772 >

定价:16.00 元